

觀察叢書

兩條路

樊弘著



上海觀察社發行

舊



國家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兩條路

(橫濱有印)

三十七年十二月廿八日 (1950年11月3日)

著名笑

發行人 儲安

發行所 觀察社

上海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基本定價：金圓四元二角

波文書局

PO WEN BOOK CO.

Publisher & Bookseller

Specializing in Chinese Studies
252 Queen's Road East G/F1. H.K.
P. O. Box 3066, Wanchai H.K.

078
87333

目錄

苦悶與得救(代序).....	一
收益方式與行為方向的關係.....	一三
知識·思想·行為.....	二二
社會科學呢? 儒家哲學呢?.....	三一
再論社會科學與儒家哲學.....	三四
從「知難行易」學說的批判說到國民黨今後的出路.....	四〇
孫中山與馬克思.....	五一
從經濟的觀點評今日幾種錯誤的政治見解.....	六六
與梁漱溟張東蓀兩先生論今日的文化與政治.....	七六
我對於中國政治問題的根本看法.....	八八
評蕭公權先生的「自由」社會主義.....	九三
十年來政府威信的隆替.....	九八
階級·政黨與民主政治.....	一〇二
現階段的中國經濟病症的癥結.....	一〇

國家圖書館



002439625

101325524

世界經濟與政治進化的歸趨·····	一一九
中國經濟政治與文化的歸趨·····	一二八
兩條路·····	一四八
只有兩條路·····	一五九
空想的社會主義和科學的社會主義·····	一六六
教授治校與學術獨立·····	一七三
今日大學教育的使命·····	一七九
學生運動的意義·····	一八七
由必要到自由·····	一八七

兩條路

苦悶與得救（代序）

一

近些年來，在精神生活的旅途中，曾碰着了許多次的向爲自己所信奉的理想，在實際上不能實踐的困難。在困難發生，幾經奮鬥，而不得解決之際，心理上曾現出了無限的衝突與矛盾。高尚的理想，經過屢試和屢敗之後，好像一隻在駭浪和驚濤中，爲巨礁碰成碎片的汽船，根本不願意把它再拾起來了。可是，除了舊理想外，幾乎與任何其他觀念，都未曾發生過親密的關係，更說不上信仰和崇拜的問題了。此時，在言論與行爲中，不知不覺的便表同情於走向另一極端的見解，並給它作了多少次的誇大而無忌的宣傳工作，但自己却也並不衷心的相信它。有時在言論中，並不是在行爲上，却又發生一種極度憤慨的情緒，連一切的理想都不顧了。恨人在上，願人在下，凡屬稍有權威的人和物，都變成了我所諷刺的對象。但有時，神經忽又麻木起來，好像一顆蛀牙，經過多年的劇痛和不治後，一切的感覺都喪失了。在這一種極度矛盾和反常的生活狀態裏，雖然對於新觀念，無時不在虛心的接受，但它却好像吃在胃裏的一塊什麼生硬的東西，總覺得它是它，我是我，二者無論如何都不能融合

在一起。此時我的心境好像一個曾經被人遺棄了的婦女，對於舊時的婚姻生活，深惡痛絕，新的認識全不合適，經過許多年的單居之後，以為此生不會再有碰着理想的丈夫的機會了。遙想，將來，假令，不料，有這一年，在一極度淒涼的環境中，忽然遇見了夢所難見的理想的情侶，你想，此時她的心裏應該是如何快樂的呀！我自從離開我的舊的信仰之後，幾約十載有餘，凡所接受的新觀念，都不足以解決我曾為我昔日所崇奉的高尚理想所不能解決的問題，以為此生必無再有發現新理想的機遇了。不料，竟有這樣一段時間，在一座深山的古廟中習靜，忽發現了我多年尋找不到的新的真理，原來就在我的日常生活的經驗之中。現在這份新的真理，我應當說，新的觀念，已變成了我自己的靈魂了。回憶自從我的舊理想被我所遇見的新事實碰成粉碎之後，此中所飽受的徘徊與孤獨，簡直有如王國維先生以美妙的詩詞，所渲染的失望和苦痛：

昨夜西風凋碧樹，

獨倚門，望遍天涯路。

隨後爲了追求新理想不得，在心頭上，所浮現的悲哀的情調，真似：

衣帶漸寬終不悔，

爲伊消得人憔悴。

待新理想忽然以天使的姿態，從五色的彩雲中，如飛燕掠水的輕快，於一剎那之間，飄墮地之時，於我心中所掀起的狂歡，真似：

衆裏尋她千百度，
驀回頭，忽然看見，
站在燈火闌珊處。

在我的精神生活的旅途中，我以為，至少有一種新的觀念，完全是以上述的歷程，被我獨立發現的。這種新的觀念，我可有權利向他人宣佈說，它完全是我的。但我另有一種理想，在取得的時候，並未完全經過上述的三段的求真的過程，最顯著的是，只經過了最後一個。這一理想不是我所獨立發現的，它完全是別人的，在我未曾說出這兩種理想的真實內容之前，我只能以一種譬喻，來說明二者的相互的關係。即前者似體，後若似用。前者乃是一種治病的藥丸，後者乃是在藥丸之外所裹上的糖衣。藥丸因能替人治病，很是重要。但糖衣能使病人歡喜藥丸，使他雖食藥而不覺其苦，當然也是要緊的了。後一種理想是我從昔時所曾崇奉過，但後來又把它放棄了的舊理想中，領悟出來的。經過多次的而壁，我纔恍然大悟；即舊時的崇高的觀念，並非無論在什麼地方都不對，我們對他實也太用不着深惡而痛絕。它在某種地方仍是對的。他雖不能作藥，但這不妨礙他可以作藥丸上的糖衣用，他作主人誠不可，但作僕人堪稱能手。新舊的結合原來是如此的！

二

我原來是相信墨子哲學的一人，一向是服膺犧牲小我的利益以為大我的利益的。不但在理論上相信墨學而已，而且在行爲上，無時無地，不是以身作則的去躬行實踐的。這不但是

我，我以爲凡是一個青年，除非他是傻子，在初會着利他主義的時候，幾乎亦無一不是五體投地的崇拜的。青年人所最崇拜的是利他，所最痛恨的是自私。豈但青年而已，中年人何嘗不是如此。無非多少的缺乏真誠而已。每在十篇批評時事的論文中，特別是在中國這個國度裏，幾乎九篇九都是站在人道或正義的立場。誰也知道，正義的確切的内容就是利他，它的反面就是自私。何以知道，正義的確切的内容就是利他呢？墨翟在他的非攻篇上，把這一個問題答得最妙。他的答覆說：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爲政者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人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慈甚，罪益厚。而入人欄廄，取人牛馬者，其不仁慈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慈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把其衣裘，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廄，取人牛馬。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慈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不義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知之，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今有人於此少見黑白，多見黑白，則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辨矣。少嘗苦曰苦，多

嘗苦曰甘，則以此人爲不知甘苦之辨矣。今小爲非則知而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辨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辨義與不義之亂矣。

從黑霍這一段話裏，我們知道正義的內容確是利他，不義的內容確是自私，並非黑霍個人的私見，實是天下之公論。黑霍的貢獻不過是把大衆心中所藏存的正義感，發揮得額外的淋漓盡致罷了。

我曾以爲社會上一切的衝突都是由於人的自利的行爲所致。反之，社會的和諧與協致，都是建築在少數人的利他的行爲上。家庭之間的精誠的團結往往是由家裏有個很好的家長。學術團體之能精誠團結往往是由在學會裏有個很能犧牲的領袖。社交團體之能精誠團結，往往是由在這團體裏有一個很負責任的老大哥。全國國民之能精誠團結必是由於有一象徵國父這樣偉大的領袖。以此立論作根據，我曾立下一條格言，以爲躬行力踐的指南：

身與家能兩全，當謀身家兩全，不能兩全則當捨身全家。家與國能兩全，當謀家國兩全，不能兩全則當殺身，毀家，救國。國與世能兩全，當謀國世兩全，不能兩全，則當殺身，毀家，破國而全世界。

自此之後，無論對於何人均抱犧牲精神，果然，在家庭朋友之間，便處處得到極良好的反映。直到如今還在受用。記得在北平工作之時，力行儉樸主義，稍有餘力，便以之略微補助窮朋友。當自以爲墨霍的兼愛非攻的利他哲學，不但可以修身齊家，即以之治國而平天

下，亦有此種能力。遂不免相信這種哲學是唯一的。

後來到上海了。在上海住了數月之後，實行利他主義的結果，與預期的狀態完全相反。原來在上海這個地方，什麼都有一個客觀的標準。第一，比如你欲向用人給小費。這個小費是有一定標準的。利他主義者假令不知道這個標準，而把小費給得太多，不但得不到用人的感謝，反而要被罵為豬頭三的。第二，穿衣服也是有一個客觀的標準的。利他主義者，假令力行儉樸主義，使其衣着落到中級標準以下，不但不能實行主義的宣傳，而且必會討侮辱吃。第三，上海人的收益是有一個平均標準的。在標準以下的貧民不知有好多人。談何容易「摩頂放踵利天下而為之。」除非你是一個全知全能的上帝，那麼，你的收益必定是有限的。縱令你就盡力節省，每月集成若干，最多亦不過能夠救得一個兩個，可是利他主義者墨翟，却欲以他的腦袋上的幾根頭髮，來使普天下人，均霑其利，豈非笑話？第四，上海人的品質也是有一個標準的，就是澈底的自私自利。我以為利他主義如欲有效，必須假定，凡人不受物質的利益支配，只受善良的動機支配。可是，在上海這個巨大的都市裏，人多受物質的利益支配，即少受利他主義支配。只是一個人做傻瓜，衆大多數人都是豺狼或猴子，利他哲學究竟為的什麼？我以為利他主義原是不交通經濟時代的產物，希望救濟的人只是少數，又提倡救濟的人必是富翁或王侯。如我這個只靠低級薪水為生的個人，並在交通經濟時代，而欲實行利他主義，我不否認它好，但必定沒有什麼效果。

利他主義原是我的一種宗教，可是現在我的宗教破了產了。但我對於自利主義又極厭

惡，現在一面是懸崖，一面是陡峯，後退不能，前進不可，除了發狂或苦笑外，在我的精神生活之旅途上，直找不出半點兒安慰。隨着精神生活的破產而來的，便是紛至沓來的健康的敗壞。幸虧醫藥有靈，始未亡命。

利他主義既絕不足以治世，可是當日提倡利他主義的人却是多得滿山滿谷，苟非癡愚，必是騙子。莫怪我要看不起他們了。不但看不起他們，同時我也看不起我自己。我覺得我自己亦是一輛沒有油液的汽輪。雖然存有軀殼，但是沒有靈魂的。

最後回到北平來了，有一老人勸我學佛。佛已學了，雖不知解，微有領悟，但覺空無所依，轉而學孔。孔已學了，惜亦無得。此時雖亦涉獵唯物史觀，但總覺得於我是隔膜的。但心裏仍懸着一問題，即支配人生的中心力量，假如不是正義究竟是什麼呢？自利主義嗎？恐怕不必全對。然則它是人類的生產物質的方法呢？但這於我亦甚隔膜。它究竟是什麼呢？

在這問題發生之後接着又經十多年的耽誤。出了英國，回到湖南。去了湖南，重入西蜀。後因敵人飛機肆虐，逼上峨山。行到半山之上，入一破廟，賃屋讀書，治微積分。就在這個時候，記得有這一夜，靈機忽發生作用，方纔覺得支配人生行爲的中心力量原來即存在於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何須向書本上再行尋求，是即個人取得收益的方法了。

我的意思是說，人在實際生活的時候，無論聽着什麼好聽的名詞，或主義，在不知不覺之中，他都要把這個主義來與他的取得收益的方法配一配。如果這種主義是與他取得收益的方法資本，土地或勞動，……是有幫助的，他便用它。如果沒有幫助，他便不用。如果是

有害於它的發展與維持的，他便要怪它，恨它，欺它，侮它，甚至要戕害它。至少他也要對它施展一點陽奉而陰違的手段了。同時對於實行主義的人，不問你是蘇格拉底或柏拉圖，耶穌或孔子，孫中山或馬克思，假令你在實行你的主義的時候，與他的取得收益的方法，土地，資本或勞動的發展有幫助，他便會認你為他的很忠順的奴僕或領袖。反之，如果你在實行你的主義之時，與他的取得收益的方法有妨礙，無論你是他的父親或兒子，他都將對你毫不客氣了。願拘則拘，願殺則殺，願宰則宰。歷代古先聖賢的學說所以不能實行，原因在此。比如以墨學來說，在他的兼愛非攻篇的涵義裏，很明顯的是要當代的那些財神菩薩們，爲了實行兼愛主義，自動的把他自己的取得收益的方法——偌大的一棵搖錢樹，把來犧牲，以利天下。從一個地主或商人看來，「這話誠然說得有理，但因它無支配我的實際行爲的能力或權利，只有我的搖錢樹才有」，莫怪他要鄙棄它了。更從一個勞動者看來，「這話亦誠然說得有理，但因支配我的實際生活的太上皇帝是勞動，它決不願我離開勞動的照拂，而去白白接受墨翟主義者的佈施的。」在他方面他憑着他的勞動所得的些微收益，實在太少，連維持他的妻室兒女都不夠，那裏還有餘力來救濟貧困呢？而且一個年青力壯的窮人，賦有銅的筋骨和鐵的臂膊，竟然不去好好的工作，而欲待人施捨以爲生，實亦毫不值得憐恤。利他主義的哲學和宗教之所以在今日失掉世人的崇拜，就因它在一方面，不得勞動的歡心，在他方面，且遭特權階級的仇視，莫怪它要消沉和沒落了。這個說明了我所崇奉的利他主義，爲什麼在上海這個都市裏被粉碎了。

在今日的社會中，既然地主和資本家階級都不願和不能自動的來限制或取消他們自己的取得收益的工具——土地和資本，並且要進而以種種的方法來與社會主義爲敵，那末，實行社會主義的唯一的途徑，當然便只有仰仗於進步的小資產階級與進步的勞動階級分子，起而代之而有產者階級，（以流血或不流血的方式）掌握政權，對於有產者階級施以外的壓力，強迫他們節制資本與平均地權。我現在並不欲替任何黨派作宣傳，我的唯一的目的，只在大胆的揭破社會的無知與謊語，去與新的真理見面而已。

現在且讓我來把我以上的觀念寫成一個可以了解的科學的形式：即從社會整個的觀點來說，一個社會人在一社會裏的主要行爲是受該一社會正在盛行的最主要取得收益的方法支配。在工業革命以前，社會上取得收益的最主要的方法是土地，於是一切社會人的實際的行爲，無論在哲學上或宗教上，法律上或政治上，都在以直接和間接的途徑，來便利土地所有權的維持與擴大。在工業革命而後，社會上取得收益最主要的方法是資本，於是社會上一切的思想與制度都在以直接和間接的途徑來便利資本的維持與增殖。在今日科學萬能的時代，社會上取得收益的最主要的形式將是科學和組織，可是現時社會上一切風俗和習慣，法律和政治，宗教和哲學，尙在處處維持資本的勢力，並且且在妨礙科學和組織所給予人類的貢獻，這當然會迫使今日的進步的知識分子和勞苦大眾起而爭取政權，爭取組織和爭取輿論了。除非人類的社會的行爲不復再受人類取得收益的方法支配，社會的革命恐怕必要成功，不能失敗。

我不睡樂正義與人道對於改革社會的成效，英國的第一次工廠立法豈不也就是在保守黨的領導下通過的麼？但因人類的行爲，既然在大多數的場合裏，都不受正義與人道的觀念支配，但只受他的取得收益的方法支配，所以今日的人道主義者，倘欲單獨依靠教育的力量，來叫今日的官僚與政客、投機商人與軍閥、地主和資本家自動的放棄或修正他們的剝削勞動的方法，來適應今日的社會的需要，這畢竟是很難辦到的。老虎能夠自動的拔去他的獵食的爪與嬰孩作良友麼？除非假借外力，這當是辦不到的。因此之故，我以為今日的社會制度的改革，離了進步的小資產階級和進步的無產階級起而團結奮鬥，以流血或不流血的手段，起而掌握政權對於有產者階級施以相當壓力外，節制資本與平均地權的主義，恐怕終必難以實現。

孫中山先生是我所一向崇拜的。國民黨亦有其最光榮的歷史。但我以為，除非國民黨在取得黨員資格上給以財產的限制，民生主義必難實現。我想我的話，說到這裏便很夠了。

我不承認我自己的理想是抄襲馬克思的學說來的。但我自從發現人類的取得收益的方法，是支配人類的中心力量後，我不禁要說，馬克思實是在這一方面，知道得最多的一個前輩。又我的理想自與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合流後，越發使我相信，我對於人生行爲的解釋是不錯的，我雖然未曾逾越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的範圍，但我至少是可以說，我曾做到了我自己的經驗，給馬克思添上一條簡單明瞭的腳註，使馬克思的學說更容易使人接受。

我原來是一個正義感至強烈的人，雖不說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但在不公正的問題面前總是一往直前，行所無忌的。但我應該把我的話說得更清楚一點，即我雖然曾在不公正的事情發生的時候，極力主張公道，但我所曾主張的公道都只是在一些極小的事情上，卑微不足計較。現今回想起來，我畢竟還是，而且永遠的會是一個渺小不堪的人。我因我的脾氣太壞了，意氣逼人之事層出無已，迄今亦未完全改得過來。但後來因為偶爾再行涉獵王陽明的著作，覺得我所遇着的問題，王陽明亦曾遇着過。我雖然主張正義，但王陽明更是主張正義。只王陽明在主張正義時，所持的態度便與我大不同了。我們往往躁進而輕退，他則婉轉而持久，我們在主張正義時，往往流於洩忿，他則止在明理。我們對於一人的不正之行，在糾正他的時候，往往以攻擊的口吻出之，他則以告忠的言詞行之。我們在實行正義的時候，主任攻人之力，他則在服人之心。我們因有種種的不審慎的行為，往往至於逼友成敵，他則因無任何相暴的舉動，頗能化敵為友。我因此相信，儒家哲學別的不可以學，但在這些地方是要學的，不但要學，而且要額外認真的去學習的。我以為在中國這個土壤裏，離開了言忠信和行篤敬，無論你實行什麼主義，總是要遇着許多為你所想像不到的障礙的。反之，假如你處處都能以敬敵與愛人為心，無論你實行什麼主義，你都會得着意外的便利的。儒學必不可以作為推進時代的巨輪，但却可以作圓滑車輪的油液。他亦必不可以作為醫治社會的根本病症的藥丸，但他却可以作鼓勵病人吞服藥丸的甜美的糖衣。他必不可以作外科室內解剖肢體的利刃，但他却可以作減少病人的不必要的苦痛的香甜麻醉劑。小針眼可以壞大船，

小脾氣可以壞大事。淮南雖然有好橘移至淮北，可為枳的。沙皇的統治的方法，在俄國可以成功，在中國不必成功。儒家的統治的方法在中國沒有成功，在俄國亦必不能成功，我們希望中國的社會主義的運動必定要成功，所以我們的理想是，在推進中國的時代巨輪之上，或在割治中國的成年老病的外科手術之上，多用中國從自己本店裏在儒家哲學的原料中所蒸溜出來的國製機器油與麻醉劑。

最後我所要說明的，即我因對外界的實際的運動很隔膜，我必沒有討論實際問題的資格。我的唯一的目的，只在發表我這半生以來，在尋求真理的旅途中，所得到的一點感觸，請求大家指教。這即是說，我絕沒有證據來說，在中國各派政黨之間，那一個政黨是更合於中國化這個名詞的涵義的。

這裏所搜集的各文，曾先後零星地在「智識與生活」、「天津大公報」、「世紀評論」、「經濟評論」、「中國建設」、「中建」、「時與文」和「觀察」上發表過，筆者對於各出版家曾經聲明保留版權，但多承他們的概允，特此表示謝忱。

收益方式與行爲方向的關係

一

我以為人類的實際的行動，在根本上，既不受宗教的信仰支配，亦不受倫理的教條支配，也不受科學的知識支配，而係受他們的取得收益的方式支配。

何以說人類的實際的行動不受宗教的信仰支配，而係受他們各自的取得收益的方式支配呢？只要我們肯去略一涉獵基督教發達的歷史，他們立可明白這個問題是極容易答覆的。我以為，在耶穌基督的教義之中，有兩點特質，是最值得人類社會的崇敬的。第一點特質是革命的或平等的。在耶穌誕生以前，沒有一個哲學家敢為這樣大膽的呼籲的，即在上帝的面前，奴隸與主人是平等的。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該是在希臘歷史上最偉大的哲學家了，但他們因受傳統的階級政治的影響，竟然肯定的說，在人類裏面，有的是天生來做奴隸的。耶穌的教義根本否認有天生的奴隸存在，因他堅信人人都是平等的兄弟。第二點特質是，博愛或感化的。因為耶穌根本否認黷武主義，他始終堅信以愛力來改革世界，凡此兩點都是耶穌的宗教哲學最偉大的地方。但因他的宗教哲學與羅馬時代的特權階級的取得收益的方法衝突，耶穌不要奴隸，但特權階級要奴隸；耶穌反對利息，但特權階級要利息；特權階級未始不知道耶穌的宗教哲學的偉大，但因他們的取得收益的方式，土地和高利貸資本，不許他

們依照耶穌的教義做，而要依照前者所賦予他們的特權做，因此耶穌的教義便痛遭羅馬的貴族所仇視。耶穌雖一再向富人階級提出很嚴重的警告說：「富人要想昇天國直比駱駝想從花針眼裏穿過還要更不容易」，但富人階級對於他的這種警告的答覆很簡單，即根本不容許他有在富人的世界生存的權利，而把他活活的釘死在十字架上。耶穌在生的時候，雖然也有不少的信徒，但單就他的這幾位大弟子來說，他們不是木匠便是農夫或漁父。一言以蔽之曰，都是社會的下層階級。爲什麼羅馬時代的下層階級這樣擁護耶穌的教義呢？因爲耶穌所倡導的平等和博愛，不與他們的取得收益的方法相違背。

在中古時代，教會忽然得到了特權階級的擁護，但這全是因爲教會自己的行動走入違反耶穌教義的途徑。耶穌說：「富人要想陞天國直比駱駝要從花針眼裏穿過還要更不容易」，耶穌所謂富人自然包含貴族在內。可是，在中古時代，教會擁有極大的田產，教會從此不再反對地主的階級。自此之後，教會的勢力不復再與地主的取得收益的方法相違背，因此，教會遂爲中古的社會所擁護。然因當時的教會反對商業和反對利息，這種反對的意見直接與商人的取得收益的方法，商業資本相衝突，因此中古時代的教會始終與商人立於敵對的地位。

在近代歷史裏，基督的教義已得到了資本家們的擁護，但這是由自宗教改革時起，由馬丁路德和加爾文所領導的新教，澈底承認利息的正常性質的原故。換言之，即因新教承認資本家階級以資本放取利息爲合法，然後資本家階級方纔轉而擁護宗教的。由此可見，人類的實際的行動，在根本上，不受宗教的信仰支配，而係受他們各自的取得收益的方式支配。

人類的實際的行動，不但在根本上，不受宗教的信仰支配，且亦不受倫理的教條支配。試一回顧儒家哲學發達的歷史，我們立可明白這個道理是不錯的。在五、四運動以前，儒家哲學很受敬崇。這是因為儒家哲學，擁護等級的社會，在經濟上，很適合土地所有權的保持和擴大，和在政治制度上很適合帝王的專制政治的發達的原故。在五、四運動而後，儒家哲學遭受打擊。這是因為這個擁護等級社會的儒家哲學，在現代的經濟狀態裏，不適合近代的資本家的取得收益的方式的進展。近代的資本家階級取得收益的方式是資本。為圖資本的保持與擴大起見，資本家需要契約自由的權利。在資本家與勞動者締結勞動契約的時候，雙方的當事人在法律上完全立於平等的地位，儘管在經濟上不是如此。但因儒家哲學依然保持着深根固蒂的主奴的思想，不適合私人資本的積累，當然它要被打擊了。在政治制度上，現代資本家們需要培養或幫助民主的戰士，在政府裏，代表他們主張權利，以圖利便他們的資本的積累。這即是說，他們所需要的政治乃是民主的政治，然而中國的儒家的哲學還在主張好人政府主義，當然它要被淘汰了。在資本主義橫行無忌的世界裏，中國的資本主義雖未得到充分發展的機會，但確也發生影響了。由此以言，人類在實際行動上，根本不受倫理的原則支配，而係受人類各自的取得收益的方式支配。

人類的實際的行動，在根本上，豈但不受倫理的哲學支配而已。最可令人驚訝的一件事，就是他們且亦不受科學的知識支配。馮友蘭教授在批評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的學說的時候，力言在倫理的關係上知易行難，但在科學的關係上知難行易。他的意思好像是說，人類

的實際行動，在根本上，雖然不受宗教的並道德的信仰支配，但它却受科學的知識支配。實則是不然的。在科學發達史上，這位自然科學的鼻祖伽利略(Galileo)，因為他所發現的地動的學說，與聖經上的見解相衝突，然而聖經確是當時的特權階級的財產和權力的護符。而與他們的取得收益的方法脈脈相連，伽里略的地動說，因動搖了他們的取得收益的依據，結果遂受極刑。往事且不說，在今日獨佔資本主義的時代，凡在工程上有偉大貢獻的新的科學上的發明，當其出現之時，獨佔的企業家使他的舊機器尚未用完，假如採用這一新發明，舊機器的價值便將永遠沒有被收回的可能，可是，他又不願這一新發明落在他的競爭者手內，常有以重價收買這一新發明的專利權，而把它暫時束之高閣。或簡直置之不理，假令他確切相信他如不買，必沒有人能買得起，使他感到沒有危險。近代的獨佔資本家阻撓新技術的發明，在工業上迅速採用的傾向，與北平的糞夫和水車夫昔日之反對自來水和家庭衛生設備的情形，完全是相同的。英國的經濟學者邊罕姆說，

獨佔可以阻撓需要新式資本設備的發明的應用。假令有一個企業的單位，是某種商品的唯一生產者，又他碰着了這種新發明了，它是不會捨棄現存的設備而採用這種新式的設備的，除非以此推動現存設備的成本移以作為推動這新式設備連成本加上利息並加上他的買價的減價資金之總和外尚有餘裕。它亦不會一面保存現時的設備一面採用新式的設備，除非後者所得的利潤大於因產量增加物價減少之故單前者所損失的利潤。它會攔着更有效的方法的利益而使消費者蒙損失，直到它的某種現存設備用完為度。

(Benham Economics Pp. 200)。

由此可見，科學的知識在它誕生之時與在它成長之後的現階段，因有害於舊式的和新式的取得收益方法的發展，人類都不惜的給以無情的打擊和冷視，足見科學亦非支配人類實際行動的中心勢力。論到科學在十八世紀以來二百年間被人重視，這完全是因為科學可作資本主義的奴隸，即大有助於資本的蓄積的原故。一言以蔽之曰，科學即它的最昌明的時代，它亦不是支配人類實際行動的中心力量。換句話說，即人類的實際的行動，在根本上，還是受他們各自的取得收益的方式支配。

歷史一再的昭示吾人，人類在實際行動的時候無論聽着什麼好聽的名詞，或主義，於不知不覺之中，他都要把這個主義來與他的取得收益的方法配一配。如果這種主義是與他的取得收益的方法有幫助的，無論這種方法是資本，或土地、或勞動，他便要信它。愛它、和實行它。如果對他沒有幫助，他便不信、不愛、和不用。如果是有害於它的維持和發展的，他便要怪它、恨它、欺它、侮它，甚至要戕害它。至少他也要對它施展一點陽奉陰違的手段了。同時對於實行主義的人不問你是蘇格拉底，或柏拉圖，耶穌或孔子，孫中山或馬克思，假令你在實行你的主義的時候，與他的取得收益的方法——土地、資本、或勞動有幫助，他便會認你為他很忠實的奴僕或領袖。反之，如果你在實行主義之時，與他的取得收益的方法有妨礙，無論你是他的父親或兒子，他都要對你毫不客氣了！願拘則拘，願打則打，願宰則宰。歷代的古聖先賢的學說之所以不能實行原因在此。比如以耶穌來說，在他的教義裏面既

然力主平等與博愛，他當然要信奉他的教義的富人，自動的放棄他們的財產，來博施濟衆，以利天下。從富人的眼光看來，這話誠然說得有理，但因宗教無支配他的實際行動的能力或權利，只有他的土地或資本才有，當然他要鄙棄它了。再以儒家哲學來說，儒家哲學既然提倡好人政治，他勢必要反對民主政治，然而今日的資本家階級或勞動者階級，因為他們都不相信社會上果有全知全能的好人存在，爲了保障他自己的取得收益的方法計，他們均須要干預政治，而與儒家哲學爲敵。再把科學來說，科學的整個的目的在於征服自然。無論從任何觀點看來，征服自然的事業都是一件極偉大的工作。但因征服自然的工作，如果進行得太迅速，便將對於資本的蓄積有妨害，於是資本家階級，爲了維持和擴大他們的資本計，遂即起而阻撓科學上的新發明在工業上的迅速採用了。一言以蔽之曰，人類在實際行動的時候，在根本上，只受他們各自的取得收益的方式支配，而不受他的宗教的信仰，倫理的哲學和科學的力量支配。必須把這個前提明白之後，我們纔有資格來談實際的政治。

二

現在我想利用上述的結論來解釋好人政府主義在歷史上一再失敗的原因。其次我所要說的，就是現在的大多數的自由思想者所夢想的民主政治，其結果也不過是一場的空夢而已。最後所要大胆的揭破的，即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的哲學只是好人政府主義中的一種。今日國民黨的機構之所以同中山的三民主義，保持遙遠的距離，不過只是好人政府主義的多次失敗中的一個舉例罷了。爲避免重蹈歷史的錯誤計，我以爲，今後中國的政治的運動，必須接受

人類的收益方式纔是支配人類實際行動的動力的指導，方纔可有成功的希望。

凡是讀過政治學的人幾乎沒有一個不知道柏拉圖的政治哲學的。柏拉圖在他的名著共和篇上力言，我們如果要改造社會。須讓金質的人來做哲學家，再由這類的哲學家來做希臘的皇帝。希臘這國土既由哲學家皇帝來治理，他一定會依照正義來治國，其結果必然是共產主義的實現。柏拉圖在他的前半生裏，好像孔丘周遊列國一樣，不是今日拜訪這一位皇帝，便是明日拜訪那一位。他很想以他的教育的力量，來訓練出至少一兩位哲學家皇帝，來實現他的共和篇上的理想。無奈在希臘的皇帝中，簡直沒有一個皇帝，肯依照他的教義做。遑論暴戾恣睢的斯巴達皇帝，根本聽不進他所說的那一套。即以比較溫和的雅典皇帝來說，他因已養成了一種淫佚無度的惡習，亦何嘗能夠接受哲學的指導。哲學家的皇帝既沒有，好人政治變成夢，共和篇的理想盡落空，柏拉圖亦只好捨棄哲學的改革，轉而注意法律的改革了。

柏拉圖的政治的哲學，從經濟的觀點看來，他亦是想實現社會主義的。可是他的實現社會主義的方法，是要希臘的皇帝，或有產者的代表，親來接受哲學的洗禮，從事聖賢的修養，拋下殺人的屠刀，以求內心的平安，而不在結合被壓迫者階級以去共有有產者的財產，所以結果便失敗了。

再把民主政治的運動來說，我以為民主政治有兩種：其一，在主要的任務範圍內，是以保護資本家階級完成營業自由的歷史任務為目的。又其一，在主要的任務範圍內，是在保護

工農的階級逐漸實現生產工具的社會化爲目的。第一種民主政治，尊重財產自由，企業自由，和契約自由權利，大有助於資本家階級取得收益方式的維持和擴大，所以資本家階級要擁護它。第二種民主政治在逐漸實行生產工具的社會化，於勞苦的大衆有幫助，所以能夠得到工農的擁護。中國是一個次殖民地的國家，在一方面，沒有民族資本階級存在，在他方面，地主、買辦和他們的代理人——官僚，根本對於第一種民主的政治沒有水乳交融的關係。在正的方面，得不到它的好處。在負的方面，且將受它的打擊。當然對它要不熱心。這便是第一種民主政治，在中國一再失敗的原因。最顯著的一個例，即在民國十二年的時候，曹錕的大賄選成功，充分表示中國的所謂民主的戰士，參眾兩院的議員，對於民主毫不關心。爲什麼他們對於民主政治毫不關心呢？很簡單的答覆是，他們對於民主政治無切身的利害的關係。即因他們的直接的取得收益的方式土地和買辦資本的積疊，間接的取得收益的方法，作官與作「議員」，都與真正的民主政治不相容。第一種民主政治，既然與中國國民的取得收益的方法無幫助，但我們現在還在幻想它可在中國這個國土裏生根，其結果必是等於一場空夢而已。但是我們要問，第二種民主政治怎麼樣？我看比較有希望。

最後我所要大胆的提出來批評的，即中山先生對於中國的革命建設的失敗原因的分析不正確。依據中山先生的意見，中國的革命建設失敗的原因是由國民不知「知難行易」的孫文學說使然。因此，中山先生認爲傳說的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的學說，實爲中國革命建設之大敵。且看他說：

嗚呼，此說者余生平之大敵也。其威力當百倍於滿清。夫滿清之威力，不過祇能殺吾人之身耳。乃此敵之威力，不惟能奪吾人之志，且足以迷億兆人之心也。是故滿清之世，余之主張革命也，猶能日起有功，進行不已。惟自民國成立之日，則予之主張建設，反致半譯莫展，一敗塗地。吾三十年來，精誠無間之心，幾爲之冰消瓦解，百折不回之志，幾爲之稿木死灰者，此也。可畏哉此敵！可恨哉此敵！

實則中山革命建設事業的最大的敵人，乃是那些在取得收益的方法上與中山主義立於敵對地位的軍閥、買辦、官僚、土豪等類，可是中山先生不注意。就從這點錯誤的認識開始，國民黨中便混入了許多的偽裝知難行易學說信徒的反革命的分子。

爲避免重蹈歷史的錯誤計，我以爲任一偉大的宗教家、哲學家、和政治思想家，在進入創造歷史的階段裏，千萬不要再從空洞的信仰上去區別誰是敵人，誰是同志；但從財產的關係上去劃分誰個的取得收益的方法是與他的思想的實踐相一致的，又誰個是相衝突的。相衝突的多是敵人，相一致的多是同志，務使在這兩者之中絕無絲毫含混的餘地，然後他的理想始能有實現的希望。否則不是認賊作父，便將誤友爲敵。除了重演歷史的悲劇外，別無絲毫意義。

知識·思想·行爲

——空想的政治理論和虛偽的民主主義——

我所謂的空想的政治理論係指各種各樣的徒然說着好聽、但絕對不能實行的政治主張。在古代社會裏面空想的政治主張包含希臘柏拉圖的政治主張，中國的儒家哲學，印度的佛學，聖主耶穌的思想；而在近代裏面包含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學說，梁漱溟先生的哲人政治，和新近一些所謂開明人士所主張的專家政治或教授政治。這些空想的政治理論含有幾點特質：（1）他們相信倫理的、宗教的、和科學的知識是指導任何一人的實際行爲中心力量；因此，他們想以宗教的倫理的或科學的知識來改造社會上富人剝削貧人的關係。（2）在實行的方法上，他們特別相信教育的力量，或個人的修養是治國家而平天下的張本；把中山先生自己的話來說，就是「知難而行易」。把孔子的話來說，就是「朝聞道夕死可矣」。把柏拉圖的話來說，就是假令雅典和斯巴達皇帝可由哲學家來充任，共和國的理想必能實現。把佛陀的話來說，就是「一切衆生皆有佛性」，或「丟下屠刀，立地成佛」。把耶穌的話來說，就是「人披爾左頰你宜以右頰予之」，「人奪爾上衣你宜以內衣予之」。把梁漱溟先生的話來說，就是，且讓改造中國的全盤計劃都交由高明深睿的哲學家來担任。這一些傳統的論點，現在儘可不必再來抄錄他們的成語，才能明白他們的學說，因為這些學說都是借們所已經聽

得夠膩煩的了。現在我所要特別提出，並加以強調的，只有兩點：第一點就是，他們的政治理論在實際上都是永遠等於一張萬世不能兌現的空頭支票；第二點就是，他們應該對於在中國這個國度裏三番五次的重復其自己的虛偽的民主政治負責任。除非把這種空想的政治理論廓而清之，中國的民主政治永遠不會成功。

在討論這兩點前，我想插進一段話去，來表示我對這一些人的態度。我近來看見這一類型的空想的政治學者太多太多了。不問他們所說這類空想的政治理論是採用什麼樣的形態，只要一聽見他們的學說，我立刻便要對他們發生無限的厭惡。我覺得，凡說這一類話的人，他們要不就是一些大傻瓜，要不就是一些大壞蛋。何以說他們要不就是一些大傻瓜呢？即以我個人而論，也便曾是其中的傻瓜之一，並曾當了這類傻瓜若干年，所以我深切的知道這類傻人的傻氣。因為在千萬億兆人之中，連我們自己也放在其內，除開極少的例外，一個人絕不會，因為他的知識比別人強，便會自動的放棄他剝削貧民的特權來謀社會的公共利益。貓兒能夠因為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便自動的拔下他的爪牙，來給一羣小的老鼠謀利益麼？這不是一件很明顯的事情麼？在今日買辦階級之中，不是許多都是洋翰林麼？在官僚階級之中，不是許多都是教授麼？在豪紳之中，不是許多都是專家麼？我們沒有聽說他們會自動的放棄他們的剝削老百姓的權利，來為社會的大衆謀福利。為什麼不這樣做呢？這純粹不是因為他們的知識不充足，而是由於他們的政治的行動，大部不受他們的知識支配的原故。一言以蔽之曰：他們的行動在根本上只受他們的剝削的關係或資產支配。我們試一進而追問：為

什麼這些發國難財的大亨，不把他們在美國銀行的存款、南美的資產、加拿大的土地，來獻給國家呢？這豈是因為知識不足麼？我以為，他們的知識倒是足夠的，可惜的是他們的政治的行動不受他們的知識支配，而是受他們的主人、美國和美國而外的資產和土地等等財產關係支配呀！這還不是很明顯的事情麼？空想的政治學者不從他們的實際生活的周遭裏去找證據，倒在那裏蠢頭蠢腦地去談什麼人人都是有理性的學說，或知難而行的學說，這便是空想的。除赤裸裸的暴露他們是些大傻瓜外，這一類的相信什麼專家政治、哲人政治、領袖政治、少數政治、好人政治或教授政治的人物可以說是沒有絲毫的用處。所以我說，他們要不就是一些大傻瓜。可是我應在此補充一句，即他們雖是一些大傻瓜，但從其動機的性質上說，他們也許尚不失為一羣好好先生。

有些學者說，倫理的知識雖不是指導人生行為的中心力量，但科學的知識是。現在的世界豈不是整個都在受科學支配麼？他們可忘記了，在科學誕生之時，這位首先發明地動原理的科學家伽利略便是被宗教法庭宣佈死刑的。試問這些在宗教法庭當裁判官的人們，他們的行為是受科學知識支配麼？在科學已有長足進步的今天，現在無一不承認企業家們倘把自然科學上的新發明迅速應用於工業、使人類能以較少的勞動得到最大的享受，實是一件最合乎科學的原理的行動。可是在經濟恐慌、生產過剩、和利潤降低的場合下，資本家們深切感覺到連現存這點利用舊式的科學技術所生產的些微的財貨，都沒有銷路；所以，在上下大恐慌的時候，美國政府便一再強迫農人減少可耕的土地，全世界的橡皮公司便一再的以

人爲的方法限制橡皮的生產，巴西的國立咖啡局又一再的以若干萬噸的次等的咖啡傾瀉於大海；爲的是要減少供給，提高價格，他們連現存的供給都嫌過多，試問他們還能把自然科學上的新發明再度利用於工業、以圖增加生產降低價格麼？在獨占資本主義的時代，獨占的資本家往往把工業上的新發明的專利權買占了，自己不用它，但亦不許別人去用它。除非它的市場擴大了或舊機器用完了，他們纔把它來便利生產的增加。凡此都足表示當着科學的發明與資本的積疊發生衝突的時候，資本家爲了滿足資本的貪慾，他們絕不受科學的知識支配，但受他們的主人——資本支配。在十九世紀的時候，科學的知識雖然支配了資本家的活動，但這完全是由在自由競爭的時代、科學知識有助於資本蓄積的原故。我們知道，科學知識的進步須有賴於長期的和平；但爲什麼戰販們要打戰呢？這豈不是人不是受科學的知識支配麼？又如通貨過度的膨脹有害於工商業的發達，並可使中國僅有的科學家因饑餓而死滅，但爲什麼要膨脹通貨呢？這豈不也是科學不是支配人人的中心力量麼？……所以，這些空想的思想家們以爲倫理的知識雖不是支配人們的中心力量，但以爲科學的知識是的，這亦等於胡說。由此可見，說他們這些空論者羣只是一些大傻瓜，這確是一點也不錯的。

如果他們不是大傻瓜，便必然是些大壞蛋。因爲他們根本不相信知識是指導人生行爲的中心力量，但把『人人均可以爲好人』之說來作烟幕彈，把『知難行易』學說來作烟幕彈，把三民主義來作烟幕彈，把儒家哲學來作烟幕彈，可是在暗地裏，他們却乘着老百姓爲其烟幕所蒙蔽，對他們不曾積極的建築堅固的防線，於是他們便在那兒公開的或祕密的剝削老百姓。

姓。竊國大盜的袁世凱，不是曾經對國民宣誓他要遵守約法麼？但結果如何呀！崇拜武力的吳佩孚，不是也在民國十一年發表宣言他要實行民主麼？但結果如何呀！汪精衛、陳公博和周佛海不也說他們相信『知難行易』的學說麼？但他們的結果如何呀！他們心裏明明知道，支配人們實際行爲的中心力量不是知識，既非倫理的知識，亦非宗教的知識，亦非科學的知識，而是他們所鍾愛的直接的或間接的剝削人民大眾的財產關係。直接的財產關係是他們取得收益的方法——土地和資本。間接的財產關係是他們不惜以任何方法，幫助帝國主義者累積資本，幫助豪紳壟積資本，幫助土豪擴大私有土地的面積，來建立他們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以便剝削中國的勞苦的大眾。可是他們却要說他們是先知先覺，是三民主義的戰士，是些好人，叫老百姓服從他們，接受他們的領導。他們常常把槍來瞄準老百姓的胸口，說：『把你們的血液和腦汁都一齊貢獻給日本或我主，否則，我要你死！』在中國這一類的人極多。他們不是傻瓜，直是一些大騙子。

閒話休提，現在我們可以回到我們的本題了。第一點我所應強調的，即凡屬哲人政治、教授政治、專家政治、或好人政治一類的政治理論，必是一張永遠不能兌現的空頭支票。政治學上有一條公律，即一人如果在一方面具有無上的威權，在他方面，却沒有人民的權力來限制他，那麼，他便必濫用他的威權以自肥。我以為，好人政治實行的結果必定走到個人的獨裁，這點未必還不明顯罷？在經濟學上有條公律，即一人如果他的取得收益的方法是土地和資本，一言以蔽之曰，是私有的財產，那麼他的一切的實際的行動必要受他所私有的土地

和資本的支配。即如何保持他所私有的土地和資本或如何增殖它們。或如他的取得收益的方式是他們的政治的地位，而他們政治的地位又是由有產者階級所支持的，那麼，他的一切的政治的活動亦必要以保持和擴大他的主子們的土地與資本為職志。一切的崇高的理想，凡有害於土地與資本的保持和擴大者，他們要不便要誓死反對，否則便要陽奉陰違。這點也為人類億萬次的經驗所證明。空想的哲人政治必然相信凡有專門知識或聖賢修養的人都能依照正義和科學的指示以治國，可是，不幸，這些具有專門知識或聖賢修養的人，往往不是依靠勞力吃飯的人而是地主和資本家或是地主和資本家們所豢養出來的政治的鬥士；由是，他們在實際行動的時候便不受正義和科學的支配而係受土地和資本的關係支配。他們把正義和科學作幌子，在實際上，他們不但不是正義和科學的戰士，反而是正義和科學的敵人了。讀者試一回想，現在有許多的國民黨員，不是相信他們自己是先知先覺麼？是知難行易哲學的信徒麼？是三民主義的戰士麼？可是他們現在的結果如何呀！在他們內中，我們知道，濫權漁利、貪贓枉法，作出一切反三民主義的行為者不少。他們既也都是三民主義的信徒，屬於中國的先知先覺階級，為什麼他們要作出如此反三民主義的行為呢？我們的答案是，人在實際行為的時候，連「先知先覺」也包含在內，除開極少的例外，他們的實際行為絕對不受他們的知識支配而是受他們的取得收益的方式或財產關係支配。換句話說，就是他們的歷史的任務只在保存他們所私有的土地和資本。如果他們的資本是商品，那麼，他們的行動便不自覺的要囤積居奇。如果他們的資本是美鈔，他們便將販賣美貨或走私。如果他們的資本是官

階，那麼，他們便要貪污。如果他們的資本是美國銀行的現金存款，那麼，他們便要不斷的從事股票和債券的投機。三民主義於他們的實際的政治行動全然不起作用。

現在我要強調第二點了。即是好人政治主義實對中國的虛偽的民主主義擔負大部的責任。我覺着一個人是否能作民主主義的戰士，或三民主義的戰士，全然不受他們的意志決定，而是受他的直接的或間接的取得收益的方法決定。假如他的取得收益的方法是土地，那麼他必定要破壞平均地權。如果他的取得收益的方法是資本，他必然要破壞節制資本。如果他的取得收益的方法是貪污，他必然要破壞民權主義。如果他的取得收益的方法是作買辦，那麼他必然要破壞民族主義。可是他們的取得收益的方法或為土地，或為資本，或為買辦，或為貪官亦不受他個人的意志決定，而是受他的財產關係決定；自從母胎裏掉下來的時候起，他的財產關係便有了。因此他的實際政治的方向便決定了。一言以蔽之曰：假如他是反動派，他乃是客觀的物質條件所決定的反動派，而不是他的自由意志決定的反動派。在他方面，假如一個人他的取得收益的方法是勞動，他曾深受地主、資本家和他們的黨徒所壓迫，也就是說，他的財產的關係與民生主義不衝突，與民權主義不衝突，和與民族主義亦不衝突。除非他受了地主和資本家及其爪牙們的欺騙，他是不會反對民生主義、民權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沒落的小資產者亦然。在他們之中，如果受迫害的程度越深，那麼，他們的崇拜民族民權和民生主義的程度便越高。這即是說，一人的革命的性質，亦不是由他的自由意志支配，而是由他的勞動關係支配。用我的話來說，就是受他的取得收益的方法——勞動

支配。可是一人生下地來，他的勞動關係便確定了；他生下地來就有一種勞動關係如同他生下地來就有一種親屬關係一樣。所以說，一個人如果是一個革命者，那麼，他亦是由客觀的歷史條件所決定的革命者，而不是他的自由意志所決定的。

不用細說也知道，在中國沒有多少民族資本家，只有帝國主義者的資本家、買辦資本家和官僚資本家，此外便是地主，在政治上是代表他們的利益的奴僕。從人民的立場上說，他們在理論上和實際上都是或多或少的一羣刑事犯罪人。他們還能實行什麼三民主義麼？袁世凱實行了民主麼？曹錕實行了麼？段祺瑞實行了麼？……一言以蔽之曰：他們之不能實行民主亦不是由他們的自由意志，而是由他們取得收益的方法財產關係決定。在自由意志上他們都是三民主義者，可是他們之不能執行三民主義並且要破壞三民主義，自從他們從母胎裏墮下來時起便被他們的歷史關係全決定了。因此，他們不能成爲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的真正子孫。可是傳統的好人政治却信他們可作三民主義的子孫，這便是中國虛偽的民主主義一再重複他自己的錯誤的原因。

爲什麼我說這種虛偽的民主主義應由空想的政治理論負責呢？因爲空想的政治理論，不會大膽的聲言世上只有他們的取得收益的方式與三民主義不衝突的方才有資格實現三民主義；相反，它且公開的宣傳，凡在取得收益的方式上與三民主義相衝突的人亦能實行三民主義，只要他們的知識最高。由是便使三民主義得有爲他們的敵人用作反三民主義的機會。所以我說，中國的虛偽的民主主義應由空想的政治理論負部份的責任。

然則，出身於地主和買辦的家庭的兒子便不可以作民主主義的戰士麼？我的簡單的答覆是，除非他們放棄他們的財產關係，他們是不可以的。除非他們拒絕接受帝國主義者的資本家們的賄賂，是不可以的。除非他們所吶喊的是被剝削的勞苦大眾的呼聲，他們是不可以的。可是，話又說回來，如果他們敢於作他們的財產關係的叛徒，他們亦可以作民主主義的戰士。但這必須具備兩條件，即：他們必須以被壓迫的勞苦大眾的是非爲是非，並必須以勞苦大眾的理論爲理論，然後他們始能有真正的是非，和真正的理論。否則，他們縱令在口頭上是三民主義的信徒，但實際上則不過是些虛偽的民主主義扮演人而已！

社會科學呢？儒家哲學呢？

——答王維誠教授的論大學教育的使命——

除非閉着眼睛說瞎話，我以為今日的中國必須接受社會科學的指導，來從事中國的文化、政治的和經濟的建設，而不能墨守中國儒家的思想以建國。因為依照社會科學所指示的路線，中國立可得到進步，民主和康樂。依照儒家的哲學或大學所指示的路線，中國會將永遠的淪於保守、獨裁與貧乏。不幸中國的統治者和士大夫，生在五四運動而後的今天，還在提倡尊崇儒家思想以建國。前者往往把「大學」誤認成科學，即把大學上的格物致知，誤認為科學上的觀察與歸納，謬以為依照儒家的「大學」建國，便是依照科學建國了。後者則主張以儒家的哲學為體，科學為用。例如本年一月十一日大公報上王維誠教授所發表的論大學教育的使命，便是屬於後者這一類。他說，今日的大學應當以「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以為今日大學的旨趣。前者似忘記了一件極重要的事，即中國的儒家哲學不是社會科學，即「大學」不是科學。後者似忘記了中國如果依照儒家哲學以建國，中國會將永遠的得不到進步，民主和康樂，所得到的是思想上的一尊，政治上的獨裁和物質上的貧乏。

從文化的建設上說，儒家哲學的求知的方法是內省的，社會科學的求知的方法是外觀

的。固然「大學」與科學均講格物與致知。但「大學」所講的格物是格人欲，致知是致良知。科學所講的格物是察事物，致知是致實知。由前者的內省法所得到的知識只是存在人的內心裏面的良能與良知。他的性質是絕對的，直覺的和一尊的，即不容許有絲毫的錯誤存於其間，當用不着懷疑與批評。因此，在「大學」一書上絕無思想進步和思想自由的觀念。反之，由後者所用的外觀法而所得到的知識是相對的，分析的和嘗試的。在他裏面含有無限錯誤的機會。因此歡迎旁人的懷疑與批評。由是自由的討論便成了科學進步的最主要的部分。除非中國的文化不要進步，我以為中國的文化建設，必須捨棄這個否定進化的儒家的理論。

從政治的建設上說，中國的儒家所相信的政治是好人政治。這種思想的實際的效果不外兩條路，（一）黑暗的專制，（二）開明的獨裁。因為儒家相信世間實有全知與全善的哲學家皇帝存在，因而這種皇帝可以依照最高的道德和理智以治國。反之，社會的科學則根本否認這說法。在政治學上有一條公律是，任何一個人如果在一方面握有極大的威權，可是在他方面却沒有威權來給他以限制，他一定要濫用他的威權以自肥。近代的三權分立的學說和五權憲法的學說，無一不是從這個觀點出發。因此近代的政治學極力主張以人民的權力來監督政府。這種思想在實際政治上的效果，便是今日的民主政治了。除非中國的政治不要民主，我們必須放棄這個力主開明專制的儒家哲學作為政治建設的依據。

更從經濟的建設上說，近代的社會科學大膽的宣言，人生的思想與行為，主要的是受他

的財產的關係支配。地主是受他的土地關係支配，資本家是受他的資本關係支配，好像官僚是受他的官威支配，和虎豹的行動是受他們的爪牙支配一樣。除非被剝削的階級對之施以外的壓力，剝削的關係莫由消滅。因此近代的社會科學主張勞工問政或勞工專政。但中國的儒家的思想恰恰與此相反。他以為人的思想與行動主要的是受他的良心的制裁。只要正心誠意的功夫做得好，老虎亦可以自動的摧毀他自己的爪牙而與嬰兒作良友。何愁地主，資本家、官僚與買辦不會自動的放棄他們的武器呢？因而中國的儒者極力否認勞工團體起而干預政治的一類活動。因此儒家的哲學便成了歷代的剝削階層的護符。除非我們根本不要節制資本與平均地權，我們在經濟建設上，必須放棄這個根本否認勞工問政的儒家的理論。

我的綜合的結論是，居今日之中國，凡談中國的文化、政治和經濟的建設，而力主以儒家哲學作依據者，皆為有意的或無意的反對進化，擁護獨裁和阿諛剝削階層的人物。

三十六年二月一日於北京大學

再論社會科學與儒家哲學

——答王維誠教授對拙文的評判——

王維誠教授是中國研究儒家哲學的一位學者，我們已經是十幾年的朋友了。我在大公報一月二十四日所發表的題為「社會科學呢？儒家哲學呢？」一文中，故意插入一個小標題「答王維誠教授的大學教育的使命」，主要的是想鉤引他對我的意見的批評。果然不出我所料，他的批評已在三月三日大公報上「從儒家哲學說起」的一文裏，很詳盡的發表出來了。我本想在他的評判裏得到教益，所以把他的宏文仔細的讀了數遍。不幸，結果出於意外，維誠教授對於實際的世界確是知道得太少了，而且含有許多出奴入主的褊狹的見解，致使他的評判毫無意義。他不但不足以否定我的見解，而且倒否定了他對儒家哲學的辯護。細想起來，實也好笑。

(一)我說，儒家哲學的求知方法是內省的，社會科學的求知方法是外觀的。……由前者所得來的知識只是存在人的內心裏的良能與良知。他的性質是絕對的，直覺的和一尊的。絕不容許有絲毫的錯誤存於其間，當用不着懷疑與批評。因此，在大學一書上，絕無思想自由和思想進化的觀念。」王說，不然，在大學裏也含得有思想進化和思想自由的觀念在其內。這是我們兩人的意見根本不同的地方。

我以為儒家的哲學是否含有進化的觀念，須要看他是否明白表示或暗中隱含，他的學說只是暫時的或條件的。條件的意思是說，他的這種學說的樹立，必是以某種事實的存在為條件。假令這種事實不存在了，那末，他的結論便取消了。暫時的意思是說，他的結論的樹立是由他現在所知道的事實必是全部的事實。假使他現在所知道的事實不是事實的全部，那末，他的結論便當修正。王維誠教授在反駁我的意見的時候，雖然一再的說，大學說：「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作新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克明德」，「克明峻德，皆自明也」，便是儒家的哲學含有思想自由的意思。但因他不能證明儒家的哲學裏含有條件的或暫時的意義在其內，因此，他說在儒家哲學裏含有思想自由的觀念，簡直等於閉着眼睛說瞎話。他倒迷信他有，可是他沒有呀！反之，他所引的這些例證，倒證明了我的見解是正確的。我說，「大學與科學均講格物與致知，但大學所講的格物是格人欲，致知是致良知。」維誠教授所說，「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作新民」……和「克明德」等，除非閉着眼睛說瞎話，我以為他們都只表示儒家的致良知的功夫。這證實了我的評判絲毫不錯。即在大學一書上，絕無思想自由的觀念。

我說，「社會科學的求知方法是外觀的。」維誠教授說，「社會科學的求知方法亦並非只是外觀的。因為單有社會調查與統計，不能成為全部社會科學。」驟看起來，似有理由，實則在根本上是錯誤的。社會科學固然也講省察，但他所講的省察，不是省內，而是省外。不是省察在內心裏所存在的東西，而是省察他所觀察的事實和事實與事實之間的關係是否正

確。他並不是要把內心裏的東西省察出來，如像維誠教授所相信的「萬物皆備於我也，反躬而誠，德莫大焉」呀！社會科學所講的省察既與儒家哲學所講的內省，在本質上不是同物，足證我的意見，即社會科學的求知方法是外觀的完全是正確的。

維誠教授又說：「儒家哲學的求知方法也是外觀的」。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就是外觀的求知方法。「但一學」果是外觀的求知方法麼？假令維誠教授的說法不錯，那末，這位常被孔子所稱為好學的大弟子，顏回，必是社會調查和統計的專家了，可是，在事實上孔子之稱顏回好學，並非因為他能用外觀的方法以求知，而是因為他的內省功夫作的好，所以他纔能夠「不遷怒不貳過」。單此一例，已足證明儒家哲學所謂「一學」根本不是外觀的。但現在我們所要問的即在儒家的哲學裏，難道就絲毫不用觀察麼？維誠教授一定不承認，因為儒者也是生得有眼睛的呀！但我們應該強調的，即儒家哲學與社會科學雖然均用觀察，但儒家哲學所用的觀察，在本質上與社會科學所用的觀察不是同的。儒家哲學所用的觀察，嚴格的說，不是外觀，而是內觀。外觀是觀察外界的事實和事實的關係在外界是否存在。內觀是觀察人的內心裏存在的良知與良能的表現是否充足或是否為物欲所蒙蔽。內觀是觀察內心裏面的東西在外界的表現，外觀是觀察外界的東西在外界的表現。儒家所用的觀察只是內觀而非外觀，所以儒家的求知的方法在本質上完全是內省的。維誠教授說，「一學」就是儒者的外觀的求知方法，可見全是錯誤。

維誠教授說，「儒家哲學的求知方法即是內省的亦不足為病。」我看這病大的很啊！最

顯著的就是爲了維持舊禮教不惜與新社會爲敵。因爲維持舊禮教的人必須這樣做，才覺與他們由內省法所發現的「良知良能」不相違背，這個禍害還不大麼？

(二) 我說，「中國的儒家所相信的政治是好人的政治。這種思想的結果不外兩條路：(1) 黑暗的專制，(2) 開明的獨裁。因爲儒家相信世間實有全知與全善的哲學家皇帝存在，因而這種皇帝可以依照最高的道德和理智以治國。」維誠教授說，不然。儒家哲學亦非不要民主。孟子說：「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孔子說：「去兵」「去食」「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孔子所謂「均」是均之於民，所謂「安」是求民之安。這些話皆是以民爲貴的意思。但誰來均之於民呢？又誰來求民之安呢？民主的政治是人民自己來均民之貧，自己來求民之安。所以是民主。儒家的政治是皇帝來均民貧和皇帝來求民安。所以最多只是開明的專制了。民主的政治在英文是 Government by the people。但儒家的政治是 Government for the people。維誠教授把 by 和 for 都弄不清楚，莫怪他要硬着面皮，指鹿爲馬了。

(三) 我說「近代的社會科學大胆的宣言，人生的思想與行爲主要的是受他的財產關係支配，但中國的儒家思想恰恰與此相反。他以爲人的思想與行爲主要的是受他的良心的制裁。維誠教授說，不然。人的思想與行爲主要的是受他的良心的制裁。人有良心沒有？我試問的答覆這個問題說，人是有良心的。但人生的行爲主要的不受他的良心的制裁，乃是世上有目共觀的事情。憑良心，在街上的流浪兒童有的是天才，你和我最多也不過是中才而

已。憑良心，天才應當受教育，中才不應該，但我們這批中才受教育了。憑良心，最精美的食品應該送給對日抗戰的士兵，我們簡直該餓死。但我們沒餓死，他們却有的餓死了。憑良心，哲學家應當做皇帝，但蘇格拉底被毒死。憑良心，宗教家應該受王位，但耶穌却被人釘死在十字架上。憑良心，投機致富的奸商，應該受懲戒，但結果反而當宰相。歷史的事實一幕一幕的把罪惡像影片一樣的擺在我們的面前說，良心雖是人人所同有，但除非與他的財產關係的保持和擴大相一致，人在他的實際的思想與行動上，也都不受他的良心的支配。講哲學的人如果忽略這一點，簡直等於是一位耳聾眼瞎的廢人一個，對於社會沒有好處。

然則人生的實際的思想與行為，便一點也不受他的良心制裁麼？是又不然。在有時候也是有的。那個時候有呢？在與他財產的關係相一致的時候，便是有的。所以現在社會主義的戰士無人沒有從他的心坎裏喊出正義的呼聲。但這些是些什麼人呢？內中百分之九十都是靠勞心或勞力以為生的階級。富裕的階級不是沒有，有則要不是太多了，要不是便是說空話，他自己決不照着正義所指示的路徑做。老虎能夠自動的拔去他自己的爪牙來與嬰兒作朋友麼？這不過只是一種幻想而已。由此可見，除非被剝削的階級起而對剝削的階級施以適當的壓力，節制資本與平均地權的學說似乎無從實現。

儒家哲學已經倒了，並且繼續在墜落。縱有維誠教授給他作支柱，除了把他自己毀了外，恐怕亦無多大的用處。還有一點我必須更要特別強調的。即一個學哲學的人應該具備兩條件：（1）廣博的社會科學的智識甚至自然科學的智識，（2）謹嚴的漢學家的訓詁的態

度。維誠教授把儒家的「貴民」看做「民治」，把儒家的「學」看做科學的「外觀」，把良心看做支配人羣的中心勢力，把駱駝看做馬腫背，這都表示他對上述二條件沒有充分的具備。除非把這種狹隘的態度加以全部的糾正，在哲學上必無偉大的貢獻。但是，我也應該坦白的說，我對儒家哲學知道不多，社會科學更是粗窺門徑。世有精通科學和儒家哲學者尙希有以教我。



從「知難行易」學說的批判說到國民黨今後的出路

現在中國竟有不少的哲學家，知識青年，和國民黨黨員的大部，都一致相信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的學說，是一種革命的哲學。並且以為自從民國成立以來，中國革命失敗的原因，完全是由中國的朝野上下，特別的是國民黨的黨員，不知「知難行易」的學說使然。北大賀麟教授，在他的「當代中國哲學」裏，亦曾有同樣的見解。他說，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的學說的目的，在掃蕩幾千年來深印人心的畏難苟安的積習，破除知而不行的偷惰的心理，同時並鼓舞力行的勇氣，求知的決心，恢復民族自信心，展開民族前途的希望，指示我們的新文化應循科學化、工業化、民主化、社會化的途徑邁進。

反過來說，就是中國的新文化，今日之所以不曾真正的向着科學化、工業化、民主化、社會化的途徑邁進，主要的是由大家不明白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的哲學的原故。我不否認上述的見解含有部份的真理存在。但我以為中山先生的知難而行易的學說，在他的主要意義的範圍內，不但不是一種有助於革命的哲學，而且含有極大的危害革命的玄想的成份在其內。除非將這玄想的成份加以破除和掃蕩，我以為中國革命的前途必定無望。

只要我們不是存心騙自己，我們必定不會否認這一顯著的歷史公律：即在人類社會生活範圍內，根本沒有所謂全知全能的偉大人格存在。而且越是偉大的人物，其所犯的錯誤往往

亦越是偉大的。舉例來說，德國耶拉大學的黑格爾大師，該是世界上最大的哲學家了。但他在政治哲學上，却認為普魯士的專制的政體，乃是人類自從有史以來，最高無上的一種典型的政體。這當然是一種極荒謬的見解。又如英國劍橋大學的物理學大家牛頓，該是世界上最大的科學家了。但他在光學上的意見，竟阻撓了近代光學的進步幾約半世紀。從近代人物的眼光看來，當亦不能說他的光學見解是正確的了。這種同類的例子，在郭任遠教授所作的「最大的科學家所犯最大的錯誤」一文裏，搜集的材料極多。為減少人類歷史上偉大錯誤的重演計，儘管我們都是中山先生的學生，但我們對於他的知難行易學說的正確與否依舊要加以檢討。我們的態度是，如用蘇格拉底的用語來表示，「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

我以為，在中山的知難行易學說內，含有兩種冰炭不容的見解。其一是合理的和革命的。又其一是不合理的和反革命的。前一種是說，知道或發現行爲的原因比較行爲自身更困難。後一種是說知識是支配人生行爲的中心勢力，因此，知難行易的哲學便是支配人生行爲的中心勢力了。在這兩種見解之中，中山所着重的是第二種。但可惜中國這幾位有名的學者如胡適大師，馮友蘭教授，賀麟教授和傅銅博士所反覆討論的，只是中山的第一種見解。這不能說不是一種缺憾了。為補足這個缺憾起見，我願大胆的對於中山的知難行易學說中的第二種意義，加以分析和評判。

關於知難行易學說的第一種見解，我以為只須幾句話便可說明白，實無須以益篇累牘的洋洋洒洒的宏文巨論，來反復的推敲和辯論。中山先生在他所舉的各種例子之中，曾經一再

明白的說，知道行爲的原因實在比較知道行爲自己更困難，反之，知道行爲自身實比知道行爲的原因更容易。因爲任何行爲自身在任何一人的知識經驗內，如飲食、用錢、作文、建屋、造船、築城、開河、使用無線電和作豆腐各事，中山在舉例的時候便假定他們是屬於人類已經知道的事情。反之，行爲的原因，如食物化學、貨幣原理、文法學、建築學、造船學、土木工程學、電磁學、和有機化學，中山先生在舉例的時候，便假定他們是屬於人類未知的事情。在事實上，未經知道的事情，當然比已經知道的事情困難。反之，已經知道的事情當然比未經知道的事情容易。由此可見，知難而行易的學說的第一種解釋幾是一種自明的公律。它不外是說，未經知道的行爲的原因實比已經知道的行爲自身更困難；反之，已經知道的行爲自身實比未經知道的行爲的原因更容易，這種解釋千真萬確，自足於內，毋待於外。縱有胡適大師，傅銅博士，和馮友蘭教授的反駁，和賀麟教授的守衛與發揚，當亦不能增減它的真實價值一絲毫。這是我不能討論這一部份的見解的理由。

關於知難行易學說的第二種見解，即知識是支配人生行爲的中心勢力，因此，知難而行易的學說便是支配人生行爲的中心勢力了。我以為這可是一個驟看極難，細想極易解答的大問題。知識果是支配人生行爲的中心勢力嗎？中山先生毫不遲疑的答覆這個問題說，是的。且看他說：

當革命破壞告成之際，建設發端之始，余乃不禁興高采烈，欲以予生平之抱負，與積年研究之所得，定爲建國計劃，舉而行之，以冀一躍而登中國於富強隆盛之地焉。乃

有難予者曰，先生之志，高矣遠矣；先生之策，闕矣深矣。其奈知之非艱，行之維艱何？予初聞是言也，爲之惶然若失。蓋行之維艱一說，吾心亦信而無疑，以爲古人不我欺也。繼思有以打破此難關，以達吾建設之目的。於是以陽明知行合一之說，以勵同人。惟久而久之，終覺奮勉之氣，不勝畏難之心，舉國趨勢皆如是也。予乃廢然而返，專從事於知易行難一問題，以研究其究竟。幾費歲月，始恍然悟於古之所傳今人之所信者，實似是而非也。乃爲之豁然有得，欣然而喜，知中國向來之不振者，非坐於不能行也，實坐於不能知也，及其既知之而又不行者，則誤於以知爲易，以行爲難也。倘能證明知非易而行非難也，使中國人無所畏而樂於行，則中國之事大可爲矣。

由此可見，中山先生蓋真以爲自從民國成立以來，中國建設事業之不行，係由國人不知知難行易之真理使然。倘能知之，則中國之「建設事業，亦不過反掌折枝耳。」亦就是說，知難行易之學說是推動國家建設的中心勢力。昔日建設事業之不進行，或革命之所以尙未成功，係由國人不知知難行易的真理。今後之建設事業必定成功，是因知難行易之真理，已爲先生所發明，並爲大衆所領悟。故今後建設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樂之國家，其成功必較革命之破壞事業尤速尤易。依據中山先生的分析，國民今日之未能切實實行三民主義，主要的是由他們不知三民主義足以適應世界之潮流，而謂「予之理想太高，不適中國之用」。「及其既知而又不行者」則又係由爲「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之說所奴，而視吾策爲空言，遂放棄建設之責任」。今舊說既除，大敵已破，國人必將依據知難行易學說的指導，萬衆一心，疾

起直追，以最快之速度將中國建設而爲一爲民所有、爲民所治、並爲民所享的三民主義的國家。回憶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之說，係脫稿於民國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在民國七年以前，中國未覩建設事業之進行，我們固可以有理由說，這是由於傳說的知易行難之說，在與中山的建設事業爲敵。但自民國七年以來，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之說已成，它不但已成爲國民黨的共同的信仰，並且得到了美國的實證主義大師杜威博士的印證，北大哲學系賀麟教授的發揚，和國民黨總裁蔣中正先生的推進，並得到了國民黨內外的三民主義同志的竭誠擁護，宜乎中國之建設事業，會依照知難行易學說和三民主義所指示的途徑，並以最快之速度，將中國化爲一富強康樂的民治、民有、民享的三民主義的國家了。可是，現在怎麼樣呢？它是否比較民國七年更要紊亂呢？假令中山先生的革命的英靈，肯從天國祥雲的開處，以聖潔之光，照射塵寰，一觀今日中國之貪污氣氛，殘酷內亂，和今日的國民經濟的整個崩潰下的饑饉、流亡、與貧乏，再回顧他的知難行易的學說所應有的理論的效果，我想這位慈祥誠懇的老人，一定要痛哭零涕的說：「我的理論是徒然的！」我看，歷史上沒有一種哲學，有比中山的知難行易的政治哲學，在鐵打的事實面前，被粉碎得更無救的。

從社會經濟的觀點看來，人的實際的行爲，在根本上，不受他所崇拜的理想或知識支配。他既不受傳說的知易行難的學說支配，亦不受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的學說支配，而係受他的直接取得收益的方法，資本、土地、或勞動支配；或間接的取得收益的方法，如貪污、買辦、諂媚統治者階級和帝國主義的行爲支配。我的意思是說，人在實際生活的時候，無論

他所崇拜的是什麼美妙的主義，他於不知不覺之中，都要把這個主義來與他的取得收益的方法配一配。如果這種主義，對於他的取得收益的方法的保持和擴大是有幫助的，他便要用它。沒有幫助，他便不用。如果它是有害於它的維持與發展的，他便要怪它、恨它、欺它、侮它、甚至要戕害它，至少他也要對它施展一點陽奉而陰違的手段了。同時對於創造並力行這種主義的人，不問你是蘇格拉底或柏拉圖，耶穌或孔子，馬克思或孫中山，假令你在力行主義的時候，與他的取得收益的方法的維持與發展有幫助，它便要認你為他的很忠順的奴僕或領袖。反之，如果你在實行主義之時，與他的取得收益的方法有妨礙，無論你是他的父親或兒子，丈人或女婿，他都要對你毫不客氣了。願拘則拘，願打則打，願宰則宰。至少，他也要對你貌似誠懇而心則極狠毒了。歷代古先聖賢的學說之所以不能實行，原因在此。

以中山的三民主義來說，第一、在民生主義裏面，他的主要的目的便是要節制資本與平均地權。這種目的如實現，直接的與大地主和大資本家的憑以取得地租利息和利潤的方法土地與資本的積聚相衝突，當然地主和大資本家為圖保持和擴大他們的取得收益的方法土地和資本計，勢必便要被迫而與民生主義為大敵。第二、在他的民權主義裏面，中山極力主張以人民的權力來監督政府。這種思想在實際政治上的效果，便是要肅清中國的官僚階級。用具體的話來說，就是要肅清政治上的貪官污吏。除非官僚階級是傻子，他們為了實現他們的陞官發財的目的，當然亦必起而與民權主義為大敵。第三、在民族主義裏面，中山力言中國要為中國的人民所有。對外有打倒帝國主義的侵略，對內要肅清中國的買辦的階級。此

時，買辦階級與帝國主義，爲了維持和擴大他們的剝削殖民地的利益的侵略關係起見，當然他們亦將被迫而與民族主義爲敵了。由此以言，中山主義的最大的敵人，乃是在他們的財產關係上，與中山主義立於對立地位的大地主，被節制的大資本案，特別的是官僚、軍閥、買辦、帝國主義和他們的同路人等輩。爲力圖革命之成功計，我以爲中山先生當年似乎應當排除在財產關係上與中山主義立於對立地位的敵人，結合在財產關係上與中山主義站在同一戰線上的同志或同道，以爲建設三民主義國家的基石。最可引爲不幸的，即中山先生在他的革命事業受阻之際，在尋求革命失敗的原因上，竟不知道阻礙他的革命事業的敵人，是那些在財產關係上，與他的主義立於對立地位的假革命黨人或反革命的羣狗。但認爲阻礙他的革命工作的最大的敵人，是在財產關係上與他的革命事業毫不相干的傳說的知易行難的學說。且看他說。

嗚呼，此說者，予生平之最大敵也。其威力當百倍於滿清。夫滿清之威力，不過祇能殺吾人之身耳，而不能奪吾人之志也。乃此敵之威力，則不惟能奪吾人之志，且足以迷億兆人之心也。是故滿清之世，予之主張革命也，猶能日起有功，進行不已。惟自民國成立之日，則予之主張建設，反致半籌莫展，一敗塗地。吾三十年來，精誠無間之心，幾爲之冰消瓦解，百折不回之志，幾爲之槁木死灰者，此也。可畏哉此敵！可恨哉此敵！

中山先生既認爲傳說的知易行難之說，纔是他的敵人，當然，他不認爲國民黨內外的士

豪、劣紳、貪官、污吏、奸商、買辦、和帝國主義的爪牙與其同志，是他的敵人了。在他方面，中山先生既認爲知難行易之說，纔是他的救星，他勢必要放棄，在取得收益方法的關係上，去尋找三民主義的真正的同志的企圖了。最可引爲不幸的，這些三民主義的真正的敵人，因爲中山先生的不注意，也都先後滲入了中山先生的革命大本營中，然而中山先生却又鮮有真正同志作戰士，莫怪他的理想會失敗了。

回想中山先生的革命目的，依據國民黨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乃在「對外打倒帝國主義。對內打倒一切帝國主義的工具，首爲軍閥；次爲官僚；土豪買辦階級。其必要之手段，一曰造成人民之軍隊，二曰造成廉潔之政府，三曰提倡保護國內新興工業，四曰保障農工團體扶植其發展。」但因中山先生與其同志在實行革命的時候，相信知難行易之說，以爲知識是支配人生行爲的中心勢力，一開始便向帝國主義者，並其工具，軍閥、官僚、土豪、買辦階級宣傳說，「你們昔日之爲帝國主義者的工具，和軍閥、官僚、土豪、買辦，均是由於你們不知信仰三民主義並知難行易學說。假令你們知道了，你們立將自發的不復再作帝國主義者的工具……和買辦了。」帝國主義者的工具……與買辦們，眼見革命勢力之不可以力拚，然知能以智取，於是盡皆立即粉墨登場，搖身一變，變作無量無限之三民主義信徒和知難行易學說的戰士，一一請求入黨。革命黨人因爲他們的革命對象都入黨了，或感化了，遂以爲他們的革命成功了。焉知入黨之後，他們因爲既得權利的關係，祕密聯合起見，採取極卑污和極陰險的手段，竊取政權。或爲部長或爲秘書，或爲參謀，或爲長官，……

：在表面上，他們還是三民主義的戰士，可是他們在暗地裏，爲鞏固他們的既得利益與權利計，幾乎無時無地不在破壞三民主義。積年累月之後，他們深知他們自己的羽翼已豐，實力雄厚，竟敢公開行劫，爲所欲爲，其爲軍閥、官僚、土豪、與買辦也，更且甚於往昔。黨在這種組織之下，革命目的萬難實現。

回憶中國自從往古以來，社會上直接取得收益的最主要的工具，只是土地。他如資本與勞動，始終立在被動的地位。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之後，雖有些微的民族資本的積聚，但自巴黎和約簽字之後，不久便萎縮了。在海禁既開之後，除了土地之外，另有一種較重要的取得收益的新興的方法，就是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直接投資和買辦資本。在海禁未開以前，中國的政治和法律，哲學與宗教，只在便利土地所有權的維持和擴大。但在海禁既開之後，中國的政治和法律，除了土地之外，尚須便利外資和買辦資本的積聚。在海禁未開以前，中國的官僚階級是與地主階層的利益相一致的。在海禁既開之後，在中國官僚之中，加入了一批留學生去作新官僚，他們的利益乃是與帝國主義者和買辦階級的利益相一致的。兩者均不需要民主政治。這是中國的民主政治遲來的原因。同時也是中國的官僚政治，保持不墜的原因了。在辛亥革命的前後，與民主政治有生死存亡的關係的，主要的是那些打算前來發開中國的華僑中的資本家階級。這些華僑資本家，雖係民生主義的障礙物，但他們却是推動中國民主勢力的主力。此外便是中國的進步的小資產階級和進步的被壓迫的工人與進步的農民了。國民黨假如及早便死心踏地的與這些人聯合在一起，而與其他的反民主的因素

相決鬥，給中國新興的資本家掙扎一條光明的道路，未始不易成功。無如當時孫中山先生，在他的思想裏，含有不少中國儒家思想中腐朽的成份，是即好人政治的哲學，誤以為儘管在取得收益的方法與民主主義立於正相反對的人物，均可以實行民主政治，只要他們肯向民權主義宣誓。莫怪他們後來要叛黨了。

假如今日全中國的國民並國民黨，認為三民主義必須付諸實行，始足以臻中國於富強，那末我便敢斷言，今日的國民黨的機構，在理論上，絕非實現三民主義的工具。國民黨的偉大領袖孫中山先生，是即我所最崇拜的全中國的精神之父，因受他的知難行易之說所蒙蔽，其實是整個儒家哲學的蒙蔽，誤信食人無厭的豺狼與虎豹亦可受知難行易學說的感召，自動的拔去他們的牙爪，而與國民黨的主義共生死；致將無限量的官僚、軍閥、土豪、買辦介入國民黨中作同志，並各分據要津，已使三民主義的實現陷於不可能狀態。除非國民黨的真正同志通通死了。我以為，他們為了保持國民黨的光榮歷史計，早遲必將國民黨重新改組。現在我以第三者的地位，希望他們改組的時候，不要重蹈過去的錯誤。再從一個人的空洞信仰上，去判別此人對於三民主義的仇友的關係；但從他的取得收益的方法上去判別他。讓敵人滾開，讓同志回來，並對敵人施以相當的壓力，重新掌握政權，見兔顧犬不晚，亡羊補牢不遲，在消極的方面繼續與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為敵；在積極的方面並繼續領導全中國的進步的小資產階級和勞苦大眾，以追加的速度，將中國建設而為一為民所有，為民所治，並為民所享之三民主義共和國。假令這個目的達不到，縱令內戰成功，並且縱令青年、民社兩黨可

與國民黨永久的合作，除非中國不進步，國民黨終必要為時代進化的浪潮所粉碎。



孫中山與馬克思

我今天所要說明的有兩點：第一點我所要說的，就是中國政治史上這位空前未有的偉大的政治領袖孫中山先生，無論在道德的修養上，在求知的努力上，和在革命的領導上，均不在馬克思之下，或至少，亦不在馬克思之下。第二點我所要說的，就是可惜在中山先生的社會哲學裏含有空想的成份，或缺少科學根據的成份，或傳統的儒家哲學的成份；但在馬克思學說裏沒有。這便是中山先生不如馬克思的地方。同時這亦就是中國的國民黨，自中山逝世而後，越是近來越是露骨的表现着他們不能實現三民主義的原因。同時也就是馬克思的主義，自馬克思逝世而後，得在共產黨手裏，逐步付諸實施的原因了。但我所要特別聲明的，即中山先生的政治的理論，雖然含有空想的成份，但這並不妨礙孫中山先生，在個人的修養上，在求知的努力上，和在革命的領導上，仍為中國革命最偉大的一個導師。

我衷心的相信，孫中山先生的修養的工夫是很偉大的。我以為中山先生的慈愛與和平的性格，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都是很難有的。我在重慶時，偶爾碰着一位曾經追隨中山四十年的老秘書連先生。他從中山革命時起直到中山逝世為止，都與中山先生在一塊，幾乎可說是寸步難離的。我當時向他訪問究竟中山先生賦有什麼為人所景仰的獨特的性格。我對他說：「我所要打聽的只是中山先生的獨特的性格」。這位老秘書毫不遲疑的告訴我說：「我

追隨中山恁多年，我覺着中山先生有一點最難得的修養，就是他在革命這四十年中，從未向他的同志發過一次的脾氣。他每遇着同志有錯誤時，總是以一種溫和而諒解的態度指教他們，好像一位先生指教他的學生一樣。」是的，不錯。連老先生這一段話確是對的。因為國民黨的老同志，據我所知道的，幾乎無一不是稱呼中山為「先生」。他們覺得他們是學生，中山是他們的「先生」。由此可以證明這位連老秘書的話是不錯的。我敢大膽的說，中山先生的性格確是中國東方文化的結晶。我們知道，東方的神是不怒的。在我們東方，就是四大天王這般兇猛的神像，亦是不發怒的。因為他們手裏，不是每位都還在彈琴不是？可是，西方人所崇拜的神是兩樣的。即以上帝而論，你看上帝在執行最後裁判的時候，他竟是何等的發怒啊！可是中山先生不怒，這足表示中山先生的慈愛與和平，確乎是備有了東方人最崇拜的神的性格。所以我說，中山先生修養的工夫確是東方文化的結晶。佛陀說：「任何一位只能在劍拔弩張的陣地上，戰勝億萬武士的英雄，不算真正的英雄，惟有在日常生活道路上，能夠戰勝他自己的易怒的感情的，方纔算是英雄。」這即是說，戰勝敵人容易，戰勝自己困難。中山先生能夠戰勝他自己，這確是很不容易的啊！在這一點上，我以為中山先生的修養，至少，亦當不在馬克思之下。

再從求知的努力上說，中山亦不在馬克思之下。馬克思在求知上是很努力的。他在大學畢業而後，僅有一個短短的時期，全力領導革命。以後，他便埋頭在大英博物院的圖書館裏研究去了。一直研究了三十餘年，直到他死為止。在這三十年中，雖然間亦參加實際的社會

主義運動，但這只是限於演講與集會，而且次數少得很。他的最主要的工作，還是求知。在他資本論第二版的序言中，他說：「我的格言是，不管別人怎麼說，我還是走我自己的路。」孫中山先生亦然。他不但在學生時代求知的慾望很強烈，在革命時代亦然。甚至在戰場上指揮士兵的時候，只要指揮一定，他便要看書的。這種鎮定的工夫，說來幾乎難以令人置信。但這確是真的。民國九年時，他老人家在上海寓所裏，草擬實業計畫。每擬一稿完畢，他都要找幾個人去批評和討論，以便重新修正。在他的小小的討論會中，有蔣夢麟先生、余日章先生、……陶孟和先生。據陶孟和先生告訴我，他記得有一次去拜訪中山先生了。他看着在中山先生的寫字檯上，放着幾本由中山已經看過的關於社會科學方面的新書。可是這幾本新書，正是他纔把牠們的題目寫在日記上，準備去買但還沒有買到的書籍。這已經足使他驚訝了。因為陶先生是最愛讀書的。可是待他定睛一看，忽又發現在他的寫字檯下，還有一箱剛打開的新書，約有三四十冊。陶先生於是對他自己說：「像這樣買書是不得了的！」這類故事極多。據說，有一次王正廷先生到廣東去與中山先生論外交，中山在談論中國的外交時，曾經舉出了七八十種的書籍，有許多都是王正廷先生所還未看到的。實則中山先生也是很幸運，平均說起來，他每年幾乎要費戰前的貨幣五千元，來置購新書的。所以我說，中山先生的求知的努力，至少，亦可與馬克思想匹敵，並值得我們青年人去效法。

再從革命的領導上說，中山先生在最初革命的時候，可以說中國的革命只是中山先生一

人的革命。以後因取得了另外三個人的信任，結果中國的革命方纔變成中山先生等四人的革命。這四個人便是在中國革命史上，有名的廣東四大強盜了。那時清政府曾經懸賞緝捕這位革命大盜孫中山先生，即誰能捕海賊孫文者賞洋二十兩銀子。他這代價，比起今日的革命大土匪頭毛澤東來要差遠了。可是經過三十餘年的繼續革命的努力，中山因得全中國人民的擁護，在最初的一次，便把滿清政府推倒了，第二次把袁世凱打倒，第三次把吳佩孚打倒，並且越是到晚年來，他的革命的態度愈堅決，革命的行動愈進步。這從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時中山首創聯俄，容共，並農工三大政策一起更明白了。因為中山到晚年來，看見俄國革命成功，他的革命比俄國早，但俄國早成功了，他沒成功。他心裏急了，為加速革命的成功時刻，於是便力圖在國民黨中注入新鮮的血液。恰好當時第三國際的東方的政策伸展到中國，得到了中國的學者、青年、並近代工人與農民的擁護，組成了中國共產黨和共產主義青年團兩大革命的組織。中山眼看着這兩個偉大的組織勃勃有革命的生氣，心中高興得發狂起來，於是立即伸出他的一隻革命巨人的偉大的鐵臂，把他們擁抱過來，結果這兩個革命的團體，便欣然的投入中山的革命的懷抱。中國國民黨自經中共加入而後，猶如一枝已經開過若干次的花，忽又長發嫩根，開放起來，致使中國的國民黨在革命的前綫上又再推進一步。這都足以表示中山先生的偉大的領導革命的意志與能力。在這一點上，我亦覺着中山先生的革命的天才，至少，當亦不在馬克思之下。列寧曾說，中山先生是一個最偉大的政治家，他的偉大的政治的才器，絕非英美任何一位政治家所能比擬的。列寧這一句話，道破了中山的偉

大的革命才器的祕密，即英美現代的政治家，不過只是一些太平時代的宰相，而中山這位政治家，乃是一位革命時代的英雄。當然中山先生的政治的天才，比起英美的政治領袖來，是最偉大的了。

可是現在我所要討論的，即爲什麼中山的三民主義自中山逝世而後，不能在中山所手創的國民黨手裏付諸實施，然而馬克思主義，在馬克思逝世而後，則能在共產黨手裏，一步靠緊一步的，依序實現呢？上文曾說，這是由於在中山主義裏面含有空想的成份。但在馬克思的學說裏是沒有的。試問這個空想的成份是什麼呢？

我曾經在世紀評論第一卷第二十二期「從知難行易學說的評判說到國民黨今後的出路」一文裏，明白指出，在中山先生學說裏所含容的空想的成份就是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的學說。現在我所要補充的，即不但在知難行易的學說裏含有空想的成份，在三民主義裏也含有一種空想，並在建國方略裏亦含有一種空想。由是而空想的主義便貫串了中山的整個政治思想的全部。這個最壞的效果是，中山的主義便成了一種好聽的名詞，而無實現的可能。我特別指出中山主義這一個缺陷，並不是說，中山學說的全部都是一種空論。我的意思只是說在中山的學說裏，雖含有若干科學的成份，但亦含有若干空想的成份。我所不滿意的只是不滿意他的空想的成份，而不是他的科學的成份。又中山先生在政治的思想上，雖然含有若干空想的成份，但他在實際的革命領導上，越是靠近晚年他的科學的性質越強，空想的性質越少。所以中山先生在革命領導上仍不失爲最偉大的導師。現在請讓我從知難行易的學說的空

想成份起。

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的學說劈首假定知識是指導人生行爲的中心的力量。但知識是指導人生行爲的中心力量麼？我在抗戰以前，一直便在對於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的學說開始懷疑。直到現在時起，我敢斷言的說，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的學說確乎是錯誤的。我從億萬人的億萬次的經驗證明，知識，平均說起來，或大多數的人在大多數的時間內，確乎不是支配人生行爲的中心的力量。只有人的取得收益的方法或手段，纔是支配人生行爲的中心力量。舉例來說，假令一個人的取得收益的方式是土地，那麼，他的一切行動的方向便在維持他所私有的土地和擴充他所私有的土地的面積。如果他的取得收益的方式是資本，那末，他的一切行爲的方向便在維持他的資本，和彙集他的資本了。平均說起來，一個人的知識的程度，無論它高到什麼樣的水準，當着他的知識思想與他的取得收益的方法相衝突時，他一定要維持他的取得收益的方法而犧牲他所信仰的主義的。舉一個最簡單的例證：記得有一次有一位大地主，他對我說，他在他的兒子的寫字檯上看見了一本共產黨的小冊子。他問我說：「這個道理你看對嗎？」我說：「從地主的眼光看來，也許是不對的，但從一個佃農的眼光看來，你可很難說他不是對的。」他說，「我已經把這一本小冊子通通都看完了。不能說他不對。對，對，雖然是對，但於我這家庭沒有用處。我因他對於我們的家庭沒有什麼用處，所以，我趁着我的兒子轉背之時，我便把它扔在火爐裏燒了。」還有我一位相識的大地主，他酷愛馬克思主義，他每次會見我時他都要宣傳馬克思主義。我每次聽了他的宣傳之

後，我便輕輕敲他一下說：「你既然是馬克思主義者了，爲什麼你還要當大地主呢？」他說：「我在最初的時候，真是想把土地送人去了。可是，經了三番五次考慮之後，在這矛盾之中，我確得到了一個統一。就是這份土地的收入與其把他送人，反不如留給自己的好，因爲我究竟還是一位馬克思的信徒不是？」「爲什麼你不把給農民呢？」他說：「給農民和給我，我覺着亦沒有什麼區別。而且以之送給農民似乎還不如留給我好。因爲農民都是地主的意識。與其給他，還是不如以之留給我自己的好。」不問這位朋友，他是如何的相信馬克思主義，但是說來說去，他還是要保存他的這塊肥美的土地。這個第二例更足以說明，人在實際行爲上不是受他的理想支配而係受他的取得收益的方法支配了。在你們這些讀者的家庭中，想來有不少的父親是地主。你們試一回想，你們的父親，假如他是一位大地主，他在實際行爲上，究竟還是受他的高尚理想支配呢？抑還是受他所私有土地的支配呢？現在在我們知識階級之中，有不少謾罵在抗戰期中專門囤積居奇的好商的。但爲什麼我們自己不囤積居奇呢？很明顯的這是由於我們手裏沒有資本。假令我們手裏現在有若干億的法幣存在銀行手裏，眼看着明天的貨物便要漲價，法幣就要跌價，除非我們是傻子，我們方纔不會把這若干億的存款來買貨的。那麼，這樣一來，豈不是要把我們自己變成囤積居奇的好商嗎？爲什麼我們要變奸商呢？我的很簡單的答覆是，我們如同別人一樣，在實際行爲上，亦是要受我們自己的取得收益的資本支配，而不是要受我們的知識支配的。由此可見，這個硬性的公律，即於我們這批教授亦不能有何例外不是？

再說，假令一個人，他是一個買辦資本家，他的取得收益的方式是買辦資本，那末，他的一切的行爲便在如何替帝國主義者向中國推銷洋貨，壓倒國貨，以圖取得最大的佣錢，而使他的買辦資本能夠維持和集斂。他的知識確令十分高，他亦是要這樣做的。記得有一次我在上海請一位老朋友吃飯。他在席上搖頭歎惜不置。我問他歎惜什麼？他說：「朋友，你不知道，我現在在當買辦，這種工作簡直不是人作的。比如說這裏有一種洋貨和中國貨，縱令還是中國貨比較的物美而價廉，但我們做買辦的，一定也要不惜施用詐術，來勸告我們的主顧，不要買國貨，要買洋貨。因為必須要這樣做，然後我的買辦資本纔能蓄積不是？可是朋友，你莫要忘記了我個人在良心上是愛護中國的民族工業的呀！」單這幾個簡單的舉例，亦可看出，人類的行爲，在根本上，是不受他的知識支配的呀。人類的行爲在根本上既不受他的知識支配，然而中山先生却認爲他要受知識支配，這還不是空想麼？

但你們也許要問我，卽爲什麼靠勞力爲生的工人和佃農亦常想當地主或資本家呢？我的答覆是這樣，卽在社會進化的某一特殊的階段，正當着土地私有權或私人資本的集斂，有刺激生產的作用時，土地的私有或私人資本的集斂，便成爲社會取得收益的最主要的方法，而此最主要的取得收益的方法往往會壓倒其他一切的收益的方法，而成爲支配人類大部行爲的中心的力量。可是到了土地的私有或私人資本的積聚有害於生產的進步時，工人階級的行爲便受他們自己取得收益的方法支配，而不受地主或資本家取得收益的方法支配了。此時工人所要做的，只是設法保持他們自己的以勞動取得收益的方式，並盡力發展他，使他成爲社會

最主要的取得收益的方式，直到澈底做到不勞動者不得食的階段，方才止步。於是勞動者的行爲的方向便完全受勞動者取得收益的方法勞動支配，而不受土地和資本的支配了。在現在的資本家社會裏，工人與資本家的衝突，主要是取得收益方法的衝突。在農村社會裏，主要的衝突是土地這個取得收益的方法和勞動那個取得收益的方法的衝突，而在殖民地土上主要的衝突是帝國主義者的資本和買辦的資本，同中國廣大的勞動和民族資本衝突。這些衝突都是取得收益的方式的衝突，而不是知識的衝突。可是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的學說確認爲人類的衝突在根本上是智慧與愚蠢的衝突，而不是取得收益的方式的衝突，或階級利益的衝突。這還不是一種空論麼？一言以蔽之曰，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的學說完全是空想的。

因爲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的哲學是空想的，結果根據他的知難行易的哲學而來的三民主義也是空想的。恰纔我們說過，人，平均說起來，或大多數人在大多數的時間內，在實際行爲的時候，不受他所信服的知識支配，而係受他的取得收益的方法支配。亦就是說，平均說起來，人在實際行爲的時候，不受他所信仰的三民主義支配，而係受他的取得收益的方法支配。從取得收益的方法上說，中國的買辦階級的取得收益的方法是與民族工業相違背的。不但違背而已，中國的買辦階級，在實際行爲的時候，尙必定要摧毀中國的工業，因此中國的買辦的階級，無論他們內中的分子是美國回來的博士也好，或中國土生土長的專門學者也好，他們都是要摧毀中國的民族的獨立與自由的。因此，我們不談民族主義則已，既談民族主義，那麼，我們必須要談到實現民族主義的階級。從取得收益的方法上說，中國的買辦階

級是絕對不能實現民族主義的。這即是說，我們不談民族主義則已，既談民族主義則必須排斥和消滅中國的買辦階級。即中國只有非買辦的階級才能負擔復興中國民族的任務，買辦的階級是絕不能夠的，因為買辦的階級的取得收益的方法是與民族主義相衝突的。但中山在談民族主義的時候，並沒有排斥中國的買辦的階級，亦且沒有主張，凡屬買辦階級陣營裏的分子，除非他們放棄買辦的關係，都沒有作國民黨員的資格，亦且沒有主張只有非買辦的階級才能負擔復興中國任務。這足證明中山的民族主義，自始便是一個空論。

再以民權主義來說，中山在談民權主義的時候，亦沒有談到在中國只有什麼階級才能實現民權主義，什麼階級則不能夠。無疑的中國的官僚階級、軍閥、帝國主義者的傳教士、和新士大夫階級，他們的取得收益的方法是做官，是貪污，是媚上欺下，是剋扣軍餉，是武裝走私，是媚事帝國主義，是兼營工商業和操縱金融。無疑的這一系列的階級都是民權主義的障礙物。所以我們不談民權主義則已，既談民權主義則必須把這一系列的剝奪民權的階級打倒和消滅。也就是說，凡屬中國的官僚、軍閥、和新士大夫的官僚階級都沒有實行民權主義的資格，而亦就是沒有充當國民黨的黨員的資格。並不是他們在知識思想上，沒有當黨員的資格，而是他們的取得收益的方法與民權主義相衝突，所以他們沒有當黨員的資格。也就是說，只有反官僚、反軍閥、反新士大夫階級的平民的階級方纔是實現民權主義的階級。現在我們所要問的就是中山在談民權主義的時候，他談到什麼才是實現民權主義的階級有沒有？沒有。由是可知，中山的民權主義，government by the people，所謂人民或 people

也者亦是一個空洞的論調了。

再以民生主義來說，民生主義，要節制資本與平均地權。但節制誰的資本呢？平均誰的地權呢？這還不是平均資本家的資本和地主的土地麼？但資本家是資本的奴隸，地主是土地的奴隸，資本家和地主既是資本和土地的奴隸，他們能夠靜聽你去節制和平均他們的資本和土地麼？資本和土地比較資本家和地主的雙親還重要。你如不慎冒犯了資本家和地主的雙親，他們至多不過打你幾耳光，叫你陪陪小心便了事，可是假如你要侵犯他們的財產，他們要不殺你纔怪呢。資本家和地主既然把資本和土地看的比他們的雙親還重要，現在你要去節制他們的資本和平均他們的地權，他們還不起來反抗你麼？這點明白表示地主的階級和資本家階級，特別的是買辦資本家階級，他們是不能負起實現民生主義的任務的，他們絕對沒有充任國民黨黨員的資格。反轉來說，就是實現民生主義的階級只有工人和農民的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只有這三個階級，才有實現民生主義的資格。可是中山在談民生主義的時候，儘管放言高論的說，民生主義既是大同主義，亦是共產主義，但他確忘記了申述什麼才是真能實現民生主義的階級，又什麼不是。這都表示中山的民生主義完全是一種空洞的符號。

中山忘記了，侵犯中國民族主義的人是帝國主義者及其工具買辦，侵犯民權主義的人是官僚、軍閥和媚事帝國主義者的士大夫階級和腐化的傳教士，摧殘民生主義的人是資本家階級和地主階級。這些各別的階級，在他們的心理上觀念上或唇舌上都是三民主義的友人，或是三民主義的同志，但因他們在取得收益的方法上，與三民相衝突，且因他們在實際行為

上，只受他們的取得收益方法支配而不受三民主義空洞的理想支配，因此他們遂不由自主的要成爲三民主義的敵人了。中山如係一位科學的、實際的、和明智的革命的領袖，便應當在三民主義之中，明明白白揭示三民主義的實踐者和反抗者階級，並從他們取得收益的方法的性質，把這敵對的階級明明白白的劃分出來，作爲一個革命的對象，而不能空空洞洞的說，凡是深明三民主義的大義的人都可以作三民主義的信徒。似此在這萬惡社會裏一羣豺狼和虎豹也可以作三民主義的實行者了，這不是一句空話麼？中山太老實了！

不但中山的知難行易學說是空想的，三民主義是空想的，甚且由中山先生所手製的建國方略亦是空想的了。中山先生把中國的革命分做三個時期：（1）軍政時期，（2）訓政時期，和（3）憲政時期。但誰是實現訓政和憲政的革命的階級呢？中山又不詳加區別。結果致使中國的軍政、訓政和憲政都落在一批反訓政反憲政的人手裏。由此而欲實行訓政以及憲政，這還不是一種空論麼？

以上是說，中山先生的整部的政治的學說，除了他的目的外，一切都是空想的。中山學說之所以是空想的，就是因爲他只知談主義，而不知道，在中國今日的社會裏，什麼才是真正實踐三民主義的階級，致使中山的主義變成一個最大的空幻，這便是中山的三民主義自中山逝世而後不能實現的原因。

現在我所還要特別補充的，卽一位政治的領袖，不僅在談主義的時候，要從人類取得收益的方法上，毫無混殺的點認誰是實現主義的階級，誰個不是；而且必須在談階級的時候

候，明白指出在每一階級之中那些才是革命階級中最進步的能爲主義而犧牲的人物，又那些不是。並且要以一種極端嚴格挑選黨員的方式，把這些在革命階級裏最進步的分子團結起來，領導革命的階級往前奮鬥，並從剝削的統治者階級手中把政權奪取過來，重新分配生產的手段，然後始能不折不扣的實現三民主義大原則。無疑的中山的三民主義，從取得收益的方法上說，只有中國的佃農階級、勞工階級，和進步的小資產階級始能完成中國革命的任務。而且並只有一個以極端嚴格的手段挑選出來的領導農工和小資產階級中最革命的分所組成的政黨，始能把中國的革命的工作做得有聲有色。不幸中山的主義對於這些道理絲毫不明白，並力倡知難行易的學說，以爲革命的最高領導原理，結果於是中國的國民黨便落在所謂上層的或腐化的或幫兇的知識分子手裏去了。

在中國這個知識不進步的國家，一切的知識大半都爲地主、軍閥、官僚、資本家、洋買辦的少爺們所獨占。在這些上層知識分子之中，有的買辦，有的地主，有的小資本家，有的軍閥，有的新士大夫。從知識思想上說，他們是贊成三民主義的。但從取得收益的方法上說，他們乃是一些必欲把三民主義置之死地而後快的階級。雖說在國民黨內，也有多少的革命志士，但這些人在黨裏面，是沒有什麼地位的。於是民族主義便爲買辦的階級所斷送。民權主義便爲貪污的官僚、獨裁的軍閥、和無恥的士大夫階級所斷送。民生主義便爲地主、豪紳、惡棍、和流氓資本家所斷送。結果民族主義便成了賣國求榮主義，民權主義便成了官僚主義，民生主義便成了民死主義。軍政時期便成了軍人專政時期，訓政時期便成了

領袖獨裁時期，憲政時期便成了動員戡亂和剿匪的時期，凡此均由孫中山先生在談三民主義之時只談人民不談階級，和不談以極嚴格的方法選擇革命階級陣營裏最進步的分子組成一個堅強的政黨實行領導革命的空想的、抽象的、缺乏科學根據的成份所造成。不幸今日的青年黨，和社會民主黨，其空想的成份，比國民黨實有過之而無不及。又中國的新的上層知識分子，雖亦尙想在政府之中去分享一官半職，然而在他們的政治理論之中，其所含的空想的成份，却尙比民社黨和青年黨還多。我敢斷言的說，中國如欲真正的實現三民主義，除非在整個的中山學說之中，把他的空想的成份抽拔出來，把他燬了，而加入科學的成份，中山主義必然無望。

但科學的成份是什麼呢？是不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或是不是指另外一個形態的唯物史觀，如像我所倡導的取得收益的方法才是指導人生行爲的中心力量的學說呢？我的答復說，是的。我現在始可大胆的說一句話，在這中西文化交流的時代，外國須要向中國學習，但中國人亦須向西方文化學習。我以為在西方文化裏面，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確可以補東方文化的不足。又今日中國的三民主義之所以得下貧血病，也就是因爲在三民主義之中，缺乏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的原故。我現在要答覆這個問題了。即爲什麼馬克思的主義，在馬克思逝世而後，能在共產黨手裏，逐漸付諸實行呢？我的答覆是，這完全是因爲在馬克思的學說裏沒有中山先生的空想的原故。

但我所要特別強調的，即我雖然是說，中山的三民主義必須要在無產階級和革命的小資

產階級和在一個代表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政黨手裏始能實現，我絕不是說，這個進步的政黨不可以斟酌客觀的物質的條件，在萬一可能的範圍內，而採一種比較溫和的，人道的，或民主的聯合政府的形式。我們在抨擊社會的財產關係上要澈底，但是同時亦應盡力減少革命的流血，以符合人類最高的人道主義的原則。但我這並不是指何人今日的行動是不人道的。我所說的只是原則。

最後我所要說明的，我以為我們在精神的修養上，實在應當以中山先生的和平和不怒的性格作模範，在求知的努力上，亦應以中山先生作模範，在革命的工作上亦應以中山先生作模範，一言以蔽之曰，中山先生在一切的行動上均不愧是我们的最理想的導師。只在政治的哲學上，中山的空想的主義確乎不是我們的導師，只有我的關於人類行為的取得收益的方法的解釋，或唯物史觀，才是我們革命的指南針。爲了中國，爲了完成中山的遺教，和爲了實現三民主義，我們均必須要更多的接受馬克思的歷史的唯物解釋作指導，並且竭力去發展它的意義，以圖適應中國特殊的需要，然後中國的革命運動始能不致重蹈今日的國民黨所走錯的路。

（民國卅七年四月十九日於國立北京大學。）

從經濟的觀點評今日幾種錯誤的政治見解

我覺着在今日中國的知識界裏有幾種錯誤的政治見解。除非把他們廓而清之，中國的政治進步，也許要延緩一個四分之一世紀。這幾種錯誤的政治見解的發生，都是由於他們忽略了中國的經濟機構的本質而來。就中最佔勢力的一種見解就是哲人政治的主張了。其次便是今日的憲政的主張。又其次便是關於學生運動的一種乖曲的見解了。第一種見解，以梁漱溟先生主張最力。第二種可以推舉張君勱先生作代表。第三種是我的多數朋友們對於學潮的政治性的認識。為什麼這三種錯誤的政治見解都是由於忽略了中國經濟機構的本質呢？這個問題是很容易明白的。現在請讓我從梁漱溟先生的哲人政治說起。

梁漱溟先生是中國罕有的儒者。從他尋求真理的奮鬥歷程上說，我生平尚沒有見着第二個比梁先生的態度更誠懇的人。我覺着梁先生的政治見解，在中國的真正的儒者之中，確有無上的代表的價值。梁先生對於中國政治的認識有消極的和積極的方面。消極的方面，梁先生否認英美的民主的政治，可以適用於中國。在積極的方面，梁先生認為中國的政治只有把它全部交給高明睿智的哲學家來領導，然後中國始有富強康樂的希望。

為什麼英美的民主政治不適用於中國呢？梁先生以為，這可以從歷史的和地理的兩方面去解答。從歷史上的事例看，根據中國最近三十幾年，憲政運動的經驗，幾乎沒有一次大

選，不是爲少數特權階級所利用的。小民對於大選的運動，不但無益，而且有害。即以民元的選舉來說，本是最純潔的。因爲這次被選的議員幾乎沒有一人是由金錢的賄賂而來。可是，到結果來，還不免爲曹錕的金錢勢力所犧牲，其餘更不用說了。現在的選舉運動的品質將比前二十年前更壞。這些鐵打的歷史的事實指明歐美的民主政治，一到中國，便變了質。好像淮南的橘子一般，留在淮南，不但肥大，而且甜美，可是一旦移植淮北，便變爲枳去了。更在純理上講，西歐的民主政治與中國的文化體系實在是有柄鑿不能相容的地方。梁先生說：「試看，歷史長久文化昌盛如中國，農民暴動類似革命之事雖屢見不鮮，而從不聞民間起而作參預政治之要求，與夫自由人權之要求者。這就證明其歷史根本不同於西洋。」再來呢，「中國理性發達最早。它一貫的尊尚理性，而不尚強力；貴謙貴讓，而恥於爭。」三來呢，「中國社會散漫，遠從缺乏宗教而來。故革命先導之孫中山先生並不要求自由，翻嫌自由太多，而呼求結成團體。」可是歐美的民主政治力爭自由，這在中國適足以加重其弊。在民主運動裏，「自己出頭選舉，靦然不以爲恥，實大悖於固有優美之謙德。」在一個無中央集權之國家而企圖實現民主自由，此即所謂文化失調。因此梁漱溟先生，不但要以歷史的證據，反對歐美的民主，而且欲從純理的研究上，去反對他。然則中國需要什麼政治呢？

梁先生相信中國的政治須有待於高明深睿底哲學家來領導。而且這種領導的責任尙「非一般政治家，經濟家，或科學家所解釋。」因爲「許多問題，許多矛盾，到他這裏才得疏解

溝通，無所凝滯；而後在各方面照顧之下，妙取一着，祇可由極少數人討論，不能付之多數表決。……總而言之，我們今日建國決大疑，定大計，天然是多數人接受少數人的領導，尊賢尚智而不必然從衆。一般所謂民主，於此皆不相應。」（觀察三卷五期九頁）

在西洋政治思想史上，也有像梁先生這樣主張的。這便是有名的柏拉圖了。柏拉圖因為看見當年希臘的斯巴達和雅典的皇帝，一則暴戾恣睢，一則淫佚無度，二者均與至善的原則不相合。爲使當代皇帝的統治合於至尊至善的原理起見，他主張先使哲學家變爲皇帝的候補人。再在這些皇帝的候補人之中，選舉一個哲學家來做皇帝。這種主張與梁先生的意見雖不盡同，但在精神上則完全是一致的。記得我們在少年的時候曾經相信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而平天下之說，如今我們親眼看見政治上的貪污與愚蠢，亦無日不在期望有一修養最好的聖賢來統治。如這一類的理想，我想人人都不免有一點。梁漱溟先生與普通人不同人的地方就是在他政治理想之內，好人所佔的成份特大而已。我以爲這種理想確是美麗。所不幸的，就是從古到今以來，這種美麗的理想，從未得有實現的機會。把中國的歷史來說，自從春秋戰國以來直到於今，我們所見着的皇帝，大約都是劉邦，李世民和朱元璋一類，幾乎很少的皇帝纔是賦有聖賢修養的人物。將來恐怕與過去的情形也是相差無幾。至少，梁漱溟先生尚沒有充分的證據來證明在最近的將來或現在，哲學家 and 哲學家的救國大計，可由一個非民主的方式，得來統治中國或世界。

從經濟的觀點上說，梁先生在發揮他的哲人政治主張的時候似忘記了中國現代的統治者

階級是什麼。從國內的觀點上說，他們只是地主和官僚資本家的代言人。從國際的觀點上說，他們且是帝國主義者和平侵略中國的工具——買辦。這一批人屬於中國的寄生的級階。以言道德的生活，他們因為不勞而獲慣了，除了利用他們在政治，法律，和社會的特權，剝削勞動者的血汗而外，他們所知道的，不過是：喝酒，賭博，玩人，特別的是奴役青年或女人，擺官架子，向外國人撒嬌，貪污驕橫和說謊話。以言物質的生活，他們均是一些不到農場的地主，不到工場的股東，不到實驗室的科學家，不到貨車和貨船的商业家，更談不了參加直接生產過程的肉體的勞動了。他們自己不能生產針尖大的一點消費的財貨或勞務，可是他們所消費的却無一不是他人辛苦勤勞的結果。他們從美國運來口紅，法國運來香水，弗得工廠運來汽車，巴黎運來衣服的式樣，海底裏派人撈上珍珠，深山裏採來茗味，高加索請來跳舞的明星，意大利僱來聲樂的皇后。時而在彩雲裏高飛，時而在綠海邊游泳，時而在翠湖裏划船，時而在外交官邸裏夜會。他們的生產毫無，但他們的消費全有。他們覺得他們在享受是由於上帝的神授。假如你要批評他們，他們就要說你是一「共匪」，並不惜使用種種毒辣的手段來束縛你的身體，言論和思想的自由，並結果你的最寶貴的生命。這都足以表示他們的貪得無厭的狀態。以言科學的生活，他們雖然不曾讀過一本經濟學，亦無實際的經濟知識，但他們却充當經濟部長了，並且尚還靦然不知恥的到處演講他的什麼竅而不通的經濟政策。雖然不曾讀過一本財政學，並無實際的財政知識，但却也當財政部長了。雖然只知背誦曾國藩八股，但自己却自命為中國文化的領袖。今天叫人修身，明天叫人節

欲。可是他自己的生活却比糞坑裏的大蛆還渾濁。恕我不忍說出這些大人先生的名字。但有什麼方法來挽救中國呢。· 如果就是向統治者灌輸哲學的知識使他們自動的皈依哲學家的教誨，如像梁漱溟先生所夢想的一樣，我以為這一條路是難通的。除非我們睜着眼睛不看事，我們方纔能說梁漱溟先生的哲人政治，能夠稍有效力。

第二種錯誤的政治見解就是張君勱先生等的憲政的理想。他們以為中國今日政治的不良，皆是由於沒有「憲政」，假令「實行憲政」了，中國就好了。他們的意思好像是說，中國今日政治之壞，就是由於國民黨沒有開放政權。假令國民黨把政權開放了，讓青年和民社兩黨分需政權，中國政治立可清明。現在青年和民社兩黨不是已經加入政府了麼？試問中國的政治好了多少？為什麼國民黨已經開放了政權，政治還沒有什麼進步呢？現在且讓我們從經濟的觀點，來說明中國政治機構的本質。

從經濟的觀點上說，中國是農村的社會，在這一社會裏面，關係大眾幸福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維持在這農村社會裏的財富的生產與交易。這個辦法原是極其簡單的。即只要在這社會裏面農人能夠在他每年的生產中，留出一部份來作為他們的生活和工作的所需之外，把其餘部份以地租的名義報効地主，農人便滿意了。地主得了這份地租之後，能以一部份向手工工人換得製造品來消費，地主便滿意了。又手工工人只要他所生產出來的製造品與農具，能夠向地主和農人換得糧食與原料進來，他們亦滿意了。現在地主既以糧食給手工工人換製造品，那末，手工工人的一部份的目的便達到了。在他方面，農人在其所收穫的農產品

中，除了地租之外，尚有工業原料，並欲以之換取農具。恰好此時在手工工人的生產品中，有一部份是農具並欲以之換原料。經了最後一度的交換之後，農夫得到了農具，手工工人得到了原料，二者當然均各滿意了。在第一年度的流通結束之後，農人與工人再事生產，未幾，農人，地主和工人之間再從事商品的流通，於以再度滿足各個的需要。第三年再把第二年重複一次，第四年再把第三年重複一次，由是遞進無已，便是農村社會的主要要求了。一切政治制度，只要能與這個基本的生產與流通相配合，只要維持這一點基本的關係，他便是最好的政治。憲政與不憲政均無關係。

還有一點應強調的，即自海禁大開以來，帝國主義者的機械生產的工業品，不斷的輸入中國，使農村的手工業破產。農村裏失業人口增加了。地主的階級和買辦的階級以農產品已有國際的市場，可以的出售，換得洋貨，於是不免加重農人的剝削，在一方面，從事資本的蓄積。在他方面增加他們自己的奢侈豪華在物質的享受。無形中把農人的經濟地位壓得更低了。農人本來是一些被壓榨的人，現在更被人加重其榨壓，當然他們會由巨痛而轉麻木了。從前他們沒有機會來問政，現在他們當然更沒有機會來問政了。在這一種情境之下，政權遂完全操縱在地主，買辦，商人，和少數的工業資本家手內。

假令中國的經濟永遠停滯在農業的階段，政治的目的不為人民謀利益，一切的政治概由特權階級來過問，無論這個特權的階級問政的方式是什麼，民主或獨裁，這完全是特權階級的問題，於中國農民的福利，毫可不計。這便是民國三十幾年來，每次憲政失敗的理由。

但是，假令中國的經濟，雖然還是停滯在農業的階段，然而，政治的目的還想為大眾謀利益，或為農民謀利益，那末，中國便必須有一代表農民利益的政黨，來參加選舉的競爭。可是中國代表農民利益的政黨是什麼黨呢？我以為我們不談英美的民主政治則已，欲談英美的民主政治，則必先言領導這個民主政治的各政黨的性質。在今日中國合法政黨之中，既無代表農民利益的政黨，徒有代表壓榨農民的各上層階級的利益的政黨，來領導民主的政治，那麼，在民主政治實現以後，必然仍是壓榨農民階級。地主，買辦，商人和少數資本家執掌政權，其結果與在實現民主政治以前政權的本質毫無二致。即在道德上統治者階層仍是寄生蟲的性質，在經濟上統治階級仍是剝削農民的階級。在科學上，統治者仍是無知與貪污的官僚，我看這種樣式的民主政治，實在沒有什麼存在的必要。然而中國的一部份的政治家和美大使司徒雷登博士，均在謳歌這類的民主憲政。從經濟的觀點上說，這實是最膚淺不過的一種政治見解了。

我以為今日中國的政治問題在表面上，雖然只是政治制度的問題，但在骨子裏，却不只是一個政治問題，而是一個經濟問題。即中國是否還要工業化；又是否還要以計畫經濟的方式來使中國工業化，抑或只是以無政府的生產方式來使中國工業化。如不屬於後者，那麼，我們只要有一種政治來便利資本家的利潤的獲取便完了。民衆不民衆，根本不生關係。可是假如屬於前者，那麼，中國便必須有一種政治來動員中國的參預直接生產的農民與工人，使之對於中國工業的復興發生無上的興趣。因為在計畫經濟的制度下，推動中國工業建

設的誘因已經不是利潤，而是大眾的生產的興趣了。果爾，則是，一個代表勞動的政黨，在中國經濟復興上，實比其他任何政黨都要重要。不幸，中國的憲政主義者，徒然注重中國民主的形式而忽略了他的本質，這是大可悲哀。除非中國的憲政大半的或主要的是由勞動者的政黨所領導，為勞動者所有，和替他們謀利益，任何民主的政體都是剝削者，在政治舞台上，為了維持他們的既得的利益，所玩的一種西洋的戲法。最可引為慨歎的，即在自由的分子之中，亦不免有少數為現存的統治者所玩的西洋政治戲法所欺騙，這確是中國憲政運動史上的一件可恥的事。

最後，我所還要批評的，就是今日中國竟有不少的知識的分子，以為學潮之發生，是由民盟或共產黨所鼓動出來的。甚至有人站在教育者的立場，竟以為在歷次學潮之中，青年因被政黨利用殺身為可惜。我很慨歎這種見解的不合理。假如學潮是由民盟和共產黨所鼓動的，那麼，沒有民盟和共產黨便當沒有學潮了。有民盟和共產黨便當必有學潮了。在對日抗戰的期中，共產黨是有的，但不聞有學潮發生。在五卅運動的當年，共產黨是無的，但學潮不但發生而且竟然澎湃洶湧不可抑制。既然無共產黨亦可以有學潮，有共產黨亦可以無學潮，可見學潮之勃發，並非民盟和共產黨的原因了。無疑的，現在的學潮也許不免多少有點偏向共產黨，偏向也許是事實，但學潮絕非是共產黨所能鼓動成功的。真正的事實是，中國的統治者繼續不斷的貪婪和枉法，與中國的老百姓的利益相反，不但相反而已，而且互為水火。現在又非專制時代，人民當然有向政府示威和抗議的權利。在這抗議者一羣中，有

的是教授，有的是學生，有的是商人，有的是工人，和有的是農民。我們如說他們都不滿意政府，可以，或說他們都對政府不滿意，並且心照不宣，一致批評政府亦可以，甚至說他們相約批評政府亦可以。但說在他產生之中，甲以乙為政爭工具，或乙以甲為政爭工具。甲利用乙，乙利用甲。或共產黨利用學生來作他們政爭的工具，這可不能說不是一種缺乏證據的理論，並係對於青年學生的一種誣蔑了。特別的是國民黨員不應該說這一種話，因為在十七年北伐的時候，成千成萬的青年為反抗北洋軍閥而犧牲，國民黨得到青年的幫助很不少，然則他們亦是為國民黨所利用麼？尤其是參加過五四運動的人，不應該說這種話，因為在五四的當年，好些的青年為了殺賣國賊曹汝霖和章宗祥等而坐牢，那時研究系很對於學生捧場，然則他們亦是為研究系所利用麼？依據同樣的理由，今日的青年，為了爭取人權，為了反戰，為了反飢餓，而作種種的遊行示威，誠足以表示他們對於政府的大部措施不滿意，但是他們的不滿意雖與民盟和共產黨對於政府的不滿意相彷彿，但從純客觀的立場上說，我們絕不能說學生和青年會作共產黨和民盟政爭的工具。至多我們可以說，他們彼此的主張有些彷彿而已。

從經濟的觀點上說，大凡一個政府，如果他們的政治設施，有害於正常的財富的生產與流通，那麼，贊成他們的人便將一點一滴的減少。反抗他們的人便將一點一滴的增加。反之，假令政府的政治設施有利於正常的財富的生產與流通的甚至可使財富的生產與分配進入一個高級的階段，那麼，反對他們的人便越來越少，贊成他們的人便越來越多。回憶政府在

抗戰期中，關於兵役，財政，黃金，外匯和勝利後接收敵偽產業等各方面所表現的惡劣成績，實足以使愛己者痛，仇己者快。我以為，在政府的幾多不良的政治措施之下，平均每一國民恐怕均對政府有不滿。青年學生之是國民之一份子，他們豈能罷休的。縱令沒有民盟和共產黨，我以為他們對於政府的示威，亦必應時產生。未必說，這還是一種不可能出現的事
情麼？



與梁漱溟張東蓀兩先生論中國的文化與政治

在最近第三卷四、五、七期的「觀察」上，梁張二先生曾經發表了兩篇大文章，均以爲憲政不適宜於中國文化的需要。他們所持的理由有兩點：（一）從中國的憲政史上說，自從民國成立以來，所有的選舉都爲特殊階級所利用。只有民初的一次選舉，不是由金錢買得。但卽以這次選舉而論，自從民國十二年曹錕賄選成功，其結果亦是替特權階級作工具。現在的選舉且將比從前更壞。（二）更從中國文化的本質上說，中國不嫌自由太少，而嫌自由太多。實行憲政，適以加重其弊（梁語）。溯自海禁開放以來，凡是西洋文化一進中國來，都幫助了「甲楨」卽皇帝的政權與官僚的政權，除使其對人民更事高壓和榨取以外，沒有別的，亦不會有別的（張語）。梁與張二人對於中國文化積極的解釋雖不盡同，但消極的否認憲政則一。然則中國的文化所需要的政治是什麼呢？現在且讓我們來看梁張兩先生所給的解答。

依據梁先生的意見，中國需要少數的高明深睿的哲學家來治理。他說：「說老實話，此方針之認取，我相信非一般政治家、經濟家或科學家等等所能辦，而必有待於高明深睿的哲學家。許多問題，許多矛盾，到他這裏才得疏解溝通，無所礙滯，而後在各方面照顧到之下，妙取一着。祇可由少數人討論，不能付之多數表決。」梁先生這種主張，很像柏拉圖在

希臘的時代，眼見着斯巴達皇帝的暴戾恣睢和雅典皇帝的淫佚無度，本其悲憫救世之懷，主張以哲學家來做皇帝，依照至善的原則，來治理希臘，有些相同。

依據張先生的看法，政治有甲概和乙概之分，甲概是皇帝的政治，乙概是鄉民爲了地方公益，而實行互助。中國是甲概之下，保留了許多乙概。在這一點上，儒家哲學確有大功。中國不但需要乙概，而且要限制甲概。儒家思想在保護乙概，因此「我主張儒家思想與西洋民主精神有相似點，就可以由此一點之接近而把民主主義迎接過來。」但要怎樣纔能達到這目的呢？張先生說：「這必須有深知中國國情與中國文化的學者同時又深知西方文化與政治，這樣的學者多多益善，大家會同研究一個專爲中國而設的制度。」換句話說，就是中國的政治需要一些通儒來領導。

總括來說，就是梁先生與張先生因爲看見西歐的民主政治到中國來都壞了，因此，他們在根本上，都否認民主政治，而主張少數政治，或通儒政治。

梁張兩先生和我這位後輩，都是受過儒家哲學薰陶的人。記得我在四歲的時候便開始讀經，一直讀到十一歲。雖然那時並不真正了解儒家哲學，但在行爲上，却很受我的祖父母的儒家思想的指導。在大學畢業而後，雖然在我的生命之中，滲入了不少的實證主義的成份，但我在人生行爲上依然篤愛王學。直到抗戰之時方纔發生懷疑。儒家的哲學既同我結了一段這麼深的關係，今番再聽着梁張兩先生的通儒治國的理論，好像一個在萬里之外浪蕩江湖的孩子，忽然看見他的鄉里兒時的故友一般，特別的感到真誠而親切。可是現在我已經不相

信儒家的思想可以救國了，所以，我對這兩位前輩所主張的通儒的理論治國或通儒治國的理論，雖然覺得高尚而優美，但我却很難信任他是救治中國的文化與政治病症的良方。我想把我的意見盡情吐露於後，請求兩位前輩教正。

我以為梁張兩先生的通儒治國的理論，如果要想有效的付諸實施，必先具備兩個條件：（一）通儒們必須已經是中國的統治者了，因此他們可依照他們的高明深容的哲學以治國。（二）他們雖然尚未變成中國的統治者，但統治者却能夠對於他們所研究的專為中國而設的制度，不但虛懷樂取，而且躬行實踐。可是在今日的中國並未具備這兩個條件，在昨日亦是沒有，在明日我相信依然亦是不會有。所以梁張兩先生的通儒政治的理論，最多只是在中國的政治思想史上一種點綴品，好像關人先生在他的富麗堂皇的客廳裏所陳列的希世之珍一樣。但我恐怕連這點小小的希世之珍的地位，在中國也是不會得到的啊！

假如世上大多數的人，或世上的統治者階級，果肯依照哲學家的高明深容的哲學以治事或治國，那末，世界也許早就好了，並也用不着梁先生和張先生來苦讀深思，亦不用着我們這些後輩來討論了。以戰爭與和平的關係來說，幾乎只有很少的哲學家纔是鼓吹戰爭和否認和平的。而且即在戰爭版子的口裏，亦還是說和平好。但他們是否遵照這種理想做呢？現在美蘇兩大國不是正在預備戰爭，印度不是正在從事戰爭，中國的國共兩黨也不是正在從事戰爭，而打的你死我活麼？試問和平主義在那裏？在中國的哲學中，凡孔孟之徒，沒有不主張「見利而思義」的。但今日中國的營私舞弊的官僚，坐吃空額的軍閥，黷武窮兵的戰犯，和

國積居奇的奸商，他們亦在見利而思義麼？思是思了，可是他們在照着做麼？國父孫中山先生在他的三民主義上，不是極力提倡民族、民權和民生主義麼？而且他這主義得到了全中國一致的同意，但誰在真正的奉行它呢？梁張兩先生縱令本其高明深睿的哲學（梁語），並集合許多精通中西文化的學者來討論出一個專門為中國而設的制度（張語），我恐怕他在將來受人歡迎的程度未必趕得上中山先生的思潮。但中山先生的思潮都還缺乏足數的人照着做，我們很難有理由說，梁張兩先生所認為的高明深睿和學貫中西的政治哲學，世人便要躬親去實踐。假令他們對你陽奉而陰違，梁張兩先生又將何如？張先生豈不是說，中國向為特權階級所統治嗎？又政府本是剝削階級的獨占機關，借維持治安之名，施行強制力，以保其特殊利益嗎？梁先生豈不是也在說，中國近年以來，一黨專政和個人獨裁確是一種不應存在的病症嗎？假令梁張兩先生的理想的政治主張出來之後，依然與中國的特權階級的利益相違背，倘不受特權階級的明令禁止，便遭他們的夾帶否決，結果又如何呢？這豈不是明白表示高明深睿和學貫中西的哲人的思想，也把這個特權階級無可奈何麼？

把我上面所說的話，再行重複一遍，即梁張兩先生所主張的通儒政治，如果要想在實際政治上發生效力，必須讓通儒們來作中國統治者。可是中國的統治者，不但一向不是通儒，而且不聽通儒所說的話來治理，所以梁張兩先生所倡導的通儒的政治，好像鏡花和水月，完全是虛幻的、空想的和無效的。本來實際的政治很複雜，但哲學家們都不免把它看得太簡單了。這便是梁張兩先生的通儒政治的弱點。佛陀的手掌假如能把世上的豺狼馴服下來，使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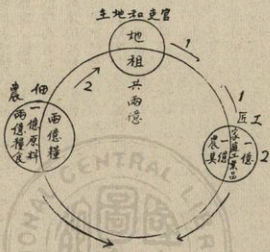
們都各長上翅膀，把小孩駝到月宮和彩雲裏去遊玩，這是何等的美麗啊！但可惜豺狼還是要吃人。這個美麗的理想辦不到啊！

張梁兩先生不贊成西歐的民主制度，而主張根據中國的文化再造一種通儒的政治，其根據的理由，單因大選在中國被利用。但大選爲什麼在中國被利用呢？單因他不適合中國文化的要求。但中國文化的要求是什麼呢？又中國的文化與外國的文化有什麼區別呢？梁先生說，中國「從不聞有民間起而作參預政治之要求與夫自由人權之要求者」。「今日所行一切學自外國。別的猶可，惟自己出頭競選，靦然不以爲恥，實有大悖於固有優美之謙德。」張先生則謂中國「全國性皇帝所以成功，一半固然是由於有個統一的需要，另一半則是由於費孝通所說的那個無爲哲學的政治思想之被採用。秦雖做成統一，但却未採無爲主義的思想，所以不能維持長久。漢朝繼之，二者兼有，遂能統治數百年，後世儒家無不兼採道家，其主要之點，即在於想用種種方法希望在甲極下仍保留乙極，不使甲極完全吞沒了乙極。在這一點上，我認爲中國傳統的政治思想都是旨在保護乙極，就中尤以儒家道家爲最。」因此張先生「主張儒家思想與西洋民主精神有相似點。就可由此一點之接近，而把民主主義迎接過來。」我對於梁張兩先生對於中國固有文化的認識是贊成的。但我還想更進一步，專去說明中國這種無爲政治產生的經濟背景。

誰都知道，中國原來是一個閉關自守的經濟社會。在這社會之中，最發達的就是農業了。從實物的經濟觀點上看，只有農業的生產纔有剩餘，小工人和小商人均沒有。農人在他

的每年總生產量之中，除了維持最低的生活水準外，尚有餘物來贍養一個地主的階級和政府，其餘的階級則無此能力。在海禁未開之時，田賦實占中國政府財政收入的大半。由此可見，中國的農人能夠生產淨餘，確無問題。因此中國的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在政治和社會方面，都是特別的以農爲重。但工業確乎最不發達。試看在今日中國農村的冷僻的角落裏，所浮現的泥水匠、木匠、鐵匠和瓦匠等生產的能力之低劣，和他們的破衣和赤足，我們實在不禁要說，他們所生產的貨物，除了依照分工和交易的原則，與農人換取農產品來維持他們的最低生存費外，實在沒有替過什麼資本家生產淨餘生產物，來維持他們的閒暇與逸樂。小商人的地位亦然。由此可知，在生產手段的性質上，在中國停滯在農業階級的時候，土地實是中國全部社會的生活的依據。中國的整個文化都是建築在這個土地生產地租的關係上。所以中國的儒家和道家的政治的思想都在以維持這個土地生產力於不墜。

我所謂的維持土地生產力於不墜便是重農學派的老祖宗所說的維持財富在農村社會的各個階層裏繼續流轉的意思。正如揆內大師說，在一個農村社會裏，存有三個大階級：（一）生產淨餘的佃農的階級，（二）不能生產淨餘的小工商階級，（三）地主和統治者的階級。在這三個階級之中，只有佃農的階級和小工商的階級能生產，餘如地主和統治的階級完全是坐享現成的。假令在一年之內佃農在土地上投資價值三億石糧食的資本（一億石穀種、一億石糧食和價值一億石的農具）生產出四億石糧食，和值一億石糧食的原料出來。他們獲得淨餘兩億。此兩億淨餘，地主認爲是他的土地的使用而來，要求佃農給他們作地租。在他方



可算是也收回了他們所投下的資本之一半了。他們急於以其一億農具換取原料，恰好農人手中原料一億以之交換農具。二者的供求與需要既各一致，當然兩者要從事交易了。經此交易之後，農人原保留有兩億糧食，今又得一億農具，他可謂恢復了他們的投資的全部。小工商業者此時既換得一億糧食，又得了一億原料，完全恢復了他們從前的地位。二者於是均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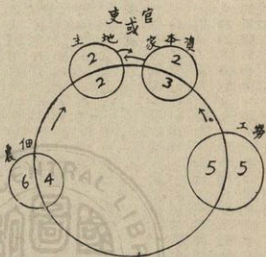
面，小工商業者投資價值兩億石糧食的流動資本：一億原料，一億糧食。他們因為不能生產剩餘，所以在同年之內，只生產了價值兩億石糧食的製造品：一億家庭工業品，一億原料。當生產完結之際，財富在這三個階級之間，開始流通。佃農在其所生產的五億農作物中先留出兩億糧食來，作為次年度的再生產之需。以兩億送給地主作地租。地主於是以一億糧食留作自用。一億向小工商階級交換家庭工業品。經此交易之後，地主既有一億糧食，又有一億家庭工業品。其需要業已滿足，他們於是退出流通過程之外去了。小工商業者既得到了一億的糧食，他們

可以從事再生產的活動了。第二年再把第一年的生產和流通的狀態重複一遍，第三年再把第二年的狀態重複一遍。在這財富流轉的不斷重複裏，中國便長成了一種適應於這個財富流轉需要的文化。

這種文化的本質，在政治上所表現的就是張梁兩位先生所標榜的儒者的無爲而治的王道政治了。一來呢，是因爲佃農和小工商業階級，安於低級貧困的標準，且日夜辛忙不休，把所有時間都佔據了，簡直沒有機會來問政。再來呢，因爲他們在生產和分配的過程中，亦無問政之必要。他們的正常的思想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三來呢，地主和官吏們，因爲把這簡單的農民生活，知道的非常透澈，逐漸認定它的必然性，除非外侮侵入，亦不欲多所變遷。因此這種無爲而治的王道政治成爲士農工商所擁護的一種理想了。在宗教上所表現的是聽天安命主義。一來呢，因爲在自然科學未發達的時候，農產物之豐收與歉收完全視自然的氣候爲轉移。莫怪中國的宗教要以天爲法了。二來呢，是因爲自然的變化，大半識不透，遂不免疑心此中有神明在支配，莫怪社會要相信命運了。三來呢，是因爲聽天安命之說，最足以維持地主們的身份，因此等級的觀念便出來了。在哲學上所表現的是窮理盡性以至乎命。命即天命的意思。在這一點上，中國的哲學與宗教合而爲一。在文藝方面所表示的是輕鬆、優閒、含蓄、自然。如詩經和陶淵明的詩篇並唐宋的山水畫，都是可舉的例證。一言以蔽之曰，中國整個的固有的文化只是中國的簡單農村生活的一種意境而已。

由此可見，西歐的民主政治，從維持中國的土地生產力一點上說，是不但無益而且有害的。回憶歐洲在中古時代，社會的最主要的生產的手段亦是土地，它亦不曾需要民主不是？近代的歐洲不然。因為在近代歐洲的社會內，生產力比較從前進步了。社會全體的生活不僅依賴土地，而且最主要的要靠資本。因此近代歐洲的文化不僅需要能維持土地的再生產與再分配的流轉的過程，而且要能維持資本的再生產的過程。為滿足這個新興的要求起見，民主的政治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初期，便成為全體社會所擁護的制度了。

伴着人類征服自然的能力的進步，人類已可利用機器來生產了。近代的機器如同古代的土地一樣，人們如使用它來生產，其所生產的物品，不僅能維持直接參加者的生存，而且尚有淨餘來維持機器所有者的優裕豪華的生活。從人類全體的物質生活的享受上說，機器的發明無論對於任何的階級都是比較的有利益的。為圖資本的迅速的積累起見，除了使機器為資本家所有外，機器無法改良和進步。由是在近代的社會之中，除了舊有的階級之外，尚增添有兩個新興的階級，其一是生產剩餘的工業勞動者階級，又其一是坐食剩餘的資本家階級。由是在今日的生產品內，財富在各階級之間流轉的過程較為複雜。假令在這一社會內，農業的生產因為人口增加之故，產量亦增加一倍，即農人以價值六億石糧食的投資，內中包含三億石價值的農具，生產八億石的糧食、兩億石的原料。工人以五億石價值的投資，內中包含兩億石價值的（均以糧食計算）的機器，一億石價值的糧食，兩億石價值的原料，生產出十億石價值的製造品，內中包含五億石價值的家庭工業品，三億農具，二億工業機器。當生



產完畢之際，農人以四億糧食，工人以五億家庭工業品繳納地主和資本家，作為他們的地租和利潤。資本家需要兩億糧食，地主需要兩億石價值的家庭工業品，二者既各相需而相給，各別皆有滿足。工人在其所餘五億石價值的工具財中，留出兩億石價值的工具財出來，作為自己的生產之需。以三億石價值的農具向農人換進一億石價值的糧食，兩億原料。經此交換之後農人和工人的資本均已收回，他們於是又可進行再生產了。但我們應強調的，即在資本主義急劇進步的時代，他不但要維持資本而且要累積資本呢？

當資本家階級出來之後，他們的富力雖然強大，但政治的權力無有。可是他們如沒有政治的權力在手內，他們的營業便要感受許多的不便。例如他們要把貨物賣到極遠的地方去，並要從極遠的地方買進廉價的原料與糧食回來，地主因為糧食與原料的價格的低落，當然便要出而主張保護農業了。這便是地主和資本家階級衝突的第一點。又資本家又到農村去吸收農工，直接提高了農工的工資，地主當然亦

要出而反對了。又加資本家爲了賺錢起見，不惜在貨物裏面滲假，不惜無情的僱用婦女和兒童，並在市場不景氣的時候，任便開除工人，這均不合於農村社會的傳襲，地主利用他們政治的權力，亦不免出而干涉。爲打破這些障礙起見，他們均非爭取政權不可。他們爭取的目的乃在維持資本的流通與增殖。在資本主義誕生之初，資本的維持與增殖恰好對於社會全體均是比較的有利的。於是資本家爭取政權的活動便得到了大多數的擁護。他們的口號是「讓我們用我們自己的方法作我自己的買賣！」於是近代的民主政治便出現了。由此可見近代的民主政治在當初發生的時候，確是爲了促進資本自由的權利。

爲什麼民主政治在中國屢試而屢敗呢？就是因爲中國永遠停滯在農業的階段，無論任何的階級都不感在維持土地生產力一點上，有捨君主而取民主的必要。中國的工業發展到今天，始終沒有造成一個可與地主階級對抗的資本家階級。因此中國的民主政治不爲舊社會所竭誠擁護。

然則中國就不需民主了嗎？我以爲這個問題的答覆須要看中國的將來的工業是否去走資本主義的老道。假如是的，中國自然需要民主了。假如不是，中國亦不是就完全不需要民主，但只需要由資本家階級所領導的民主就是了。伴着人類征服自然的力量量的進步，和人與人間的關係的進步，今後國民生活最主要的依據，我以爲既非土地，亦非資本，而是有計畫的集體的勞動。現在土地萬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中國的社會不復需要儒家道家的無爲的政治。資本萬能的時代亦已經過去了，所以我們亦不需要保護資本家的營業自由的民主的

憲法。但有計畫的集體勞動萬能的時代，我以為尙未過去，而且正在發展。例如蘇聯的計畫經濟的成功和英國今日國營企業的成功，似乎均在對我們暗示，中國今後還有一個勞動萬能的時代。為迎接這個新的時代計，我以為今後中國的建設須要由中國有計畫的集體勞動來領導。同時中國的民主的政治亦需要這個偉大的有計畫的集體勞動來領導。正如蘇聯的計畫經濟是由共產黨來領導和今日英國的建設是由英國的工黨來領導是一樣的。

保護農業自由權利的儒家的政治哲學在土地萬能的時代很好，可是在資本萬能的時代便不好了。保護營業自由權利的民主政治在資本萬能的時代很好，可是在集體勞動萬能的時代便不好了。世上還有什麼偉大的生產的能力比得上計畫的集體勞動麼？中國的民主政治，經過這些年的失敗之後，我們似乎應該有一個澈底的覺悟，即除了有計畫的集體勞動外，民主政治在中國無論由任何哲學家來領導，都好像一座倒立的金字塔，它永遠是站不住的。

我對於中國政治問題的根本看法

——最後答覆梁漱溟先生和張東蓀先生的指教——

在觀察三卷十四期上，我曾對於梁漱溟先生的政治主張發表了一點批評，附帶也論及了張東蓀先生的政治意見。在十六期上，張梁兩先生對我，均有一點解釋和指教。既然梁先生一再聲明，他的政治主張的全貌不久便要發表了；他在觀察上的零碎思想，還不能代表他的全部意見，請我們先莫要加以批評，那麼，我便只好等待他的全部理論主張發表後再說。張先生說，他的根本主張與我相差不遠，既然相差不遠了，我實在也用不着多講。然則，我還有什麼話要說呢？我所要說的，只是張梁兩先生和我對於中國的政治問題的認識，在根本上，似乎尚有不同的地方。因此，我覺得，我如把我對於中國政治問題的根本看法，澈底表明一下，也許還可以減少我們彼此之間的不少的誤會。

我覺着任何有益於大眾的物質幸福的政治主張，其所以不能實行，多半不是由於這種理想缺乏哲學的根據，而是由於他與特權階級取得收益的方式相違背。耶穌基督的博愛主義之所以不能實行，確是由於他與羅馬的貴族取得收益的方式——土地和奴隸相衝突，並不是由於他的主義不偉大。我們知道，耶穌一生的使命都在以救主的資格來解放被壓迫的貧民及奴隸，攻擊那個壓迫同胞只圖私利的階級，並且常向人發出警告，上帝一旦震怒，必定要把你

們那些壓迫別人的人來處罰和治罪的。你能說他不偉大麼？偉大是夠偉大了，無如他的主義與特權階級的取得收益的方式相違背，結果他便被犧牲了。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之未能忠實實行，亦不是由於三民主義缺乏哲學根據，而是由於他的三民主義與大多數國民黨的取得收益的方式相衝突。例如三民主義是要發展民族工業的，但政府的大員就有人在做洋買賣，因此他便要顯三民主義的指示，而極力爲美貨傾銷謀便利。三民主義是要實行廉潔政府的，但有許多人在作囤積居奇的勾當。三民主義要平均地權，國民黨員就有不少的大地主。三民主義要實行民主政治，國民黨中便有不少人喜歡獨攬大權。國民黨員與普通任何一個人一樣，他在行動的時候，絕不受他所相信的三民主義支配，而受他們自己的取得收益的方式支配，因此三民主義便爲特權階級的取得收益的方式所毀壞。社會主義之不能執行，當然更是因爲他與資本家階級取得收益的方式資本相衝突的原故了。總括來說，就是任何有益於大眾的物質幸福的政治主張之所以不能實行，都是由於與特權階級的取得收益的方式相衝突，而爲特權階級所反對的原故。

假令我的這種分析可以成立，那麼，我便覺得近代的民主政治和社會主義的思想家，在他的開宗明義的第一頁紙上，都須對於特權階級表示態度。假如說一個人的關於民主政治和社會主義的言論，是極力主張或擁護被壓迫的各階級聯合攏來，以流血或不流血的手段，推翻壓迫的階級的，那麼，我便覺得這種主義大有實現的餘地。我所謂的被壓迫的階級是指那些在取得收益的方式上與特權的或壓迫的階級立於對立地位的一切的階級。假如說，一個人

主張民主和社會主義的人不去主張或擁護被壓迫的階層，或不是主張這些在取得收益的方式上與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站在同一戰線上的各階層，必須一齊聯合起來，推翻壓迫的階級的，那麼，我敢說，他的政治主張，無論說的如何好聽，但因他不能推翻特權的階級的統治地位，其結果一定是不能實現的。這一種的政治主張，因為他沒有實現的可能，我不能不說，他是空想的、虛偽的和無效的。前一種政治主張，因為它採相反的態度，並有實現的餘地，我却不能不說它是科學的、實際的、和有效的了。舉例來說，比如孫中山先生的排滿與漢的政治理論，他是主張被壓迫的漢族聯合起來，推翻奴役漢族的滿清政府，而不讓一個滿人混入革命的大本營中，所以中山先生的排滿與漢的政治理論，便成了功。反之，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雖然比較的精深博大，但他却没有主張把那些在取得收益的方式上與三民主義立於對立地位的人，如拉用軍餉的軍閥，媚事帝國主義的新貴，便利外貨在中國市場上傾銷的買辦，捧上欺下貪污中飽的政客、流氓、豪紳，一致趕出革命的大本營之外，而把他當做革命的對象。相反地，三民主義的敵人均混入了三民主義的革命大本營中，所以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便未成功。

梁漱溟先生的系統的或正面的政治理論，雖然我們尚未看見，但他的系統的政治理論的面影，我們已看見了。他的面影是什麼呢？是要由少數的高明深睿的哲學家，來製出一個救國大計，並且這個救國大計，祇可由極少數人討論，而不能付之多數表決。可是對於這些高明深睿的哲學家的取得收益的方式則未一字提及。假如世上竟有一些哲學家，他們雖然在一

方面，把哲學也學得極其精通，可是在他方面他們却也係特權階級的代言人，或極易與特權階級謀妥協，如像德國的黑格爾，極力擁護普魯士政府，尼采極力擁護超人，奧地利的全權主義社會哲學家史盤極力擁護納粹，和中國的康有為極力擁護滿清政府。他們在哲學上均有極大的造詣。假令現在他們均一一現身於中國，而為梁先生所賞識，叫他們來給中國製定一套救國大計，在製定之時，並只許他們極少數人討論，而不能付之多數表決，是不是就可救中國呢？假令不幸中國的救國大計，果由這一類高明深容的哲學家來製造強制的付之實行，其結果不過使中國迅速滅亡而已，尙何救國之有？我不是說，梁先生所指的哲學家就是這一類的哲學家。我的意思只是說，哲學家也可分為兩個絕然不同的門類，其一是專以擁護特權階級的利益為使命的哲學家，又其一是專以擁護被壓迫階級的利益為使命的哲學家。假令不把這一點分辯清楚，徒然提出一個空洞的高明深容的哲學家的口號，我所最耽心的，就是恐怕不幸中國落入在這些代表納粹思想的哲學家的魔掌下，而把中國淪為德國第二，或把中國永遠沉滯於半殖民地的階段而永不得翻身。激溟先生！我真是害怕得很啊！不知先生亦曾看出這點危險否？我看太危險了！太危險了！太危險了！

梁先生在他答覆我的短文內，曾以師長的口氣，婉勸我說，「我只勸樊先生且慢一點把旁人看得那樣不中用，而以好學深思領導青年，則於大學教育為幸多矣！」我願答謝梁先生的，即我深願努力做到以好學深思領導青年這一點。但我同時却也要向青年指出什麼思想不中用。我在世紀評論一卷二十二期上曾指出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學說的不中用，和在去年三

月一日的天津大公報上曾指出儒家哲學的不中用，在知識與生活第十六期上曾指出張君勱的憲政主張的不中用。我覺着，我既然在中國這個角落上，負有小小的文化的使命，而且又是一個學經濟學的人，除了教課之外，假如我對一切時下的思想都一概靜默無言，而不從經濟的觀點，去發表我的無畏的批評，我覺着我便有對不起自己的地方。我相信真理愈辯而愈明，所以，我要繼續指出什麼思想不中用的批評。

張東蓀先生在他政治理論裏面，不知是否肯承認政治含有階級性，假如說他不承認這一點，我看我的批評，至少，還有一半的價值存在。假如說，他承認這一點，那麼，我的批評便將全部失掉了它的存在意義。我以為世上也沒有什麼從天而降的真美善均具備了的政治主張，除非他所喊出的是代表被壓迫的人民的聲音。

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於北京大學

評「自由」社會主義

——從蕭公權先生的「二十世紀的歷史任務」說起——

蕭公權先生在「世紀評論」二卷五期，曾以一種歷史的眼光，指明「二十世紀的歷史任務」在於實現「自由社會主義」，而實行的方法，借用中國的一句老話來說，是「先禮而後兵」。先禮是什麼呢？即以苦口婆心的態度來勸告特權階級放棄特權。他說：「我們馨香禱祝，願一切特權者……用斷臂的勇氣祛除貪私的惡習，為下一世紀的人奠定一個羣己兼善、自由寬裕的生活基礎」。「後兵」是什麼呢？就是蕭先生在另外一個地方又說：「我們願意接受友邦的物質援助，以為肅清叛亂，完成統一，推進建設的基礎，我們更應當實行孫先生的主張……」。《北平「平民日報」三十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專論》總括來說，就是蕭先生想以這種先禮後兵的方法來實現他的所謂二十世紀的歷史任務——實現自由社會主義。

但什麼是蕭先生的自由社會主義的內涵呢？他說，自由社會主義就是想以和平的方法來實現合理公平的經濟生產分配制度，並以之促進精神賦性的無礙發展的人生最高目的。我不承認在社會主義之下，沒有個人自由權利。我只承認在社會主義之下，只有資本家的營業自由權利或勞動者的饑饉自由權利和其他一切擁護資本家階級的營業自由權利的學說遭受打擊。我更不承認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民所得的精神賦性的無礙發展，會比在資本主義之下

所得的更少。我充分的相信在社會主義之下，既有個人自由又有機會平等。機會既平等了，精神賦性的無礙發展自然也就沒有多大的問題了。所以，我對於蕭先生所提出的自由社會主義，頗覺有加以修正的必要，即但談社會主義就是了，儘可不必在社會主義之上，再加上自由二字，以免引人發生在社會主義的制度下必然缺乏自由的誤解。我想，蕭先生的自由社會主義也許是指在蘇聯這社會主義國家之下，對於人民的言論、思想、和宗教的自由，限制過於嚴格，方纔發生這種矯正時弊的意見。我對於蘇聯實際情形，知道得太少了，不敢貿然來替蘇聯作辯護。但即以蘇聯而論，人民的自由權利亦且不在減少，而在增加。舉例來說，宗教自由便是其中之一，廢止死刑亦是其中之一。一言以蔽之曰，在純理上，社會主義比較資本主義平均每一個人必有更多的自由權利，這應當沒有什麼疑義。所以，即以蘇聯來做例，因為蘇聯的個人自由亦在進步，我仍不樂於接受蕭先生的自由社會主義的口號。可是，我應特別強調，即蕭先生在談自由社會主義之時，用語雖然欠佳，但意思也許並不壞。這即是說，蕭先生的主義，在動機上似仍不失為一種純潔而無瑕疵的高尚的政治主張。

可是蕭先生的實現自由社會主義的方法所含的缺點則是太多了。蕭先生的「先禮」的方法乃是以教育的方法，來勸特權階級放棄特權，我敢說這完全是空洞的和無效的。在歷史上，已有無數無量的政治哲學家，想以教育的方法來奉勸統治者階級放棄他們的特權了，但何曾有一個不失敗呢？柏拉圖失敗了。孔子失敗了。耶穌失敗了。又民國初年，孫中山先生強迫袁世凱當眾宣誓，擁護共和遵守約法，不也是失敗了麼？你能以自由社會主義

去勸告官僚不貪污，買辦不賣國，軍官不吃空額，和特務頭子不蹂躪人權麼？你更能以自由社會主義去勸告奸商不囤積居奇，財閥不大量吞金，豪門不盜竊外匯，和土豪不壓迫鄉愚麼？假如你能夠，那麼，你的自由社會主義便是聰明的、實際的和有效的。假如你不能夠，那麼，你的自由社會主義便是不智的、空想的和無效的了。

蕭先生在他的著作裏面一再提及英國「在工黨執政下，正努力循着共產革命以外的途徑去改造社會」。意思好像是說，中國的國民黨、青年黨、和民社黨也正在努力循着共產革命以外的途徑去改造中國社會。但中國的國民黨是英國的工黨麼？中國的國民黨，在本質上，不但不如英國的工黨，而且復遠不如英國的保守黨。例如政府曾濫權逮捕北京大學的學生鄧特，……施以嚴刑拷打，這都是英國的保守黨所不願做的。但國民黨則正在肆行無忌。不知蕭先生肯承認這話麼？英國的保守黨比中國的現存的諸合法政黨還進步，但還不能努力循着共產革命以外的途徑去改造社會，而必有賴於工黨。但中國的合法諸政黨，其本質尚遠不如英國的保守黨，而蕭先生却暗示着他們正在努力循着共產革命以外的途徑去改造中國社會。這還不是不智的、空想的和無效的麼？

最可令人驚訝的，就是蕭先生原是根本不贊成流血革命的，所以方纔提倡自由社會主義。所謂自由社會主義，在大體上，當然不外是「小流血的革命主義」的意思。蕭先生能夠在中國國共雙方相互火併，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的今日，本其悲天憫人之懷，發而為救國濟民之論，藹然仁者之情，溢於言表；苟人而非木石，未有不衷心感激的。

可是，最令人不解的，是蕭先生在另外的地方，又提出第二個實現自由社會主義的方法，與先生的不流血的主義剛剛相衝突。這個方法就是上文所謂「後兵」的方法，就是蕭先生等「願意接受友邦的物質援助，以爲肅清叛亂，完成統一，推進建設的基礎」的論調。蕭先生在一方面，根本反對社會主義者以流血的方法來完成社會的改革，在他方面，却又極力主張以流血的手段來肅清「叛亂」。試問「叛亂」能夠以流血的手段去肅清麼？先生曾說，社會主義是不可以武力去消滅的，除非特權階級讓步，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的流血革命必定不可避免。現在我且引蕭先生自己所說的一段話作證：

十八世紀的政治特權階級無法遏止平民共政的時代潮流。他們遏止的企圖使人類多流了許多不必流的血。假使他們聰明一些，及時作必要的讓步，他們除了放棄特權之外，不會喪失其他的利益。二十世紀的經濟特權階級也難於遏止全民共生的時代潮流。他們也有兩條可走之路；及時讓步或執迷不悟，放棄特權或喪失人權。

這一段話，明明的說，特權的階級如不放棄特權，便要喪失人權。今日中國特權階級既未因先生的勸告而放棄特權，其第二條路，勢將「喪失人權」。既將喪失人權了，而先生又主張「我們願意接受友邦的物質援助，以爲肅清叛亂，完成統一，推進建設的基礎」，藉以遏止社會主義的潮流，「使人類多流了許多不必流的血」，並逼着中國的特權階級「除了放棄特權之外，還喪失其他的利益。」試問究有什麼效果呢？依照蕭先生的邏輯，既然沒有什麼效果了，但蕭先生却反要進而堅決的主張以流血的方法，來激起更多的流血。這恐不但會

使先生的自由社會主義成爲不智的、空想的和無效的而已。也許並將更進一步的使先生的自由社會主義成爲一種不折不扣的、虛偽的、詭詐的、兇狠的，而並且是專爲極端反動的特權階級謀利益的擋箭牌了。

自由的社會主義能夠在美國特權階級和在中國的特權階級手裏完成麼？蕭先生先勸特權階級讓步，來緩和社會革命；後因特權階級不肯讓步，社會革命不可遏止，爲了維持特權階級的利益計，復勸世界上的特權階級——美國的和中國的——一齊聯合起來，以窮兇極惡的手段，來肅清反對勢力。先生既然純然是站在特權階級的立場，並欲以各種不同的手段來維持特權階級的利益，那麼，請先生坦白的說，你是特權階級的代言人好了，爲什麼你還要來說你是什麼自由社會主義的提倡者呢？

假如蕭先生真是自由社會主義的提倡者，那麼，你就應該繼續勸告特權階級讓步，如果他們還是不讓步，那麼你就應該採下列的兩個辦法：一個就是保守緘默，一個就是自殺。可萬不能以自由社會主義者的身份，轉而主張世界上的特權階級一齊聯合起來以武力來消滅「叛亂」。因爲這已不是一個自由社會主義者所應說的話，而是一個反民主和反社會主義者所慣常發表的妄言了。

十年來中國政府威信的隆替

七七抗戰的發軔，增加了國民對於政府的極大的信心。這個信心的增加不是逐漸的而是飛躍的。因從七七事變前兩年起，政府對於日本的侵略，總是隱忍退讓的。自從民國二十四年中日親善協議開始（一月），而敦睦中日邦交（二月），而梅津何應欽協定（六月十日），而土肥原秦德純協定（六月十八日），而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成立（十月），而冀東防共自治政府與滿洲國交換使節（二十五年八月），而中日經濟開發協定（十月）——津石鐵路敷設，塘沽築港和白河水利灌溉，——而冀東政府的特殊關稅的實施，……這一連串的事實，都使國民在心理上，有一種恐怕政府沒有反抗日本侵略的決心，可是政府在七七事變發生之後，忽由隱忍退讓的態度，一躍而為堅決抗戰的態度。那時除了少數的漢奸而外，全國的國民沒有一個不在他的心坎裏很虔誠的默頌蔣委員長萬歲和國民政府萬歲的。以我個人來說，我見着在蘆溝橋事變發生之後，蔣先生在他的七月十九日的聲明中，毅然決然的表示他的對日抗戰的決心，此時我心裏的快樂，完全是政府所賜予我的一種意想不到隆重的禮物。

從七七事變一起，政府對人民所表現的對日抗戰的領導的行為確是太好了。由上海三月抗戰，而台兒莊抗戰，而鄂北大捷，而長沙三次大捷，在一方面，政府領導人民的力量增

加。在他方面，人民對於政府的信心，更有飛躍的增加。此時政府與人民在情感上的交流，完全合而為一。這在我的半生中是破題兒看見的第一遭。可是，隨着戰爭的進行，政府逐漸的暴露出一連串的惡劣的政績，使國民逐漸對政府喪失信心，到現在似乎已經到了一種無法挽回的程度了。舉例來說，比如在軍政部兵役署署長被鎗斃的前後，國民眼着或身受着政府的兵役官員虐待士兵和營私舞弊的行爲，國民於是對政府的兵役喪失信心。自政府採用以廉價拋售美金儲蓄券美金債券和黃金以來，國民對於政府的財政也喪失了信任。一來呢，因爲美金儲蓄券和美金債券的價格定得太低，每元美金纔合法幣二十元。在三十二年重慶的物價指數約莫漲了一百四十三倍。美金在戰前值三元三國幣，故美金一元應值國幣四百七十一元，可是政府只賣二十元，所以當時用二十元法幣買美金一元，等於戰前法幣一角四分買來美金一元；這於私人的利益極多，但於國家的損失很大；我們莫要忘記了，中國從美國所借進五億美元中，約有二億美金都是用這種廉價的方法，放入私人腰包裏面去了的。二來呢，政府在三十三年八月舉辦黃金存款（五百七十萬兩左右）的時候，不但官價低於市價，而且在黃金提價之先，政府的官員便把消息走漏出去了；這充分的暴露了政府的財政官員的貪贓枉法的罪行。三來呢，政府原想以美鈔與黃金政策來平抑物價，但結果物價不但不因拋售美鈔與黃金而平抑，反因黃金的拋售而暴漲；這在今年三月政府的金融緊急法令實施之前夕，表現得極真切。國民因爲親眼看着政府的缺乏管理物價的能力，和政府金融人員的貪贓罔法的罪行，國民於是不但對於政府的軍政失掉了信仰，而且對於政府的財政金融大員也都喪失了

信心了。在抗戰勝利之後，政府在接收敵偽產業的時候所表現出來的成績，幾乎與公開行劫的盜匪的行爲相同，由是而全中國的國民，不但對於政府的軍政、財政不信任，並連政府的一切的官員也都不信賴了。在抗戰勝利之後，國民對於政治協商會議所議定的五項協議，無不希望付諸實施，可是不久政協便被破壞了。政協的被破壞，國共雙方雖然都有責任，但從一個老百姓的立場看來，政府所負的責任恐怕就要更大。我們可以舉出一連串間接的證據來指明政府所負的責任更要大些。比如聞一多教授的慘案和這次武漢大學的慘案，都足表示政府沒有遵守政協的精神。自從政協決議破壞以來，政府在國民面前所表現的，是時而尊重但又時而破壞人民言論、集會、結社、出版之自由權利的各種狂妄的暴行。莫怪今日之國民不但對政府的兵役、財政、經濟喪失了信仰，而且對於政府的行憲的決心也都無法信任了。我以爲國民對於政府今日的信用的喪失，正如昔日信用的獲得，亦完全是由政府自己製造出來的。

固然政府在這抗戰的八年中，對於反抗侵略一點，確有大功，同時國民始終也不會忘記政府這個領導國民抗戰的功勞。可是政府亦不能因爲有此對日抗戰之成績，便以爲其在兵役上、在財政上、在經濟上、在接收上、和在人權上所表現之愚蠢、貪污與暴行，舉凡所有的國民，都不應加以批評、指摘和反抗。同時國民亦不能因爲崇拜政府領導抗戰的功績，便對政府的愚蠢、貪污與殘暴也都隱忍不言。政府既是人民的公僕，政府便當不要貪污，不要橫暴，和不要愚蠢過度。今政府既然犯了這些禁令，人民當有裁判政府的權利。

可是今日政府很奇怪，不但肯接受國民的批評，反謂今日中國一切的罪惡都是敵黨製造出來的。別的可以說是敵黨造出來的，難道政府自己的愚蠢、貪污與暴行也是敵黨製造出來的麼？除非國民個個都是三歲的小孩子，我想這答覆一定是肯定的。我很懷疑政府今日所採行的武力統一的政策果於政府有益。溯自民國初年以來，標榜武力統一的政府已經有幾個了，但結果都失敗了。袁世凱怎麼樣？吳佩孚怎麼樣？我看，這不但是無益的，而且是有害的。在今日，國民心中一切都明白，內戰不是爲了人民的利益。政府縱令以武力把中國統一了，國民今日恐亦不相信政府的愚蠢、貪污與殘暴可以改善。

而對着當前的事項，我們須要抱定幾種決心：（一）自己須要站住自己的崗位，做到完全依靠自己的勞力可以吃飯。特別的是青年在求學時代，除了體育德育和羣育之外，應當努力學得一種專門智識或技能，以爲異日生活及人格之保障。（二）我們知識的青年須要以共同的力量，揭破政治和社會上的無知、貪污、與殘暴，並加速他們的崩潰。（三）我們並應以共同的力量，督促和幫助建造出一個聰明、正直和合理的政治機構來。這便是我在紀念七七的時候所懷抱的一點要求、

三六年七七紀念節，於北平。

階級 · 政黨與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的意義在限制特權階級的濫權漁利的行爲，和增加被特權階級所壓迫的廣大階級的政治權利。所以，在十九世紀時代，民主政治的意義便在限制皇族、僧侶、貴族等特權階級的特權，和在增加被特權階級所壓迫的布爾喬亞階級和那些與布爾喬亞階級立在同一陣地上的勞苦階級的權利。果然，其時民主政治實行的結果，凡屬一切代表皇族、僧侶和貴族等特權階級利益的最保守的分子們都被迫趕到上院的一個角落裏面去了。而代表被壓迫的廣大人民利益的鬥士，便實際掌握了下院的政治。二十世紀時代的民主政治，在限制資產階級的獨占的權利，和在增加爲資產階級所壓迫的勞動階級的權利。果然，其時民主政治實行的結果，各國的工黨逐漸當權了，工人的集會、結社和罷工等權利悉被合法化了。同時資本家階級所享受的權利，在某種程度以內，確是受限制了。總之，無論在歐美任何先進的國家內，民主政治施行的結果，必然是特權階級的特權受限制，廣大的被壓迫的各階級的民權被擴充，而不是廣大的被壓迫的各階級的民權被減少，特權階級的特權反而被擴充。

可是在中國這個國度內，有一個特殊的怪現象，即自民國二年起，每度施行「民主政治」的結果，均與歐美各國的史實全相反對，即每度推行「民主政治」的結果，均不是特權階級的特權被減少，而是特權階級的特權被增加。在民國二年以前，中國尚未推行「民主政

治」，袁世凱的野心雖不小，但他尚不敢公然做皇帝。可是，在民國二年以後，中國已經有了「民主政治」，袁世凱却當起皇帝來了。在民國十一年時候吳佩孚的權力雖不小，但他尚不敢擁他的主子曹錕來做大總統。可是自民國十一年後，國會政治恢復了，曹錕却以賄選的方法做起大總統來了。現在我們中國又在推行「民主政治」了，凡屬愛好民主政治的人，無一不在那裏希望着，這一次的「民主政治」的進行，必然要超過以往各次的成績。因為中國的現階級，已經不是訓政的階級，而是憲政的階級了。在憲政的時期，當然要比在訓政時期的民主作風要完美。這一次的「民主政治」，雖然人人都在那裏馨香禱祝的說，牠一定要比袁世凱時代的「民主政治」更好，並比曹錕時代的「民主政治」要高明萬倍；可是人民對於這次「民主政治」所懷抱的虔誠的盼望，是否全部的或局部的實現了呢？或特權階級的特權是否在這次國代會議召集之後，比較在國代會議召開之前相對的減少了呢？是否中國的廣大的為特權階級所壓迫的人民，在政治上的權利有增加呢？在這次國大會議召開之後，中國的被壓迫的廣大人民，在政治上的權利，我很願意說有增加，並很願意說，特權階級的特權其後實在有減少。可是在事實上，他沒有呀！我雖然懷着滿腔的熱忱願意指馬為鹿，可是徒待我的滿腔的熱情亦不能變更馬不是鹿、或鹿不是馬的這個天然的事實呀！我又是一個以教書為業的人，他的本分就要不說謊話。我雖然有時爲了某種的利益，也願意說謊話，但我的良心和是非的意識，不容許我這樣做呀！

我只消舉出一個極小的例子，便可知特權階級的特權，在這次國大會議召開之後，沒

有絲毫的改變。以「四九」的慘案來說，本來是因為在戒嚴的夜裏，暴徒在北平國立師大公開行兇，鳴鎗示威，劫走八位同學，把他們打的頭破鼻傷，並在劫走的車途之上，流血約半里路遠這一暴行所刺激出來的。可是北平市黨部的黨委吳鑄人先生却反而說，這次學潮是由「三位教授」的言論刺激出來的。單舉這一個小例，也可看出，在這次國大會議之後，官權沒有絲毫減少，民權沒有絲毫伸張。黨部的人動輒就說，無論如何，在國民黨之下的言論自由，比較在「共匪」區域裏要多一點。這話也許對也許不對。可是國民黨却不能以此為理由，自己破壞自己在憲法上所賦予人民的自由權利呀！國民黨既是一個大黨，那麼他的一切的行為便當以憲法為準繩，絕不能以「共匪」侵犯人民自由來辯護自己侵犯人民自由為正當。假令這種邏輯是對的，那麼，國民黨便儘可根本不要憲法。可是國民黨又要憲法，然則國民黨的黨官又為什麼不遵守憲法呢？這豈不是明白的說，國民黨黨官的特權在國大會議召開之後，依然沒有什麼減少，或人民的基本自由權利亦是依然沒有什麼增加的鐵證麼？

小的例子已經舉了，現在我請舉一個大的。我們不能不說，國民黨今日的特權已經夠大了。在國民黨之中，蔣先生的特權更是大的無與比倫。無疑的，這次行憲的目的是在限制國民黨的特權，尤其是在限制蔣先生的特權而不在增加它。國民黨在行憲之前，一再的宣言，他們要「還政於民」。所謂「還政於民」的意思當然是指國民黨在行憲之前，政權太大的意思。然則，在行憲之後，國民黨的特權，尤其是蔣先生的特權便應當略有減少才是。至少亦應把牠減少到憲法所容許的範圍之內纔是。可是，在事實上，却正相反。即在行憲之後，

蔣先生的特權不但絲毫未減少，而且反而有增加。本來蔣先生，在原来的憲法上，是沒有這種特權的。可是，今次的國民大會，在選舉蔣先生為首屆大總統以前，不但不想減少他的特權，反而增加他的特權。為達到這個目的起見，國代大會硬於四月十九日通過動員戡亂時期的臨時條款，全文如下：

茲依照憲法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款程序，制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如左：總統在動員戡亂時期，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得經行政院會議之議決，為緊急處分，不受憲法三十九條或四十三條之所規定程序之限制。

國民黨，尤其是蔣先生的特權，自這條款通過之後，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大有增加，至少，亦是他的原来的特權得到了合法的保證，完全是無可置疑的事。這即是說，這一次如同以前的各次，即中國每度施行「民主政治」的結果均與歐美各國推行民主政治的往例完全相反。在英美各先進國，民主政治推行的結果是特權階級的特權減少，平民階級的政治權利增加，在中國這個國度裏，「民主政治」每度推行的結果是特權階級的特權再增加，人民大眾的政治權利再減少。在袁世凱時代如此，在曹錕時代如此，在現在似乎亦是如此。

為什麼有這種奇怪的現象誕生呢？我以為這個很簡單。即在英美的國家內，領導實行民主政治的政黨不是代表特權階級利益的黨，而是代表被特權階級所壓迫的人民大眾的黨。被壓迫的人民大眾，在沒有代表他們的利益的政黨來領導他們，為他們廣大的利益，來與特權階級競爭選舉時，他們都是一些單獨的，意志薄弱的或毫無能力的個人。他們好比一羣沒

有指揮總部的分散的士兵，最容易爲特權階級以威逼和利誘的方法，各別的擊破，或壓低他們戰鬥情緒，或逼着他們投降，或把他們迫入俘虜營，苦打成招，強教他們作出迫害他們自己的行爲。反之，被壓迫的廣大的人民，在有一個代表他們的利益的黨來領導他們，爲他們自己廣大的利益之故，來與特權階級競爭選舉時，他們便是一枝意志堅強，並力量雄厚的鐵軍。他們真的好像一枝鐵軍。特權階級絕對不能以各別擊破的方法來降伏他們。因爲特權階級已不能對他們施利用誘和威逼，所以他們便不會作出任何違反他們自己利益的言論與行動。由是他們在選舉票上所表現的意志便完全的或部份的是他們自己的意志了。以英國的經驗來說，在一八三二年前，自由黨尚未成立，政治被控在保守黨的前身 Tories 手內，布爾喬亞階級的意志便無法表現。在一八三二年以後自由黨成立了，布爾喬亞階級因有自由黨作領導，然後他們的政治的權力方纔有巨大的增加。可是勞動階級的意志，却爲保守黨或由黨所歪曲。直到一九一四年，勞工黨成立之後，然後英國勞工的階級在政治上始有鬥爭的能力。我不是說英國工黨所代表的利益便是英國的真正無產階級的利益，我的意思只是說，任何政治上被壓迫的階級，除非有一代表他們的利益的黨來教育他們，領導他們和組織他們，他們是會被迫而作出種種違反他們自己利益的選舉的。十九世紀以來，英國的特權階級的特權之所以逐漸受限制，完全是由於英國被壓迫的廣大的階級有一逐漸堅強的政黨來代表他們的利益的原故。所以在英國這個國度內，人民的選舉權擴充得越普遍，特權階級在政治上的特權便越少，平民大眾的政治上的權力便越高。在英國如是，在歐美其他的先進國家裏

亦如是。

反之，在中國這個國度內，社會上只有代表特權階級的利益，或代表買辦階級地主階級和官僚資本家階級利益的政黨。不成形的新興的資產階級，在特權階級的壓迫下，是沒有單獨的代表他們利益的政黨存在的。廣大的農民，沒落的小資產階層和無產者階級，根本便沒有一個堅強的政黨來領導他們，教育他們，組織他們，發揮他們高度的自覺和戰鬥的能力。他們一來呢，因為他們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雙重壓迫下，根本便難有自我階級利益的覺醒，而常為在封建時代的宗教迷信、醫卜星相所麻醉，並夾雜着其他的哲學上的麻醉劑；再來呢，因他們飽嘗着官威和鎗桿所給與他們的苦頭，養成一種麻木的心理狀態，而不敢有所反抗；三來呢，他們根本沒有求知和聯絡的機會，他們在特權階級的面前，真像一羣柔順的羔羊，毫無反抗的意志與能力。他們在特權階級的面前，既然如像柔順的羔羊在虎狼面前一樣，幾乎駭得說不出話來，請問在選舉的時候，他們還敢在代表特權階級利益的黨官們面前，說半個否字嗎？他們既不敢在代表特權階級利益的黨官們面前說半個否字，並且他們因為幾千年來就養成了一種奴顏婢膝的習慣，當然在選舉的時候，一般的黨老爺們要叫他們選什麼人，他們就要選什麼人了。代表特權階級的黨老爺們於是跟着便叫他們選舉特權階級中最愛特權的分子，結果他們所選舉的亦是這等這等。因此，在每次「民主政治」施行之後，都是特權階級中最愛特權的分子當了選。而且這些分子，經過選舉的淘汰，尚必比較選舉以前當權的分子更愛特權，末後，又必選出一個更愛特權的分子出來作領袖。所以中國

的「民主政治」，在每度試行之後，特權階級的特權不減少而反增加，平民大眾的權利，在每度試行之後，不增加而減少。由是便顯出一個極端矛盾的現象，即在中國這個特殊的國度內，人民大眾的權利恰與中國的「民主」主義的推行，形成一個反比例的變化。

把這個根本的道理明白之後，我們便可進而論究什麼是空想的「民主政治」，什麼是科學的民主政治了。空想的「民主政治」就是以代表特權階級的政黨來領導的「民主政治」，科學的民主政治就是以代表被特權階級所壓迫的政黨來領導的民主政治了。假令一個國家，在推行「民主政治」的時候，不讓代表被壓迫的廣大人民的政黨來領導，而把他們一脚踢開，或置之死地，但讓代表特權階級的政黨來包辦選舉，那麼，這種政治便是空想的「民主政治」而不是科學的民主政治。科學的民主政治推行越多，人民的權力便越大，空想的「民主政治」推行的越多，特權階級的權力便越大。除非一人是傻子，他才能夠否認這種顛撲不破的真理。

以此立論作根據，我敢斷言的說，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是空想的民主主義，而不是科學的民主主義。因為科學的民主主義的特質，在他能很清楚把握這一點，即民主的政治必須由代表被壓迫的廣大人民利益的政黨來領導，而不能讓給特權階級來領導。可是在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之中缺乏這個特質，因此，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不是科學的民主主義而是空想的民主主義。空想的民主主義除非經過科學的洗禮，絕無實踐的可能性。亦就是說，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除非有一代表被壓迫的人民的利益的政黨來領導，海有枯，石有爛，但中山三民主

義絕無實現的可能性。國民黨，除非清黨，除非把他黨中的特權階級肅清，並把代表被壓迫的人民大眾利益的分子加入進去，他絕不能變成一個代表被壓迫的人民大眾的政黨，因此他亦絕無實現三民主義的可能性。

最後我所要大聲疾呼的，即民主政治的大道必須由代表被特權階級所壓迫的廣大人民利益的政黨來領導，假如他依然是由現存的代表特權階級的利益的政黨來領導，那末，我便敢斷言說，這種樣子的「民主政治」，無論採取什麼形態，依然必是一座倒立的金字塔，它在中國必是永遠站不住的。

三十七年四月廿九日於國立北京大學

現階段的中國經濟病症的癥結

——無知與貪污——

現在中國的經濟面臨着一個極危險的階段。其危險的程度，酷似一位患惡性癌症的病夫，經不起高溫度的焦燒，不顧死活的從萬丈高樓之上，縱身而下，現在可憐他這病軀，正落在這座萬丈高樓的半中間，在第一個頃刻裏，他實在是再危險沒有了。可是政府却並不能救助他，政府爲什麼不能救濟他呢？第一個原因是由政府缺乏經濟的遠見不能作長久通盤的籌劃，其次一個原因，是由於政府的無能，使許多經濟政策，實施結果，多配合不上公衆的利益。

一 政府缺乏經濟知識引起不治之疾

何以說，政府缺乏解救中國經濟危機的能力是由政府的經濟知識的不足呢？遠事且不說，單以增發通貨一項而論，政府如因財政上的赤字，繼續增加通貨，於越過一段時期之後，其在真實財貨的生產過程上，必然引起真實資本的減少，工業利潤的降低，投機利潤的暴騰，和國民工業的整個的癱瘓。在這國民工業已屆癱瘓的邊緣，提高利率固徒足以加速國民工業癱瘓的程度，但即降低利率亦不能夠救濟他。結果徒使政府的低利的救濟工業的

政策喪失信用而已。其在流通過程方面，必然引起物價的暴漲，而且越來越猛烈。物價既然上漲了，黃金和美鈔的價格當然亦必需跟着上漲的。在這物價繼續上漲的過程中，政府如不管理物價誠不足以壓抑物價上昇的火焰，但即令嚴格的管理物價可亦不能夠平抑他。再從平衡預算來說，政府原來增加通貨的發行乃在彌補政府的開支，孰料當物價正作劇烈的暴漲之際；通貨發行愈多，政府的真實收入反而越少，政府的真實收入越少，財政上的赤字便越大，財政上的赤字越大，政府所須增發的通貨越多。在這一時候，政府如果不再增發通貨，誠然不足以彌補政府財政上的赤字，但即繼續的增加發鈔的數字亦不足以彌補這個越來越大的虧空。總之，現在中國的經濟的病症幾已成爲一種不治之疾了。

二 舉例說明

現在容我從財政的赤字上說起。政府發行鈔票的目的，雖然旨在取得真實的物資，如軍糧軍服，鎗砲，和交通用具等類，以彌補財政上的真實的開支，但這必須物價增加的倍數小於發鈔增加的倍數和因發鈔而所引起的租稅增加的倍數二者之總和纔行。設使發鈔比租稅增加一倍，同時租稅再增加半倍，但物價屹然不動，當然政府的真實的收入，可以增加一倍半。設使發鈔增加一倍，租稅增加半倍，然而物價也增加了一倍半，那末政府的真實的收入便將與未增加發鈔數字以前一個樣了。設使物價不只增加一倍半，而且增加三倍，那末，政府的真實的收入便不但比從前更大而且還要更少了。在增加發鈔以後的真實的收入既比未

增加前爲小，當然政府越要增加鈔票發行的倍數了。可是政府越是增加鈔票發行的倍數，物價會將漲得更高。而同時政府的真實的收入比較從前更要越小。依據相同的邏輯，政府在財政上的虧空也就會越大了。像這一種打嗎啡針或注射麻醉劑的增發鈔票的財政政策，其結果只有使政府健康的體格越來越壞而已。

無疑的現在政府的真實的收入已是越來越少了。這從他的真實支出的減少上表現得十分明白。依據楊西孟教授的估計，（經濟評論第九期）政府在抗戰的前一年財政支出爲十五億元。在抗戰後的第一年，政府雖然增發通貨不多，但因物價變動極微，真實支出確有增加。因此其財政的支出合戰前的法幣漲爲二十二億圓。第二年之財政支出尙合戰前的法幣十九億圓。雖比戰後第一年爲少，但比戰前較多。自此而後，財政的真實支出便比戰前更少了。最壞時爲三十四年一月至七月只合戰前法幣五億元而已。在三十四年八月至三十五年底財政的支出，因爲日本投降，後方物價相對下落，收復區的物價以法幣來計算亦比較的低，再加上敵僞產業的處理，和國外物資的入口，財政的真實的支出回增，增到戰前一年的水準即合戰前法幣十五億圓之數。楊西孟教授的估計至此爲度。本年政府的新預算歲出原爲九萬三千億，今已增爲二十萬億，但現在物價已漲到戰前三萬二千倍了（根據上海批發物價指數），今姑以三萬二千倍的物價水準去除二十萬億，則今年財政的支出實值，可能只合戰前法幣六億餘元，實則將來情勢的演變必然比六億元更少了。由此可見，政府自從抗戰以來，雖然日在增加發鈔，但他的真實的支出，除開短短的二年之外，一直在繼續減少。今年的財政支出

的實值最多亦不過只值戰前的百分之四十而已。然而政府所需要的軍糧、軍衣、鎗彈、和交通器材各項不必比戰前更少。政府在軍事與交通上的真實支出的需要不少，然而政府可能供給的真實支出最多只合戰前的十分之四。供需相抵之後，所差此十分之六的真實支出，不增發通貨，誠然不能彌補，可是越增發通貨亦越是不能彌補。換句話說，即政府在財政上的赤字，假令其他條件不變，無論如何增加通貨的發行都是不能彌補的了。這豈不是變成一種不治之疾麼？

再從物價的暴漲上說，當着政府增加發鈔的數量並經過一段時期之後，此新增之貨幣便要來到市場上與舊貨幣競爭物資，然因現存的物資的供給，在短期內無法增加，物價於是漲高。物價漲高之後，握有遊資的人，為保持他的貨幣購買力起見，自然趨向黃金和美鈔。結果黃金和美鈔或美匯的價格當然也要隨之增加。政府未嘗不可以控制黃金和美鈔的價格，但這必須具備一條條件：即政府能夠依照官定的價格，無限制的供給黃金與美鈔，纔能達到控制黃金和美鈔的價格的目的。其他物資亦然。最可令人痛惜的，即政府在三十五年三月僅從美金五億元的貸款中，撥兩億美元來買黃金，只得了黃金五百七十一萬兩。這明白表示在通貨繼續膨脹的狀態下，政府不能以此有限量之黃金來控制黃金的價格，即政府絕無依照官定的價格，無限制的拋售黃金的能力。投機的商人，當然更明白政府的有限的能力，何況政府還故意的把官價定得太低呢？果然不錯，政府自拋售黃金之後，商人便盡量吞金。為時僅及一載，至今年二月，政府的黃金政策於是就不得不戡然壽終正寢了。政府出賣黃金，使得有

些人的投機致富。可是等到投機的人來大量吞金逼着政府沒有黃金再來出賣的時候，政府却又要跨下面皮咆哮起來。凡此都是由於缺乏經濟遠見而來。

關於美匯也是這樣。在甲乙兩個國家之間，甲國的物價如果步步漲高，但乙國的物價不動，或上漲較緩，然而甲國倘把乙國的貨幣的價值固定於一個不變的水準，其結果必致增加甲國的入超。這個道理明白的很。例如今有相同的貨物一束，平時在甲國賣一元在乙國也變一元，廣義的運費假定為零，匯率是一比一，此時無論甲國或乙國把這一束相同的貨物運去運來，當然均無差額的利益可言，這乃是一件極度明顯的事情。可是假令甲國的物價業已漲了兩倍，然而匯率不動，此時乙國為把這束相同的貨物從乙國運到甲國，買了兩元甲幣。再把他們匯回乙國獲得兩元乙幣，那末，乙國便可以多得一元的利差。除非乙國的商人是傻子，他們必然要把乙國的出口貨源源不斷輸到甲國來了。可是，乙國的商人在甲國賣了許多貨物之後，必要甲國的商人以乙幣來支付他，但甲國的商人在何處取得外匯呢？向政府既買不足，當然他便只有向外匯的黑市場上去買了。外匯的需要增多，而供給未增，乙匯於是漲價，乙匯在黑市場的價格已漲了，然而政府還把乙匯官價穩定不變，使乙國的貨物，在甲國市場上更增加。結果乙匯在甲國黑市場上的價格再漲高。同時，政府手中所控制的貶值乙匯，亦因拋售之後，缺乏來源，行至供給銳減，且因其他的考慮，非把乙匯價格提高不可，於是乙匯的官價便跟着黑市上漲。而這便是中國美匯的官定價格，每隔一些時候，又跟着黑市暴跳一次的原因。例如在對日抗戰之前夕，美匯的價格原為三元三角三。到了三十一年，

美匯的價格首先暴跳一次，漲為二十元。三十五年二月又暴跳一次，漲為二千零二十元，同年八月再躍而為三三五〇元，本年二月並再躍而為一萬二千元了。但美匯是否便會在此釘住不動呢？我的答覆是，絕不，絕不。因為自今年二月十六日起，外匯雖經調整為一萬二千元，但中國的物價當時已漲到一萬五千倍以上去了。然而美國的物價當時却只漲高百分之八十。這即是說美商以一元八角美金所買之貨物運到中國來，當賣法幣四萬九千九百五十元（即一萬五千乘三·三三元）如以美匯來計算，當為四元一角美金，是美貨的出口商以一元八角美金的本錢仍可以獲二元三角美金的毛利。這即是美國對華出超還要增加，美匯的需要還要增加，這暗示着美匯的官定價格必然不久又要再暴跳一次了。原來外匯的價格是受外匯的供給和需要的關係支配的。今政府一方面繼續控制外匯的價格，可是，在他方面，却又使外匯的需要大於供給，而使外匯的價格往上增加，這樣做法當然不足以達管理外匯的目的。美鈔與黃金如此，其他物價亦莫不如此。一言以蔽之曰，中國通貨膨脹的速度到了今日，外匯黃金與貨物的價格水準不平抑必上漲，即平抑也是要上漲的。

再就工業來說，在通貨膨脹的後期，當着工資與原料隨着通貨的膨脹繼續增加之後，工業的真實的資本勢當繼續的減少。一來呢，是因為工業家繼續不斷的消費其資本。而且越是耐久的工業其所消費的資本亦越大。因為工業的出品的價格是依照今日的物價計算，可是他的生產的成本是按昨日，昨日，或前幾年的生產元素的市價計算。無論如何的說，在成本會計上，生產元素的價格，都不如他們在市場上的價格漲得快的。工業家在計算利潤的

時候，是從他的出品的總賣價中，減去會計帳上的成本。即減去機器與原料和其他的生產元素在買進時的價格，而不是減去他們在今日市場上的價格。因此工業家在其商品總賣價中，除了利潤之外，所剩下來的準備金，到了機械原料和其他生產元素用完之後，必買進不了怎麼多的數量回來，結果工業資本遂減少了。但工業家往往消費其利潤，然而利潤中含有資本的價值在內，這豈不是工業資本家消費其資本麼？這大概是今日中國一般的情形。二來呢，是因工業受投機商人的壓迫。工業生產元素漲價之後，工業家因所留存的準備基金絕不足以維持同樣的生產的規模，往往向銀行貸款，而當銀行的款項借貸不到的時候，往往出售期貨於投機的商人。在出賣期貨的時候，往往係按照當時的價格，再按照過去物價上漲的速度，加一點，作為預賣的價格。可是，在商品生產過程中，成本可能漲的更高，至於高過預賣的價格，結果工業家的利潤，不但要為投機商人所吞噬，而且變成負數了。投機商人的利益既高，對於借入同樣的資本，勢必願意和能夠支付一種為工業家所不能支付的高利息，結果工業家於是便只有被迫而關門了。三來呢，是因為外貨傾銷的壓迫。因在本國的物價繼續上漲的過程中，政府硬把美匯釘住不動，結果徒使美貨在中國市場上較賤，國貨較貴。即使中國工業家不得不在他的成本之下，依照舶來品的價格出售他的成品，致使工業繼續賠本。工業家在這三種打擊下，其在成本與物價之間相差的鴻溝，於是越來越寬。政府不用低利的工貨的政策誠然不足以減少這鴻溝的寬度，但即用低利的放款的政策將亦不能填塞他，換言之，即中國的工業現在已在病入膏肓了。

但是這裏我們所要特別強調的，即中國的工業的資本，在一般的場合裏，雖在爲繼續的減少，但少數的兼營外匯傾銷和商業投機的準買辦資本的蓄積，仍然是在順利進行的。現在物價上漲的倍數既然超過政府增發通貨和因增發通貨而所獲得的租稅增加的倍數，那末，政府即令再發通貨當亦不足以救濟政府之窮迫，其結果徒使所增加之通貨大半化爲投機商人壟斷市場，抬高市價，侵蝕工業利潤，擴大美貨傾銷的遊資而已。現在中國政府所希冀的救急湯就是美國進口銀行的五億圓的貸款，但我以爲遑論五億圓的貸款，不足以挽回中國的經濟的病症，即十億圓也是無濟於事的。何則？政府不是早就向美國借過五億圓的巨款麼？且問那項借款把中國救了沒有？誰都知道，在該項借款中，有一大部份的美圓都把來以極賤的價格填塞在中國的官僚資本家和少數特大的發國難財的投機商人的錢口袋裏去了。

三 經濟政策與貪污

以上是說中國經濟病症的原因是由政府的金融財政大員缺乏經濟的知識所造成。假如說中國的經濟病症的原因只是由於政府的經濟知識的不足，尙還不足爲大慮。最可引爲不幸的，即中國的經濟的病症尙有一種幾乎無可挽回的原因在。

無疑的政府所採行許多的經濟政策，實施的效果，多不能與中國的大衆的利益相配合。政府採行壓低外匯的價值以增進美貨的輸入，原意想輸入大量物資，平抑國內物價，而結果反使中國的幼稚的工業被摧毀在萌芽的階段裏，同時又增加了中國進口商的利益。但那一些

人是在經營出入口貿易呢？又政府以吸收法幣爲名，大量拋售黃金，採用降低黃金的價格，使之低於市價的政策，結果徒然增加投機商人大量吞進黃金的利益。但那些人在大量吞進黃金呢？又政府爲了彌補財政上的赤字，不採激烈的增加租稅，例如累進所得稅和財產稅的辦法，但採發行通貨的辦法。誰都知道，以增加發鈔的數字來徵取物資，其在租稅上的意義，等於徵收累退稅。結果，徒然苦了一般小百姓，而使社會上形成了一種豪富的特權階級，但那些是豪富呢？我以爲在富裕的階層之中含有不少的高官顯爵的成份。根據以上的論據，我想大胆的提出一個假定，即中國經濟病症的根本原因，與其說是在經濟知識的缺乏上，毋甯說是在中國的官僚政治上。換言之，即中國今日的經濟的病症，應該由中國的官僚政治負責任。設個比喻來說，中國的經濟的機構好比一座偉大的古建築，而中國的官僚階級則似在這所古建築裏的羣鼠。可惜在這所古建築裏，沒有貓，當然羣鼠猖獗，弄得不堪收拾了！

世界經濟與政治進化的歸趨

除非我們是瞎子，我們必能看見，今日的好人政治，民主政治和社會主義，確有一種互相發揮，互相監督和互相策勵的並駕齊驅，向着人類最理智和最經濟的理想之路，邁步而前的趨勢。除非我們能夠對於這個進化的趨勢加以確切的把握，我們倘如參加實際的政治的生活，恐怕沒有不失敗的。

從經濟進化的大勢上說，我以為地主和資本家階級的存在，只是人類勞動的生產剩餘的力量進步的結果。這即是說，地主階級的存在，是由人在土地上耕種而所生產的糧食與原料，透過人類的分工與交易的關係，除了足以養活佃農的階級而外，尚有剩餘生產物，足以養活土地所有者階級，安度優遊歲月的生活。資本家階級的存在，是由人在資本上施工所生產的工業品，透過人類的分工和交易的關係，除了以養活工人階級而外，尚有若干的剩餘，足夠資本所有的階級日度奢侈豪華的生活。遠事且不說，單以中國而論，比如中國在黃河以南，地主的人數多，自耕農很少，或佃農很多。在黃河以北，地主很少，自耕農很多，但佃農很少。為什麼有這種對立現象存在呢？最主要的原因是由北方的土地貧瘠。在土地上所生產的些微的農產品，除足以維持農人在習慣上必不可缺的最低生存水準外，簡直沒有什麼剩餘的農產品足以維持一個遊手好閑的地主的階級，因此北方約地主自然少了。反之，南方的

土地豐腴，在土地上所生產的農產品，除了足以維持農人在習慣上必不可缺的最低生存水準外，還有龐大的剩餘，足供另一階級不事農作，而度優遊歲月的生活，因此南方的地主自然多了。在中國農村的冷僻的角落裏，除了地主之外，資本家少，工匠多，工人少；反之，在中國都市的繁華區域裏，工匠少，資本家多，工人更多。此中最主要的原因當然就是，因在農村的角落裏，工具的生產力太小了，例如木匠的斧頭，鐵匠的鉗與錘，農婦所用的紡車，在這些簡單的工具之上，所生產的貨物和役務，除了養活工具使用者本人而外，連妻子都不足以溫飽，還有什麼來給資本家呢？反之，在繁榮的都市裏，簡單的生產的工具早為複雜的機器所替代。木工也不復使用斧頭而用車床與刨床，鐵工亦然，紡工亦不再使用紡車，而用紡紗機。在這些複雜的機械之上，每年所生產的數量，透過交易的關係，不但足以維持工人的適度的生活，且尙足以養肥肥大的日度奢侈豪華生活的資本家階級，因此資本家階級便應運而生了。由此可見，地主階級的存在是由土地生產物有剩餘；資本家階級的存在是由資本的生產物有剩餘，而此二者，又皆隨人類勞動生產力發達以俱來。

在地無分東西，在人無分黃白，凡屬世界上的頭等的思想家和進步的勞苦的大眾，在今日的世界，沒有不厭惡地主的階級和資本家階級的。但我們莫要忘記了，在人類的歷史上，不但地主，甚至資本家們，都曾受過社會無上的敬崇。同時勞苦的大眾，在過去的歷史上，並也幾乎一直都在遭受人類的賤視與奴役。雖說在今日的世界裏，大眾所謳歌的是勞工神聖，可是我們莫要忘記了，財產神聖的觀念，亦曾為十八世紀的法蘭西革命和北美十三州獨

立的人權宣言的張本。最可令人驚訝的就是，同是地主或資本家的地位，爲什麼昔日如此的受人敬崇，今日如此的遭人唾棄呢？這個理由是很簡單的。昔日地主或資本家之所以受人敬崇，是因爲當時的地主或資本家有助於土地或資本生產力的發達。因爲當時的土地所有者便是土地的改良者。又資本所有者便是資本的創造者或資本生產力的改良者。莫怪他們要受社會的敬崇了。更進一步的說，他們之受社會的敬崇，最主要的原因實根結在他們的經濟能力上。但看他們在耕種的開始實與他們的同伴無以異，可是後來因爲他們的生活更勤苦或智慧更高，由是他們所積聚的土地或資本便越大，同時社會因爲分工和交易的關係，所得他們的利益也就越多。爲圖社會經濟的進步起見，人類在這一種情境下，寧願分配不均，而不願生產不豐。這便是地主和資本家所產生的經濟的原因。

可是除了經濟的原因之外，自始便有倫理的或宗教的原因存在。資本或土地的積累，既爲個人勤勞的結果，當然別人不能分享。十八世紀的政治思想家和經濟思想家之所以大聲疾呼的高唱個人的財產不但神聖而且不可侵犯，主要的是從正義的觀點出發。法國重農學派的大師屠果(Turgot)，曾說：「個人的財產爲個人勤勞的結果，神聖不可侵犯者也。」英國的功利主義政治家，休姆(David Hume)，也有類似的主張。即以亞丹斯密而論，他之擁護私利，純粹是站在公利的立場上講話。由此可見，私有的財產在當初之受擁護實由當時的財產之內，自始便含得有財產所有者勞動的血汗在內。在倫理的觀點上，實有不得受人擁護的理由存在。

可是隨着勞動生產力的發達，所有與管理逐漸分離了。在一方面，土地所有者與土地耕種者分離。在他方面，資本所有者與資本使用者分離。正如上文所說，在經濟的進化上，地主階級之產生係由土地生產力經人改進之後，土地上所產生的農產品，除養活耕種者而外，尚有若干的剩餘，足以維持穩度優遊歲月的地主的生活，此時土地遂被強有力者所佔有，於是地主階級便誕生了。依照類似的理由，資本家階級便隨着工具生產剩餘的進步逐漸脫離生產過程而獨立。儘管在歷史上地主階級發達較早，資本家階級發達較遲，但二者都是因為土地和資本的剩餘生產力進步的結果，則是沒有問題的了。資本家與地主既為獨立於生產過程之外的一階級，而與生產力的進步無關，則是他們的存在已非促進人類生產力進步的必要條件。從經濟的觀念上說，他們實已成爲經濟進步的贅疣了。否！尚不只贅疣而已，他們實且成了經濟進步的障礙物。爲什麼呢？

最顯明的事實是，隨着資產階級的積聚，昔日的自由競爭的生產制度已爲今日的獨占競爭制度所代替。凡是稍知經濟學的人都知道：自由競爭的生產制度是指無限的資本家各從事於同一種類的商品的生產，因此在這同種商品的生產市場上，每一資本家所供給的數量，比起這類商品的總供給來，爲無限小，小之又小，小到個別的資本，縱令增加他的供給也不至降低物價，同時縱令縮小他的供給也不至提高物價，因此商品的價格自然接近於成本。反之，在獨占的競爭狀態之下，只有少數的資本家，從事於同一商品的生產，因此在商品的總供給量之中，每個資本家所供給的部分均相當的大，假如減少他的供給便會提高價格，增加

他的供給，便會降低價格，因此物價遂不免常留在生產成本之上了。除開很少的例外，今日的獨占的資本家，往往不惜減少供給提高物價，以圖實現所謂最大的貨幣的利潤。因此今日的獨占的資本家，通常均變成了阻撓經濟發達的障礙物了。一言以蔽之，今日的獨占的資本家階級，即從純經濟的觀點上說，亦已失其存在的價值了。地主階級因與資本家階級混合在一處，當然亦無存在之必要了。

隨着所有與使用或管理的分離，人與人間的剝削的關係，便以簇新的姿態顯露於外。在經濟學的發展上，將這剝削的關係分析的最明白不過的，除了馬克思而外當首推重農學派的大師按時內(Quensay)了。雖然按時內的分析只以地主剝削農民為限，而未及於資本剝削勞工的關係，但他對於剝削關係的揭發是亘古未嘗有的了。而且他的分析與中國農村的情形相吻合，所以我們必定要以簡明的方式將他重新解析一遍。他劈頭假定社會的階級有三個：1. 佃農的階級，2. 地主的階級，3. 小工商業的階級。佃農的階級是可生產剩餘的，一名生產的階級。小工商業階級其生產只夠成本，不能增殖剩餘，因此一名不生產階級。假令佃農階級一年投資三億法郎的農業成本，生產五億法郎的農產品包含一億法郎的原料和四億法郎的糧食。不生產階級一年投資兩億法郎，一億原料和一億的生活資料，而所生產的製造品亦為兩億法郎。地主階級沒有生產什麼，他們只是坐食地租。農夫每年在其所生產的農產品中，因為租佃契約的關係，以兩億糧食給地主作地租。地主於是以一億糧食自用，一億給小工商業者換製造品或用具。一旦這種交易的手續完結，地主於是立即退到流通過程之外去了。所剩

下的只有佃農和小工商業者了。小工商業者在其所生產的兩億製造品之中，除賣了一億法郎的用具給地主之外，還有一億法郎的農業用具要出售，而且他們還要原料。恰好農人也還存有一億法郎的原料要出售，因此農人遂以同值的原料去給小工商業者換取同值的農業用具。自經此度交換之後，小工商業者既有一年的糧食又有一年的原料，當然可再生產價值兩億法郎的用具了。農人除了地租之外，既有糧食兩億又有農具，當然可再生產出價值五億法郎的農產品了。佃農既可再有兩億法郎的淨餘的農產品，於是地主當然亦可收租了。這即是說，明年完全可以把今年生產的重複一遍，後年亦必可以再把明年的生產重複一遍。由此以言，地主就是這樣的依靠佃農的繼續生產的關係，坐食地租以自肥的階級。準此立論，地主剝削農民的關係，在這裏是再清楚沒有的了。馬克思資本剝削勞工的學說便是從這裏蛻化而來的了。國人知道馬克思的剝削的論理已多，所以在此我們便不必細說了。

剝削的關係經思想家暴露於外之後，被剝削的階層身受剝削的磨難與痛苦，再加上飢饉與疾病的無告，於是便喊出來了反抗剝削階級的慘痛的呼聲。蒲魯東說：「資本者強盜也。」馬克思說：「被剝削者必須起而剝削剝削者」都是此類呼聲的代表。由是暴力的革命便成了無產階級對有產階級革命的口號。這便是從經濟的觀點上，伴着生產力的發達，無產階級起而反抗有產階級的舉例。

假如說共產黨反抗資產階級的運動係一種由下而上的從黑暗的地獄裏無數的冤魂和枉鬼所策劃出來的打破地獄的直接的行動，那麼，我就敢說，舉凡歷史上的先哲，如希臘的柏拉

關，中國的孔子，和歐洲中世紀的耶穌，爲圖抑壓富人的權力，所發表的各種教義，那便妙是天上的安琪兒，從五色的彩雲中，飛墮塵寰，所傳播出來的，由上而下和由裏而外的美直的福音。耶穌曾一再的告訴他的門徒說：「富人要想升天國，直比駱駝想從繡花針的鼻孔裏穿過，還要更不容易。」孔子說：「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柏拉圖說，欲要改造社會須讓金質的人來做哲學家，再由這類哲學家來做雅典的皇帝。由此可見，在他們之中幾乎沒有一個不反對今日的資產階級的。可是他們的約束資產階級的方法是要資產階級自己親來接受哲學的洗禮，從事聖賢的修養，拋下殺人的屠刀，以求內心的平安，或在將來的天國裏永生，而不在結合無產者階級以反抗有產者的階級。這便是今日的好人政治或少數政治的思想者的主張了。

除非我們根本否認教育的效力，我們絕不能唾棄正義與人道對於改革社會的勞績。英國的第一次工場法，豈不也就是在保守黨的領導下通過和頒布的麼？在這一類的法令內即攝取有人道主義的成分。可是由上而下的人道主義的理想絕對不可以作由下而上的社會主義運動的代替。因爲人類的實際的行爲，其受宗教與哲學支配的時候，雖然不是沒有，但不如受人取得收入的方法所支配的時期長久。我以爲支配資產階級的實際行爲的中心的力量畢竟是資產階級用以取得收入或用以榨取勞動的工具，資產的保持和擴大。因爲他們對於一切政治的、法律的、哲學的和宗教的思想的迎與拒，全視這類的思想是否有利於他們的資產的維持與擴大爲條件。所以人道主義者要想單獨依靠教育的力量來改造社會，畢竟是很難辦到的。

柏拉圖在他的共和篇上，想以教育的方法來訓練哲學家皇帝。這個理想豈不甚優美？無奈希臘簡直沒有一個皇帝，肯依從他的教義做。遑論暴戾恣睢的斯巴達皇帝根本不聽他的那一套。即以比較溫和的雅典皇帝來說，他因已養成了一個淫佚無度的習慣，亦何嘗能夠接受哲學的指導？哲學家的皇帝既沒有，好人政治變成夢，共和篇的理想盡落空，柏拉圖亦便只好捨棄哲學的改革轉而注重法律的改革了。耶穌想以「愛」為改造社會的最高的原理，可是他却被最卑鄙的仇與恨所毒害。孔子亦只徒有禮運篇上的大同世界的理想，而無絲毫的實踐大同世界理想的成績。由此可見，好人政治的效力雖不是一點也沒有，但如欲想以之單獨改造社會，恐怕難有實現的機會。可是假如人道主義者不惜以由上而下的社會改造的運動，來便利或指導由下而上的革命的運動，以圖減少革命的流血，自有無上的價值。社會革命的正宗的力量，恐怕離了無產階級的團結奮鬥外，很難有其他的正宗的力量存在。可喜人道主義者經過這多次的失敗之後，也漸認識了徒以他們單獨的力量來改造社會是不夠的。

可是社會革命者爲了社會的改造，處處憑藉強力與詐術，究不合於人類理性的要求。列甯曾經說，政治的革命可以一蹴而幾，經濟的革命絕不能夠。假如在革命的時期中，將這僅存的稀少的生產的設備一齊破壞，到將來遭受饑饉與貧乏，即從經濟的觀點上說，亦是太不經濟的。反之，假如我們能夠以更經濟的方法來逐漸完成合於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的要求，當然是更切近於理性的行爲。社會革命的目的在改造社會制度，而不在顯示英雄式的殘忍的行爲。比如說，不必要的流血，我便以爲無論如何是當減少的。我不否認社會革命的勢力，

但我以為不流血或少流血的革命，不但合於人類理性的要求，而且是更有利於人類的物質幸福增進的行爲。爲達到這個目的起見，我以為用投票來代替放砲的民主政治的改革方式實在更有意義。恰好民主的政治成爲今日社會主義者的理想之一。

可是今日的民主，亦與過去的民主，在性質上有點不同了。過去的民主是以保護所有與管理合在一起的資產階級，完成營業自由的歷史任務爲目的。今日的民主，是在保護勞動的階級限制資產階級的獨占的權力爲目的。現代社會革命的高潮好像一股突然爆發的山洪，除非我們給他開條合理的水道，他一定會將我們原有的一切的建設，破壞粉碎而不惜。民主的政治便是人道主義者和法治主義者所給暴力的社會主義者所開鑿的一條合理的運河，所以我們必須以社會主義作主流。總之，世界的進化的大勢所歸趨是要限制社會上的剝削階級的獨占權利的。所以在今日的民主政治下，我們實用不着替今日的剝削階層作擋箭牌。我們所應做到的就是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限制暴力的濫用，遵照法治的途徑，減少不必要的流血，於以完成更偉大的物質的建設。所幸現代的民主主義者已漸接近這理想。綜括來說，就是在現階級的某些領土上，人道主義，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已有一種合流奔放，向前湧發的趨勢。我相信我們必能以一種聯合的力量向着最有利於人類的物質幸福和精神幸福的坦途，邁步而前。

（天津大公報卅五年一月廿五日）

中國經濟政治與文化的歸趨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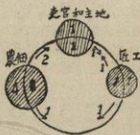
中國的經濟、政治、與文化，受中國國民所得的主要生產手段的進化決定，這是無可置疑的一件事。從純粹理論上說，一國國民所得主要的生產手段，關係一國全體國民的生活。國民所得主要的生產手段一旦起了變化，全體國民的生活必要發生變化。全體國民的生活既然發生變化，當然他們在經濟、政治、與文化上的思想與行動勢必也要發生相應的變化。未必這還有什麼疑問麼？更從歷史的事例上說，在一國的國民所得主要的生產手段尚停滯在土地萬能的時代，她的經濟必然是地主的，政治必然是君主的，文化必然是法天的。在雅片戰爭以前的中國，或在中古時代的歐洲，便是極好的例證。可是一國的國民所得主要的生產手段一旦跨入了資本萬能的時代，事態的變化便將從頭到尾的掉過頭來。她的經濟必然是資本家的，政治必然是民主的，文化必然是崇尚人力的。在工業革命而後的英美法各國便是極好的例證。順着這個趨勢再往前進，假令一國的國民所得主要的生產手段又踏進了集體勞動萬能的領域，事態必然還要發生急劇的變化。她的經濟必然是屬於集體的勞動的，政治必為集體勞動所領導的民主政治，而文化必然是鼓勵、推崇和歌頌集體勞動的創造的偉力的。蘇俄便是一個可舉的例證。當然在這或徐或急的演變過程中，隨着各個國家的客觀的和主觀的條

件的不同，無論在經濟上，在政治上，或在文化上，均有多少的介於兩個極端之間過渡的形態，恰如橫在兩個對岸之間的過渡的橋樑一樣，但這並無害於社會進化的主要階段的分析。除非我們閉着眼睛說瞎話，我們纔會相信中國的經濟、政治、與文化，會不顧國民所得主要的生產手段的進化，而將永遠的停滯不動。

我充分的相信法國重農學派的財富循環說可以用來描繪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的主要的生產手段的性質，和與之相對應的中國的經濟的機構。一來呢，是因為法國的重農學派的學說確係淵源於中國。二來呢，法國的重農學派的學說與中國在鴉片戰爭以前財富的生產與流通的情形幾乎完全相同。我所最感到驚異的，即中國雖有重農抑商的政治主張，但對於在中國農村社會裏的財富的生產與流通的情形，幾乎完全不明瞭。除非借鏡於法國重農學派的財富循環說，我們對於中國的農村社會的知識的不足是絕對無法彌補的。

重農學派確是太偉大了。依據投內 (Quesnay) 大師的意見，在土地經濟時代，國民所得的物質生產手段有兩種：(一) 土地和(二) 器具。在這兩種生產手段之中，只有土地纔能生產淨餘。器具是不能生產淨餘的。人在器具上加工所生產的生產物，除了維持直接生產者的最低的生存外，是不能生產淨餘的。但在土地上加工，其所生產的物量除了維持直接耕種者而外，尚可養一個地主階級。因此地主階級便應運而出。伴着淨餘生產物和其他的財富的生產與流通，在經濟的機構內，產生三個不同的階級：(一) 坐吃淨餘的地主和官吏的階級，(二) 佃農階級和(三) 工匠和小商人階級。投內大師的財富循環說專在說明在這三

鴉片戰爭以前的中國經濟結構



大階級之間財富的生產與流通。現在我們可以舉一個例，來說明財富循環的實際情形。現在我們先說生產。假令在這三個階級之中佃農階級每年投資三億（以糧食一石作為計算價值的單位），生產五億。在投資的三億之中，兩億是糧食，一億是農具。而在他們的五億生產物中，四億是糧食，一億是原料。工匠階級每年投資兩億，生產手工工業品兩億。在投資兩億之中，一億是原料，一億是糧食。而在兩億手工工業品中，一億是農具，一億是上等的家庭用具。為什麼佃農階級能夠投資三億生產五億呢？是為什麼工匠階級所使用的只是生產能力較少的器具，如斧頭、鉋子、鐵鋸、和刀剪之類。工匠階級所生產的只夠用來維持他們的生存。但佃農階級所生產的，除了維持他們的最低生存之外，尚可以其淨餘生產物養活地主和官吏。這是說生產。

其次說分配與流通。農人加工於土地既能生產淨餘，而土地在法律和習慣上又為地主所有，於是地主便有向佃農收取地租的權利。在我們這裏的舉例中，地主可向佃農收租兩億。工匠階級的器具是他們自己所有的，而且不能生產淨餘，所得兩億只夠成本，全以滿足他們自己的需要。我們知道，在佃農所生產的五億之中，有兩億糧食是要他們留作自己用的。這兩億是絕不流通的。其餘三億是要流通的。在這三億之中因有兩億糧食，農人須以之送給

地主作地租，其餘一億是原料，農人是要用來交換農具的。地主於取得佃農兩億地租之後，留一億糧食來自己吃，其餘一億他們是要用來給工匠們交換上等家具的。恰好在工匠階級裏面，便有一億上等家庭用具要用來給地主交換糧食。經此交換之後，地主既有糧食又有用具，便欣然退出於流通過程之外，接着工匠階級和佃農階級便開始交易了。因為工匠階級尚有一億農具要拿來給佃農換原料，同時佃農亦有一億原料，要拿來給工匠階級換農具。經此交換之後，佃農與工匠所投下的資本通通都復原了。他們又可從事再生產的活動了。佃農在其次的一個年度裏再以兩億糧食一億農具生產五億農產品，而以兩億糧食為地租。工匠再以一億原料和一億糧食的消耗生產出兩億手工工業品。流通的過程再依照昨天的情形再度重複一遍，於是在這農村社會裏的經濟情形便得永遠的保持常態。

現在我們可以進而說明，中國的君主的政治與如此的土地經濟的關係。

在土地經濟的時代，既然全體國民的所得，多要靠天，不但佃農的所得要靠天，地主的地租要靠天，政府的田賦要靠天，甚至連工匠階級的收穫也要靠天。天之於人既然保有這麼大的威力，那麼，在政治上，最好是以「天子」為君主了。反之，人為的力量，在經濟上，既然生產的力量如此之小，在政治上，當然絕無崇尚民主政治的可能了。這便是在土地經濟時代，在政治上只有君主而無民主的主要原因。易繫辭上說：「君萬物者莫大乎天。」左傳上說：「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民也。」書經秦誓上說，「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龐綏四方。」（參看王亞南官僚政治與儒家思想，「時與文」二卷六

期）老子道德經上說：「王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都表示在土地萬能時代，因為在生產上是靠天吃飯，所以政治上，也就形成一種天道政治或君主政治。

驟看起來，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的君主政治，好像與歐洲在重商主義時代法國的專制政治相同，實則二者不是完全相同的。這個不同是很容易區別的。在歐洲重商主義時代，人為的專制較多，中國較少。在重商主義時代，法國的君主干涉人民的生產事業。但中國的君主不干涉人民的生產事業。凡是讀過歐洲的歷史的人都知道，在重商主義時代，法國哥伯提（Cobert）政府管理法國的製造業的法律共有八本，其他各國的政府干涉的程度較輕。那時法國的紡織工廠，在織布時所用的紗線，和布疋的寬度及染色，都受政府的命令規定。可是，中國沒有。法國路易十五常說「朕即國家」和「王權萬能」一類的論旨。可是，中國的君主很少有這一類專制的口吻。他們所常說的是：「天子不取，反受其殃。」「予弗順天，厥罪為鈞。」為什麼中國的君主，比較重商主義的歐洲，其專制的成分要輕呢？因為中國君主只是土地經濟的產物，他的神聖的任務，只在維持土地生產力於不墜，而欲達到此目的，只須服從「天道」就行了。但法國的皇帝乃是商業資本的產物，他的神聖的任務，乃在管理生產、增加出超、和擴大市場，當然非要訴諸於王權的擴張不可。正因中國的君主只在維持土地生產力於不墜，除了水利灌溉而外，幾乎不必有所作為，所以「無為的政治」便成了中國的一種理想的政治了。不但不須「有為」，而且簡直可以「無言」。記得論語書上曾載有孔子和子貢的一段問答，我想這頂好可以用來說明中國的無為政治的美

妙：

子曰：「余欲無言。」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何言哉！」

細想起來，在土地萬能的時代，全部國民的生活悉在維持如此簡單的財富的生產與流通。假如把這生產與流通的過程圓滑了，縱令君主終身不言，亦無所害。反之，假如君主不幸把這生產與流通的過程擾亂了，全部國民生活失了保障，縱令君主口若懸河，聲如洪鐘，並富有雄才大略，天下也是要紊亂的。這便是中國儒家和道家很輕鬆的倡導無為政治而得到了相當成功的原因。

現在我們可以進而談中國的文化の本質了。因為中國人全部都是靠天吃飯，而所謂靠天吃飯的意義又係在維持在如此的階級社會裏財富的生產與流通，所以中國的文化，於不知不覺之中，便洋溢着一種聽天安命的思想。誰都知道，中國文化的主要的特徵，便是力求人的精神的生活與自然合而為一。偉大的哲學家熊十力先生在其「略說中西文化」（「學原」一卷四期）一文裏說：「中國人唯反求諸己，而透悟自家生命，與宇宙原來不二。孔子贊易。明乾元統天。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莊生言，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灼然物我同體之實。」這皆表示中國人的最高的理想不敢與自然分庭抗禮，與她鬥爭，但把自然看做無限的偉大，恨不得與他結合而為一體。自然既是無限的偉大了，區區的人的小智站在自然的面前，好像一

粒微塵站在天地面前一樣，除了五體投地的拜倒在她的足下外，別無他道。所以在中國人的哲學裏充滿着神祕的感情，而缺乏西方人邏輯的修養。這都是由於中國的哲人把自然生產力看做神明所引起的。這樣的哲學無疑的大有便利中國如此的自然經濟的維持與流轉，當然會得到全體社會，特別的是地主老爺們的歡欣和鼓舞了。

中國的政治與文化既係建築在中國的原始的土地經濟上，那麼，假令中國的原始的土地經濟有了變遷，中國的政治與文化也要跟着變遷了。是的，不錯，中國的政治與文化，自鴉片戰爭以還，隨着中國國民所得主要的生產手段的變化，便立刻起了變化。試問中國國民所得的主要的生產手段是怎樣變化的呢？

二

在這裏我們應該特別強調的，即中國的國民所得主要的生產手段，始終沒有脫離土地萬能的階段。可是，中國國民的消費手段，除了糧食而外，早已經過私人資本萬能時代的資本主義的洗禮了。只是這種資本主義不是生長在本國的資本主義，而是生長在外國的資本主義就是了。這即是說，工業資本主義在歐洲誕生較早。歐洲自資本主義誕生而後，利用其龐大的生產的能力，增加商品的數量，在這日益增加的商品的數量中，除了給本國消費而外，所餘的部份便以中國為市場。隨着資本主義商品的入口，中國國民的消費的手段，除了糧食之外，便起了極大的變化。衣服、留聲機、影戲、紙張、牙膏、香水……汽車，幾乎無一不是外人所有的資本，機器，生產的物品。這即是說，中國人的物質的享受已經近代化了，可

是，中國大部國民所得的主要的生產手段，還是土地。從資本生產的關係上說，中國似乎需要資本家的民主。但從土地生產的關係上說，中國的政治不要民主而要君主，並不要歐洲在重商主義時代的王權萬能的極端專制的君主，而需要歐洲在中古時代的消極無爲的君主。從資本家的生產關係上說，中國似乎需要一種反抗自然崇尚人力的文化。可是，從土地生產關係上說，中國仍然需要尊崇自然的文化。崇尚自然的思想是神祕的，直覺的，和感情的。崇尚人力的思想是現實的，觀察的，和理智的。對應着這種經濟的生產關係的矛盾，同時便暴露出中國在政治和文化關係上的矛盾。這種矛盾的暴露從一個中國人看來，確是一個極其有趣的問題。即在政治上，中山先生主張民主，辜鴻銘主張君主，而康有爲和梁啟超等則主張君主立憲。在文化上，陳獨秀提倡科學，張君勱倡提玄學，而梁漱溟和熊十力先生等則獨唱中西文化調和論。更有趣味的問題，即在中國的實際政治上，實際所表現的是既非君主亦非民主，而是一種掛民主的羊頭賣君主的狗肉的三不像的民主政治。袁世凱是如此，段祺瑞是如此，吳佩孚是如此……更有趣味的問題是，在中國的實際文化上，實際所表現的是，口裏提倡民主而實際上則深恐怕得不到一個主人來寵愛，或恐怕人民力量真起來。口裏提倡科學，實際上，則把科學來當做一種獵取功名富貴的勾當，深恐怕苦讀寒窗十數年，尚點不到一個洋翰林的招牌，或得不到權威的領袖一官半職的賞賜。如此的政治和如此的思想的矛盾，我都想盡力在後文中詳細解釋。

歐洲的各大先進國爲什麼就有民主，而中國爲什麼就沒有呢？我在「觀察」第三卷第十

四期上便曾經大膽的宣言，因為歐洲曾經經過資本萬能的時代而中國沒有。因此中國便沒有民主，歐西就有民主。這即是說，伴着歐洲各先進國的國民所得的主要的生產方法的進化，歐洲的經濟機構起了變化，因此，歐洲的政治與文化也就跟着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在政治上，由王權萬能的專制政治一變而為民權萬能的民主政治。在文化上，由上帝創造世界的宗教觀，一變而為人類創造他們自己的歷史的進化觀。試問歐西各國的經濟的機構是怎樣演變出來的呢？

我們知道，在工業革命以前，一國國民所得的主要生產手段是土地，或自然，器具只占一個不重要的地位。可是隨着人類的物質生產力的進步，器具忽為機器所代替。器具與人類的勞動結合，所生產的貨物，經過交換的程序，其所得生活的資料只夠維持直接使用器具者的最低的生活。反之，機器與人類的勞動結合，其所生產的貨物，經過交易的程序，其所取得的生活資料，除了養活直接使用器具者的最低生存外，還可以養活一個新興的有關的階級。因此，機器的所有便同使用分離了。機器的所有與使用分離之後，經濟的機構立即發生變化。在從前社會只有三個不同的階級：（一）地主和官吏，（二）佃農和（三）工匠及小商人。現在不是了。雖說地主和佃農的地位依然不變，但工匠和小商人的階級，隨着機器生產的革命便化為兩個階級去了。由是在社會裏便有四個不同的階級：（一），地主階級（二）佃農階級，（三）資本家階級，和（四）工人階級。在這四個階級之中，財富的生產與流通大約從前的情形相同，只比較複雜罷了。假令在這資本家的生產社會之中，佃農的生

生產的規模。可是，佃農的需要業已達到了飽和點，於是所餘存的這兩億，便非自爲消費不可。然而資本家的生產的目的，並不在增加消費，而在疊積資本，爲達到資本的繼續疊積計，資本家階級於是便不得不向中國或其他落後的民族來開闢第三市場了。事情尙不能只在這裏終結。設使這資本家的社會內，工人逐漸覺醒起來，不堪資本家的剝削，要求工資加三倍，於是資本家階級所餘的這兩億便不足以爲擴大生產規模之用了。可是，在中國和其他落後的國家內，工資不但不增加三倍，而且比一倍還要低，於這個新興的資本家階級，不但是要以其所剩餘的工業品向中國交換糧食與原料，把中國作爲一個商品的市場，而且要把這二億工業品在中國來投資，即把中國作爲一個投資的市場了。假如此二億工業品只係消費品，則以之交換糧食與原料而以之作爲中國工人的工資與流動資本。假如牠係生產的機器，則以之作爲在中國的固定的設備，再以其方法所得來的糧食與原料補其不足。恰好中國又是一個原料與糧食出產的國家，富有廣大的勞動的人口，從歐西的資本家的立場，他們確有向中國銷售商品和擴大投資的要求。但這要求要如何纔能滿足呢？這點留待以後我們仔細來解答。

本來歐洲在資本家的生產制度誕生以前，商業資本家早就有了，但這在政治上還只是立於一個附庸的地位。以英國而論，在工業革命以前，雖然已有所謂議會的政治，但這議會的議員全部均爲地主和貴族所充任，商人是無權過問的。而且，在任何歐洲國家裏面，當着商業資本發達的初期，商人需要君主以其無上的威權來擴大市場，反而造成歐洲出現極端的

專制政府的原因。斬釘截鐵的說，歐洲各先進國的近代民主政治還是在工業革命或機器革命以後的事。因為歐洲的工業已經革命了，資本家階級的經濟的勢力扶搖直上，可是政治的勢力無有。除非取得政治上的權力，資本家的生產的制度，便將無法保持與擴大。爲了維持和擴大資本家的生產制度起見，資本家需要向外國買進廉價的糧食與原料，可是糧食與原料的價格一低落，地主階級的真實所得便要減少。由是資本家和地主之間的矛盾便發生了。從地主階級的利益上說，非要提高穀物與原料的關稅不可，但從資本家的生產關係上說，除非取消或減少穀物與原料的關稅，資本家的生產制度莫由發達。這是地主階級和資本家階級衝突的第一點。又資本家階級還需要取得政權來鎮壓工人的階級，限制他們集會結社的自由，和取締他們對於高工資的要求。其三，資本家階級還需要取得政權來便利他們剝削婦工和童工，取消封建時代的殘餘的過境稅。凡此都不是地主們所願意去做的事。但爲了維持資本家的生產與流通的圓滑進行起見，資本家非要取得政權不可。恰好在工業革命之初，機器的產量若干倍於器具的產量，並因此大大提高了各個階層的物質的幸福，當然勞動者也包含在內，於是資本家爭取的政權的活動便爲大多數的民衆所擁護。此時他們的口號是「讓我們以我們自己的方法作自己的買賣！」「反對國家的干涉！」「干涉最少的政府便是最好的政府！」資本家階級要求民主政府的運動，聲勢日漸浩大，除非政府讓步，革命便要爆發。於是政府便只好讓步了，民主於是實現了。由此可見近代的民主制度在當初發生的時候，確是爲了促進資本家的自由和權利。所以近代的民主制度亦可稱做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也可以

說，牠是資本萬能時代的民主制度。

隨着機器代替人工的資本家的生產制度的發展，歐洲的文化也變動了。從自然人的關係上說，人已獲得了征服自然的武器，——機械在手內，他不復畏懼自然了。他要面對自然與牠爲敵，並且要以科學的權力去征服牠。引一句最普通的話來說，就是，「科學即權力」。人自此便不再受自然的束縛而要求盡力的表現「自我」。不但在哲學上主張自我表現，在文學上主張自我表現，甚至在日常生活上也要求自我表現了。更從取得知識的方法上說，在土地萬能時代，在哲學裏，充滿着神學的味道；一般的哲人取得知識的方法是直覺的，感情的，體念的或反理性的。而在資本萬能時代，牠是分析的，理智的，外觀的或批評的。一言以蔽之曰，資本家所需要的文化乃是一種有利於資本的維持和擴大的文化。這便是歐洲的近代的文化與中國的文化不同的原因。由此可見，中西文化的根本的不同，主要的由於經濟機構的不同。而此經濟機構的不同又係由中國國民所得主要的生產手段的不同而來。在鴉片戰爭以前的中國和在工業革命以來的歐洲確是這種情形。

三

最可令人注意的一件事，就是歐美各個先進的國家，雖然牠們的國民所得主要的方法已經由土地萬能進步到資本萬能的時代了；而且在其本土以內，雖然因爲資本家階級已經起來要求民主，並且已經變成民主了；在哲學上，雖然已經要求自我解放或思想自由，而且已經達到自我解放和思想自由的階段了，可是，她們對於其他的落後的國家，從資本家階級的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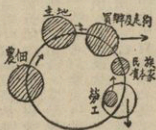
場上說，則需要她們永遠的停滯在土地萬能的階段，而不許她們逐漸進化而至資本萬能的時代。因這最有利於她們的剩餘商品的銷售，和便利她們的資本的積疊，或只使中國一類國家變成她們的投資地，便利她們的直接投資。剛才我們說過，在我們所舉的箇例中，在一資本家的社會內，假令有剩餘工業品兩億，在勞動的組織力不強和工資較低的場合，資本家們便要以中國為商品的市場。而在勞動組織加強和工資增加的場合，他們便要以中國為他們的直接投資的尾閘。為達到前一個目的，在經濟的機構上，他們需要創造一個買辦資本家階級，來便利他們剩餘的商品到中國來傾銷，並吸收中國的低廉的工業的原料；而為達到後一個目的，在經濟的機構上，他們需要創造一個寄生的坐吃股息的階級，以便利他們在中國來直接投資。在政治上，為達到前一個目的，他們需要扶植一個媚外喪權的政府，來接受他們強制中國締結的不平等條約。這個政府的主要的特徵就是無能和軟弱。為達到後一個目的，他們需要扶植一個崇拜資本主義的政府，來鎮壓中國的勞動階級的反抗，來便利他們直接的投資。這個政府主要的特徵就是窮兇和極惡。在辛亥革命的前後，他們所扶植的政府是北洋軍閥的政府。北洋軍閥政府主要的特徵就是昏庸與無能。在現在，他們所極欲培植的政府已經不是北洋軍閥的政府了，因為北洋軍閥的政府太昏庸與無能了。牠的最大的優點只能便利他們的剩餘的商品到中國來傾銷和換取低廉的原料，但其窮兇與極惡的程度絕對不足以鎮壓工人的革命，以便利他們在中國來投資。在文化上他們更需要一批文化人，來謳歌資本主義的文明。中國根本沒有龐大的資本家階級，只有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和買辦，謳歌資本主義直

接間接便有利於他們在中國來投資和經商。假如中國的名流和學者欲要取得他們的寵愛，並不需要真正的實學，只要天天叫器中國需要經過資本主義的階段便行了。不幸中國竟有一批文化人中了他們的詭計。這確是最值得慨歎的！

返觀現在中國國民所得的主要生產手段，自鴉片戰爭以還，仍然還是土地。在外國的資本家的剩餘商品傾銷範圍內，確只成長了一個買辦的階級。他們的獲取所得的手段，雖然不是土地，而是資本，但却非生產的資本，而係商業的資本。否！牠亦非正常的商業的資本而係買辦的資本。除此之外，在各重要的都市，雖是生產所得的手段已由器具而變為機器，且此機器生產的能力，除了養活直接使用機器的勞工外，尚可養活一個有閒的階級，但在這個階級之中，有些是不在場的資本家，他們是外國人，住在外國。只有一小部份才是中國的新興的資本家。還有一部份潛在的資本家階級，即是華僑，他是生長在外國，但不堪外國資本家的壓迫，很想到中國來投資。如果我們肯把中國今日的經濟的機構來與外國作個對照，那末，在中國的經濟機構內，其階級共有五個：（一）地主階級，（二）佃農階級，（三）買辦階級，（四）少數的新興的資本家階級，和（五）工人階級。這與歐洲的資本家階級恰恰成立一個對照，有如下圖所示。中國的工匠和小商販階級現在已經不存在。但代替他的地位的不是中國的資本家階級，而係外國的資本家階級及其買辦和走狗，這便是中國今日的經濟的機構。

將中國今日的經濟機構明白之後，我們可以進而解釋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政治的性質。

鴉片戰爭而後的中國經濟機構



該職業者：土匪、流氓及傭兵

在鴉片戰爭的前後，中國的政府確乎是由無能和昏聩的地主階級所壟斷。當外國的資本家正欲傾注其商品到中國來的時候，這種無知與昏庸的政府，恰恰合於外國的資本家的要求。中國政府對外的一切不平等條約，都是在這種腐化無能的政府手裏締結的。歐洲的資本家在國內要民主，因這可與資本家的生產謀便利。在國外要阻撓民主或反抗民主，因這最有害於國外的商品市場的擴大。假令中國的民主政治成功了，中國的人民必定要以各種的立法來保護中國的幼稚的工業。這樣一來，外國資本家的商品市場便沒有了，這豈不是對於他們的資本的積聚有妨礙麼？外國的資本家不要民主，中國的地主階級亦不要民主，兩個反民主的勢力合在一起，中國的民主便沒有了。買辦階級的神聖的任務在於推銷帝國主義者的商品，帝國主義者既然不要民主，當然中國的買辦階級亦不要民主了。獨有中國的新興的資本家階級與華僑的資本家階級要民主，因這實有便利於中國的資本家的生產制度的發達，這便是孫中山先生領導中國革命的時候，得到華僑擁護的原因。無如華僑不在中國。在辛亥革命而後，當選的議員大部都是地主。他們把當議員看做作官，或當做欺壓老百姓的階梯，因此，在袁世凱稱帝和以後的曹錕賄選之時，這些議員所表現的只在獵取功名富貴，而不在爭取人民的權利，因此民主便變質了。這便是中國的民主政治失敗的根本原因。佃農階

級何如呢？他們實在遭受了雙重的壓迫。第一是，地主和官吏的壓迫。第二是，自帝國主義的商品侵入中國之後，中國的農產品可以出口交換近代的工業品，於是地主階級對於佃農再壓迫，以圖獲得更多的農產品來交換洋人的奢侈品。工人階級與佃農幾約立於相同被壓迫的地位，當然，在內心裏當然希望取得政權來改善他們的經濟的地位。可惜他們尚未覺醒並缺乏團結，因此，他們對於民主或不民主，亦不表示關切。正如張東蓀先生所說，自從民國成立以來，所有的選舉都為特殊階級所利用，只有民初一次選舉不由金錢買得，但即以這次選舉而論，自從民國十二年曹錕賄選成功，其結果亦是替特權階級作工具。這種說法當然是有道理的。

更從中國的經濟的機構與文化的關係上說，既然中國的地主和佃農均無自我解放的精神，並五體投地的屈服於自然的足下，不但畏之如雷霆，而且敬之如神明，而且中國的儒家又多係地主出身，當然他們要擁護中國的文化了。新興的資本家階級雖然喜歡聽取個人主義者的「人力可以勝天」的學說，而且新興的士大夫階級多係資本主義國家的留學生，率皆崇尚自由，然因聽衆不多，而且在帝國主義的高壓勢力下，亦無促進資本生產的作用，所以個人自由的主義好像一朵鮮美無比的不實之花，在中國這個國度內，便未發生領導的作用。由是而中國的哲學家如馮友蘭，梁漱溟和熊十力一類哲學大師所倡導的中西文化調和論，便居然能在中國的哲學論壇占上風，豈非機會哉！豈非機會哉！

爲什麼中國的國民所得的主要生產手段從未由器具進化而爲機器呢？在鴉片戰爭以後，

固然是由於外國商品的壓迫，然在鴉片戰爭以前，外國商品的壓迫並不存在，爲什麼始終沒有實現呢？這是由於中國沒有經過充足的原始的蓄積，因此沒有足夠的儲蓄來發達中國的資本。但爲什麼中國沒有原始的蓄積呢？從地理的關係上說，中國最早便是一個大陸的國家，缺乏一個可以自由航行的海洋，如像地中海和愛琴海的大小，因此中國自始便缺乏國際的貿易。再來呢，在中國的國內，河流尚嫌不夠多，不足以便利中國的交通。三來呢，中國的耕地似乎尚肥沃，足以瞻養中國的人口。四來呢，在中國每畝土地上的口密度太大了，土地的生產品只夠消費，不夠儲蓄。（這第四點是北大農學院蕭劍雲先生尚未發表的意見。）因此中國的商業不發達，儲蓄不夠多，這恐怕是中國沒有經過原始蓄積的原因。或亦就是中國沒有提早發生工業革命的原因。

在鴉片戰爭而後，中國既無強有力的政府，又無新興的資本家階級，足以排斥外國資本的侵略，並建設中國的工業，所以中國的經濟便永遠停滯在土地經濟的階段。中國的政治便永遠的被掌握在地主並帝國主義者的爪牙裏。同時中國的文化亦永遠停滯在一種似驢非驢，似馬非馬的中學爲體西學爲用，或中西文化大調和的絕望的局限裏，而不能有所開展。然則中國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前途就絕對沒有出路了嗎？對於這個問題的答覆，竟有學者以爲中國人是天生的奴隸，除非由外人來統治，中國絕對無望。實則中國的工農階級原是賦有無限的對內打倒封建的剝削和對外排除帝國主義的侵略的潛力的。假令中國的勞苦的大衆透過革命的政黨的領導作用善於組織與團結，並與進步的小資產階級攜手而進，其力量是無敵

的。爲什麼呢？因爲任何帝國主義者的侵略，要中國人自己給他作工具。假令中國的勞苦的大衆不許任何中國人給他作工具，帝國主義者的奴役中國的計劃必要被粉碎。蘇聯似乎可做一個最好的先例。

回憶在重商主義時代，歐洲的商業資本家爲了擴大市場起見，對內要求武力統一，對外要求開闢海外的市場，在政治上需要絕對的專制政治來完成這個使命，因此歐洲的君主政治到了重商主義的時代便變質了，即由虔敬上帝的比較的清穆無爲的政治，一變而爲王權萬能、朕即國家的專制的政體。中國絕對不會再有一個重商主義的時代，毋待贅述。但帝國主義者爲便利他們的資本的維持與擴大，在這勞苦大衆覺醒的時期，却需要扶植一種反動的與它友好的政府，不惜以任何方法來鎮壓革命。我以爲現在的美國極力去扶植希臘的反動政治來撲滅革命，亦是可舉的例子之一。所以，中國的工農對外國資本主義的解放的鬥爭將是最痛苦的。

中國的工農決以計劃的集體的勞動來作爲中國的主要的生產的方法。在經濟的機構上所要求的當然是消滅買辦的階級，實行耕者有其田，而代之以工農並新興的小資產階級。但這當然是指消滅他們財產的關係，而非置之死地而後快。在政治上所要求的是民主，或者說，仍然是民主，但不是資本家階級所領導的民主，而是由革命的工農階級和進步的小資產階級所領導的民主。在文化上所要求的是集體的勞動的自由，而非個人的自由。此與民國十三年國民黨的宣言，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同時亦是中國的復興所必需的。但我們莫要忘記了這

種要求所當遇着的空前的阻力。

馬克思說，當着一個新社會從舊社會的母胎內產出的時候，須得經歷一段痛苦的時期。中國好比一個六十歲的老太太，近來新結第一胎。如果不讓這個新胎兒降生，恐怕這個老太太和這個唯一無二的胎兒，二者均必同歸於盡。

三七，二，四，於北京大學。



兩條路

一、當前中國的分配制度只有兩種制度：一種是割富人之產以益貧民，一種是竊貧人之產以益富人。在這兩種制度之中，我們必須加以抉擇，那一個分配制度是更好的。

假令在這些富人之中，大部都是新興的工業家，好像十九世紀時代的工業資本家一樣，他們賦有偉大的組織能力，能把自然科學上的發明利用於工業，增加人類勞動的平均生產力，或提高人類的平均物質幸福，縱令今日的所得的分配，偏向着富人的利益，對於社會，尚能忍受，因這雖於社會的正義有所損失，但於社會的生產却有增加。我們尚有理由來擁護他，因為我們甯願忍受分配不均，而不願生產不豐。

可是在今日中國富人之中，一部份是坐食地租的大地主，一部份是流氓資本家，一部份是豪門資本家，一部份是窮兇極惡的貪官污吏。他們毫無生產的能力，有的酷似一羣吃得腦滿腸肥的豬仔，有的酷似土匪，有的酷似狐狸精。現在且以膨脹通貨的方法，來竊據貧人之產，以益富人。無論從社會正義立場，或從社會生產立場，均絕無絲毫存在的理由。

但是今日的少數知識份子，還在以祕密的或公開的言與行，來幫助這種偏向富人的分配制度的維持與擴大，實在沒有意義。假如割富人之產以益貧人是不人道的，那末，今日而竊貧人之產以益富人，必是更不人道的了。我以為一個真正的人道主義者不但不應替這種偏向

富人的分配制度說話，而且應當與以糾正。

二、中國的工業建設有兩條路：一條是以全體勞動者——精神的和肉體的——的覺醒為基礎的工業建設。一條是以少數的官吏或資本家的覺醒為基礎的工業建設。在這兩種工業建設的途徑之中，我們必須加以選擇看那一個更有效率。

在社會主義尚未浸透中國勞動下層以前，勞動者根本不知剝削為何物，我以為後一種途徑較易實現。在社會主義已經深入中國勞動下層的今日，剝削觀念浹於人心，我以為前一途徑較易實施。採後一個途徑；勞資之爭，永遠糾纏不清。採前一個途徑，資勞雙方合為一體。故俄國在對德宣戰時延長工作時間無問題，但在美國則問題極大。由此可見，今日中國的工業建設，走後一條路較難，走前一條路較易。

在中國共產黨未成立前，前一條路，既已較難了。在中國共產黨蓬勃向上的今日，前一條路，難上更加難了。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未成立前，後一條路既已難上又加難了，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已成立後，後一條路必是難上加難又加難，並幾至於不可能了。

可是中國的少數知識份子，還以為中國的工業建設，遵循這個以少數官吏和少數資本家的覺醒為基礎的建設途徑有可能。從歷史的觀點來看，這是開倒車的。他們實在尚未充分理解循着這個途徑前進，所將碰着的暗礁，是有何等的毀滅性啊！

我所謂的以全體勞動的覺醒為基礎的工業建設，並不是指共產主義制度，亦不是指社會主義制度。我所指的只是一個在今日中國的狀態下，能夠得到全體勞動者很興奮的支持的一

種工業建設的途徑。我的意義只是說，循着這個途徑前進，中國的工業建設可以走上社會主義的制度，無須再經重大的流血的革命。

三、世界的民主政治有兩種典型。一種是以扶助資本主義的發展的民治制度，並且在實質上偏向資本家階級利益的維持的民主制度。一種是以扶助社會主義發達的民治制度，並且在實質上偏向全體勞動者的福利的維持的民主制度。聖保羅說，「不勞動者不應得食」。假令這話不錯，那末，第二種民主制度是比較進步的民主制度了。爲達成前一種民主制度的任務計，須有一個代表資本家階級利益作基石的政黨，來對外反對封建勢力，對內實行民主。爲達成第二種民主制度的任務計，須有一個代表勞動者階級利益作基石的政黨，來對外箝制資本主義，對內領導民主。以最近的英國來說，英國是一個接近偏向勞動者階級利益的維持的國家，因此今日英國的民主制度實是今日中國的知識分子所最崇拜的一種制度了。但英國之能有這種民主政治全係因爲有一個代表勞動階級的大政黨的存在的原因。在這兩種民主制度之中，我們必須抉擇，看那一個民主制度是比較前進的。

我沒有意思說，蘇俄的民主制度就是世上絕後空前的民主制度而無須加以改進了。我的意思只是說，蘇俄在本質上，是一個以代表全俄勞動者階級的利益爲職志的民主制度。按諸不勞動者不應得食的原則，這種民主制度值得我們效法。可是在枝節上，這種民主制度當然尚有革新進步的餘地。我們絕不應該以爲蘇聯在本質上，他的民主是進步的，便以爲附屬於蘇聯民主制度之一切東西都是好的。我們亦不應該以爲附屬於蘇聯的民主制度之上，有些

東西在中國可以不要，便以爲蘇聯是個獨裁的政體了，甚至還沒有美國的民主政治好，這就未免不合事實了。我們今日中國所企圖實現的民主制度，無論是中山的三民主義也好，或是共黨的新民主主義也好，都在力取蘇聯之長而避其短。例如蘇聯是一黨政治，中國便沒有人主張一黨政治的。只要爲勞動者階級前途謀發展，一黨固好，兩黨更好。蘇聯在創造這種民主制度的時候，採了恐怖主義，在中國便沒有恐怖主義。假如我們說，蘇俄有秘密警察制度，我們嫌牠不民主，那麼我們不要牠就是了。我不知道，我們自己不要牠，還有什麼人更要牠。可是，假如我們因爲蘇聯的民主在枝節上有些缺點，我們便以爲蘇聯不是民主。甚至中國亦不要更進步的民主，而寧選擇只以擁護少數的資產階級的利益的民主制度，這就未免過於感情用事了。這就好比，在五卅運動的當年，一般的老學究，因爲看見婚姻自由制度，在枝節上，有些弊害，便根本反對這種婚姻自由制度，而寧擁護不自由的婚姻制度是相同的。中山先生曾說，我們學外國須要迎頭趕上去學，不要只抓別人的尾巴，但可惜我們這些在象牙之塔裏面過慣書虫生活的人，往往養成一種媚事特權階級的心裏，即凡是在朝的人物，他的行爲都是對的，在野的都是錯的。只要他在朝了，他便是對的。吳佩孚在野不對，但在民國十一年把安福系推倒而後，他便對了，因爲他在朝了。孫中山就在臨時大總統的時期便是對的，可是在野便不對了。所以在民國十一年時候，吳佩孚一上朝，便連孫中山先生的老朋友，吳稚暉和蔡元培也勸他退位了。段祺瑞在野時被痛罵爲北洋軍閥，可是在執政府時代便被一部份教授們，視爲「更始」的或革命的領袖了。這種傳統的，感情的，和船上的心裏

的存在，是使少數的知識份子譏罵進步的民主制度的原因。可是少數畢竟是少數，傳統畢竟是傳統，感情畢竟是感情。過了一些時候，多數的、科學的、和理性的考察，必然還是要來奪取這個最後勝利的王冠的。但我却不願看我們的師友們不幸而變為時代所遺棄的落伍者。

四、三民主義的實現者有兩種人；（一）就第一種人來說，他們取得收益的方法是勞力，或大半是勞力。從民生主義來說，他們不是民生主義的障礙物，如大地主和大資本家。從民權主義來說，他們不是民權主義的大敵，如軍閥、官僚、土豪。從民族主義來說，他們不是民族主義的敵人，如帝國主義者的代言人或廣義的買辦。而且在他們之中，大半都是親身遭受大地主、大資本家、軍閥、官僚和土豪，帝國主義者的代言人或買辦的剝削的，並且爲了打破鎖在中國人民頸上的枷鎖鏗鏘起見，不惜犧牲他們自己的性命的。（二）就第二種人來說，他們取得收益的方法是資本和土地，但不是勞力或小部份是勞力。從民生主義來說，他們直接構成民生主義革命運動的大障礙——大資本家和大地主。從民權主義來說，他們又是普通老百姓的敵人——軍閥、官僚、土豪。從民族主義來說，他們又是帝國主義者的代言人——廣義的買辦。而且，在他們之中，大部也都是刑事上的犯罪人，或大半均是以吮吸小民的腦髓、血液和脂膏以爲生，而且他們自己便是鎖在人民頸上的枷鎖鏘鏘，因此他們日夜所馨香禱祝的就是怎樣能夠撲滅或躲避三民主義的刀鋒。在這兩種人之中，我們必須加以抉擇，看究竟誰是眞能實行三民主義的人物。

宣傳貞操主義的婦人有兩種，一種是買淫爲生的娼妓，一種是良家的婦女。在這兩類婦

女之中，我們必須加以抉擇，看誰是真能實行貞操主義的。

五、在國際上的強鄰有兩個，一個是資本主義的國家牠對我們有一個好處，可以供給我們的機器，可是牠也有過壞處，即是牠的工業品的輸入，便是我們幼稚工業的毀滅。一個是社會主義的國家，牠有一個壞處，就是牠沒有機器來供應我們的需要。但牠有一個好處，就是牠可告訴我們怎樣在資本主義的包圍中，發展我們的工業。在這兩個強鄰之中，我們必須抉擇，我們對誰的友誼應是第一位。

我們的朋友有兩個：一個是大富翁，他可借給我們錢，但要我們給他作准奴隸。一個是小硬漢，他的腰包沒有錢而且脾氣很古怪，但他却把我們當做小弟弟。在這兩個朋友之中，誰個的友誼應當放在第一，這也須得我們去抉擇。



只有兩條路

我現在想以極明確的方法，指出在中國的經濟上、政治上、人道上和哲學上只有兩條路。我衷心的相信中國只有兩條路，沒有三條路。

從經濟上說，中國如同其他國家一樣，只有兩條路。一條是經濟的路，一條是不經濟的路。經濟的路在把人類在自然科學上所研究的成果充分應用於工業，並把工業所生產的菓實，依照不勞動者不應得食的原則，把他分配給勞苦的大眾，和為大眾謀利益的精神勞動者，於是提高他們的物質生活的水準。不經濟的路，在把自然科學所研究的成果不必充分應用於工業，並把工業所生產的不充分的菓實，依照財產神聖的原則，把他多分配給寄生的階級和為寄生階級謀利益的奴僕，少分配給勞苦的大眾和為勞苦大眾謀利益的精神勞動者，於以降低勞工階級相對的生活的水準。在這兩條路中，究竟走那一條路，我們必須加以決定。

在自由競爭的時代，有產者階級除非增加就業的人數和增加生產，不能得到最大的利潤。因此他們便必須要把人類在自然科學上所研究的成果，充分利用於工業，於以增加工業的菓實。因為在自由競爭的狀態下，在每一種類的商品市場上，每一個工廠的主人所供給的部份，在總供給量之中所占的部份，極其微細，他絕不能減少供給提高價格，並亦不能增加供給降低價格。因他在這商品的海洋裏，所占的地位好像一滴流泉一樣，增之不為有餘，減之

不爲不足。他完全沒有控制商品價格水平的力量，因此，他便非充分利用自然科學於工業，於以降低商品的成本不可了。可是在生產獨占的時代，在某一種類的商品市場上，每一個工廠的主人所供給的部份，在總供給量之中，所占部份極大，他儘可以縮減供給提高價格，直到他所得的最大的利潤實現爲度。他既可以壟斷市場的方法，來增加他的分配，結果，他便不急於利用科學的發明來改良他的生產的技術，一則以降低成本，再則以增加生產了。因此生產便相對的減少了，分配更不公平了。這便是在上文裏所說，第二條路絕對不能把人類在自然科學上所研究的成果，充分利用於工業的原因。

在所有與管理尚未分家的時代，有產者尙非純粹的寄生的階級，因爲有產者尙須擔任計畫和指揮的工作。但自所有與管理分離後，在有產者中，除以經理的資格，取得薪津者外，他們完全是屬於純粹的寄生的階級，因爲他們並未擔任計畫和指揮的工作。由是他們和他們的奴僕所分得的勞動的菓實，便完全是種不勞而獲。這便是經濟學上所稱做的剝削了。

有人替有產者階級辯護說，他們的收獲是由他們以資本和土地參加生產得來的。但我們知道，土地是天然的恩賜，並非有產者階級勞動的果實。資本乃是勞動者以血汗創造出的生產手段，更與有產者的勞動無關係。資本和土地，在他出生並參加生產的時候，完全是在勞動者手內，而且他們所生產的成果，亦永遠沒有離開過勞動者的眼手。但因資本和土地和他們所增加的菓實，雖然在勞動者手內，但法律和政治却不在勞動者手內，從法律的關係上說，資本和土地屬於有產者所有，因此勞動者便須以他們勞動所創造的菓實，並以其大部分

給有產者了。由此可見，有產者階級，以一寄生階級的資格之能分配勞動者勞動的成果，全然不似他們的代言人所說，是因資本和土地參加生產的原因，而是因為法律與政治在有產者階級手中，假令一旦勞動者階級把政權和法權拿到手了，縱令資本與土地仍然參加生產，但這寄生的階級依然是不得分享勞動的成果的。由此可見，有產階級的經濟學家，希圖以巧妙的語言，來掩飾有產者階級的強盜的行為，亦是徒勞而無功的。

我們須要明白，現代世界上一切的罪惡都是由有產者剝削無產者階級而來的。然則將奈之何呢？這當然須要涉及政權的更迭了。

從政治上說，我以為，中國如同其他國家一樣，亦只有兩條路。一條是革命的路，一條是反動的路。反動的路，在把政權放在剝削者階級手內，但叫剝削者階級，自動的放棄他們的政權，或自動的限制他們自己的剝削，於以增進人民的福利。耶穌、孔子、和今日的教授者們所倡導的第三條路便是這一條路。這一條路在把勞動者的生存的權利，交給政治上的豺狼虎豹，但叫這些萬惡的豺狼虎豹，自動的放棄或限制他們的吃人的權利，於以保障人民的生命。革命的路在把社會上被剝削的階層聯合起來，向剝削者階層以和平的或戰爭的手段，奪取政權，根絕或限制剝削者剝削的權利，於以保障被剝削者的生命、健康、與自由。這一條路在把人們一齊團結起來，以溫和的或猛烈的手段，把豺狼虎豹上縛，以強制的方法，拔去他們的爪牙，然後再把他們解放出來，給予他們以平等的工作、麵包、與自由。在這兩條中，究探那一條路，我們仍然必須詳加考慮。

中山先生在臨終的遺言上說，中國的革命必須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但誰是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呢？我現在想提出一個斬釘截鐵的標準。即凡畏懼中國的被剝削的階層並怕他們起而執掌政權者便是侵略中國的民族。反之，凡不畏懼中國的被剝削的階層並鼓舞他們起而執掌中國政權者便是以平等待我的民族。任何一個侵略國均絕不能達成他們的侵略中國的目的，除非有中國人給他們當漢奸。中國被剝削的廣大的階層覺醒後，必無一人敢給侵略者當漢奸，因此中國的獨立便將成功。所以一個侵略國絕不鼓舞中國的被剝削的階層起而握掌政權。他甚且必要以雷霆萬鈞之力，來扶植中國的反動的政權，並鎮壓中國的革命的階級。所以，凡是扶植中國的少數的政權的，他必然是侵略國。日本扶植汪精衛與袁世凱便是可舉的例子。反之，凡是扶植中國被剝削階級的多數政權的，並不畏懼中國民衆的革命的便當不是侵略國。所以，中國在國際政治上亦只有兩條路，一條路是給侵略者當奴隸，一條路是給他以打擊。一條路是剝削，一條路是反剝削的。二者亦必須加以區別。

在剝削的和被剝削的階層尚未開始決鬥之時，一切問題尚可從容決定。可是，現在已經開始決鬥了。現在我們所要討論的，就是在這決鬥的過程中，必須那一方面讓步，方纔合於人道主義。於是人道問題便出來了。

從人道說，我以為中國，如同其他國家一樣，亦只有兩條路。一條是人道的路，一條是非人道的路。非人道的路，是剝削者階級把被剝削者的階級，以威脅和利誘的手段，把他們劈為兩半。並拚命以新式的武器來武裝這一半去攻擊那一半，逼着那一半以血肉和手榴彈來

火拚。每次火拚之後，都是積屍成山，流血成渠，妻啼子哭，慘絕人間，徒以蒙因剝削階層的地位與威風。人道的路是剝削者階層，以一種懺悔的姿態，拋棄剝削的權利，宣佈下野，而使戰爭停息，和平降臨，生產增加，分配平均，罪惡減少，幸福無疆。在這兩條路上，我們究竟走那一條路，亦須加以決定。

從思想上說，中國如同其他國家一樣，亦有兩條路。一條是空想的路，一條是科學的路。空想的路，相信人的高尚的理想是支配人生行爲的中心力量，希圖以教育的方法，或道德的力量，來勸告統治者階級拋棄殺人的屠刀，以求內心的平安。科學的路相信人的取得收益的方法是支配人生行爲的中心力量，企圖以革命的方法，或民主的力量，來團結這些在取得收益的方法上與統治者立於對立地位的階級，給統治者階級以限制，以求實現中國的民主的自由，並使中國在一不遠的將來，有一實現社會主義的機會。在這兩條路上，我們究竟走那一條路，亦必須加以決定。

我個人充分相信，中國只有兩條路，更沒有第三條路。何以說中國沒有第三條路呢？因爲第二條路已經包含了第一條路的好處，而無第一條路的缺點，所以便不須再有第三條路來走了。

三七、三、三十日於國立北京大學。

空想的社會主義和科學的社會主義

一切的社會主義都以反對富人剝削貧人爲出發點。在富人中有工業資本家，有富裕的生產者，有地主。在貧人之中有勞工，有貧乏的消費者，有個戶。我們知道，有的社會主義是專反對地主對佃戶的剝削關係的。這種佃戶也許爲佃農，也許爲城市中的租戶，二者均是可適用的。亨利喬治（Henry George）的進步與貧困，便以消滅地主剝削佃農的關係爲職志。所以喬治的社會主義，往往被人稱做土地社會主義。有的社會主義是專門反對生產人剝削消費人的關係的。法國經濟學大師，查理士季特，（Charles Gide）所著政治經濟學與協作，便是想要專以生產合作，消費合作和信用合作的創建來消滅生產者的地租，利潤和利息的。所以季特的社會主義亦可稱作合作社會主義。有的是特別着重消滅工業資本家剝削勞工的關係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大師馬克思所著共產黨宣言，便是以消滅資本家剝削工人的關係爲目的。當然馬克思同時亦主張消滅地主對於佃農剝削的權利。總之，在衆多的著作之中，凡屬社會主義，幾乎沒有一種社會主義不是以消滅或阻制富人剝削窮人的關係爲他們的共同的目的。

空想的社會主義與科學的社會主義所不同者有兩點：（1）空想的社會主義所持以反對富人剝削貧人的關係的理由是倫理的，或，宗教的，或正義的。但科學的社會主義所持以反

對富人剝削貧人的關係的理由，則絕不是倫理的，而是經濟的，或，生產的。(2)在實行的方法上，二者亦不一樣。即空想的社會主義所用以消滅富人剝削貧人的關係的武器，是教育的或法律的。科學的社會主義所用以消滅富人剝削窮人的關係的手段是政治的，或，革命的。空想的社會主義者認為理性是人類行為的終結的導師，或知識是人類行為的終極的導師。人類憑藉理性的裁判，可以鑑別富人剝削窮人的關係的不合理，並可憑藉理性的領導，自發的放棄他們的剝削的權利。佛陀說，「丟下屠刀，立地成佛。」又說「一切眾生皆有佛性。」此語在某種程度以內，實是在於表明人是可以接受他的理性的領導，自動放棄他的剝削權利的意思。可是，這種辦法最無效果，或者效果極小，等於沒有。一來呢？是因為這種願意接受理性的領導而放棄他的剝削的人，萬萬人中難有一個。再來呢？因為這種願意接受理性的領導而放棄剝削權利的人，往往到了實行放棄他的剝削關係之時，忽又轉過念來。他在億萬次的決意之中，難有一次是澈底的。舉例來說，比如托爾斯泰，他便是相信他自己可以接受理性的領導而放棄他的剝削權利的一人，可是他的這個信心不知欺騙了好多次。他在他的晚年的日記裏說，「托爾斯泰啊！你是照着自己的教訓生活的嗎？不，我慚愧得要死！」直到他在要死之前，他纔把他的農奴叫來，把田地都分給他們。在俄國二萬萬的人口之中，只有一個托爾斯泰纔願接受理性的領導，而放棄他自己以地主的資格對於農奴的剝削的關係。並且即以托爾斯泰來說，在他的幾千百次的願意之中，亦是只有最後這一次，而且尚還拖到了暮年，方纔付諸實行，可見自動的放棄剝削關係之難。

部份的放棄剝削所得的成果和根本的放棄剝削關係比較起來，後者比較前者實在更難。地主和資本家因受人道主義的影響，可以在其所剝削的地租，利息和利潤之中，拿出萬分之幾出來，從事慈善救濟的工作。但是，任何樣式的人道主義，也絕難叫地主和資本家們拿出他們的資產的萬萬分之一出來變賣，而以變賣的價值，從事同樣的工作。資本和土地好像兩株同根並蒂的搖錢樹，地租，利息和利潤好比搖錢樹上所搖下來的金錢。自己犧牲搖錢樹上所搖下來的金錢，是可以的。因為搖錢樹上有的是錢，用去了後還可再來。但如犧牲搖錢樹自己或其一枝一節，結果便兩樣了。因為犧牲以後，便永遠沒有相應的金錢回來不是。世上的富人，在某種程度以內，情願部份的放棄他們剝削的成果而不願意自發的放棄他們的剝削的關係——財產，便是這個道理。

人不但不願意放棄他的剝削的關係——財產，且必要積極的設法去保持他，和發展他。在商業資本主義時代，英國的地主，爲了擴充他們的牧場，實行圈地的運動，結果致把成千成萬的居民都趕到城市裏去當遊民去了。這便是英國經濟史上最著名的農人與羊羣爭食的例子。中國豪門資本家，爲了擴大他們的資產，實行壓低外匯的價格，並嚴格的管理外匯，結果，希圖把中國的部份的外匯，依據監察院的報告，以非法的手段，領取下來自美輸入奢侈品，於以擴大他們的資產。在中國經濟史上，這當然也可以算做一件大事。在對日抗戰的時期及以後，大批發國難財的好商與汚吏，直接和間接的掌握中國的政權，不以徵稅的方法來彌補財政的赤字，但以膨脹通貨的方法來增加貧民的負擔，弄得今日一般貧苦的大衆求生不

能，求死不得，但他們却因此而得保全和發達他們既得的剝削的權益。回憶自從鴉片戰爭以來，各帝國主義者爲欲擴大他們的資本，不惜以最陰險，最野蠻和最無恥的行爲，來強迫中國締結不平等條約，便利他們的商品在中國市場上來傾銷，或便利他們的資本在中國的處女地上來剝削中國人民的血汗。歷史的事實，以雷霆的聲浪，震憾世上的剝削的階級，說：『你們千萬莫要自己欺騙自己說，你們是可以接受人類崇高的理想，來支配你們的行爲的！』也就是說，他們應該牢牢的記住，支配他們實際的行動的，不是他們的崇高的理想而是他們的現存的剝削的關係——財產。

人，平均說起來，並不是他們的財產的主人，而是他們的財產的奴隸，在我們知識階層之中，賦有崇高的理想的人多的是，但有資本的，還是不肯自動的放棄資本，有土地的亦然。由此可見，專以廢棄或限制人類私產的剝削關係的社會主義，絕非憑藉教育的方法，便可以叫剝削的階級自動的放棄他們的剝削關係的，可是我們這些身爲人師的知識分子們，明知道這個事情辦不到，但還硬要咬緊牙關說，他可以，這還不是空想麼？

空想的壞處不勝枚舉，第一是自欺欺人，其次是不顧事實，其三是缺乏自信……可是，在這些壞處之中，還有一個最大的壞處，可惜這個壞處我還未說，就是反動。反動的原因有二：（一）空想的社會主義最易爲剝削階級所利用。本來剝削的階級，他們是社會主義之敵，但因空想的社會主義一再聲言，人人都是有理性的，人人且都可以爲聖賢，因此人人都可實行社會主義。從此剝削的階級便可以這類的理論，當做一種煙幕彈，欺騙世人說，因爲

我們是有理性的，我們且都相信社會主義，並準備放棄或自發的限制我們的剝削關係，這我們一定是做得到的。不過這個事情太不簡單，並非可以一蹴而躋，容緩辦去。但是緩到何時呢？這即是說，世上的剝削的階級往往利用空想的社會主義作護符，來延。他們的剝削的權利。我不用在這裏臆列實際的例證，讀者但在清夜的時候，傾耳審聽，由南京城外紫金山上從空氣裏所傳來的，這個慈祥老人孫中山先生的哭聲，便知道中山的知難行易的學說，是怎樣的爲剝削階級所利用了。他哭着臉說：「我竟不料我所鍾愛的兒們，竟然利用我的知難行易的學說，來欺騙世人，縷述他們已經知道了他們的剝削老百姓的過錯，不久便要改正，因以苟延他們的政治的生命！」再來呢，空想的社會主義者，在有些時候，並替剝削階級辯護說，「他們已經在進步了，你們假如不鼓勵人爲善，偏要日事求全責備，倘要不幸惹出禍來，那却應當是你們自己的吹毛求疵的過錯。」讀者但只睜開眼睛一問：是否中國今日相信民生主義的人便是擁護那些破壞民生主義的人的最得力的人呢？爲什麼他們要擁護破壞民生主義的人呢？因爲他們相信人人可以爲好人，因此凡破壞民生主義的人亦可以變成實行民生主義的好人，因此，他們要擁護他們。這便是空想化爲反動的最好的例證。空想的社會主義者太好了，他們以爲人人都可以遵照他們的理性的號令而行動。甚至兇狠的虎狼，因爲教育的關係，亦可自動的拔去他們的爪牙而爲嬰孩的侶伴。他們忘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兇狠的虎狼，不但不能自動的拔去他們自己的爪牙，反而要愛護他們的爪牙，並受他們的爪牙所支配。依據同樣的理由，剝削的階級一經從被剝削者的手裏奪來了剝削的工具，無

論在什麼情況下，平均說起來，他們都不會自動的捨棄他們的工具的。不但不捨棄他們，反而要愛護他們。官僚們能夠因為教育程度的增加，自動的放棄他們的官僚資本麼？有是有，萬億人中至多僅有一二而已！那麼你還擁護這一羣做什麼？這還不是反動麼？

科學的社會主義不然。他之反對人與人間的剝削的關係其所根據的理由，完全是經濟的或生產的。又其所持以消滅他們的武器則完全是政治的或革命的。例如私有的財產雖是剝削的關係，在倫理的立場上雖然可以反對，但如私有的財產尚有刺激生產的作用，他尚不會引起無產者的懷疑和反抗。必須私有的財產已變成了生產的束縛，纔會喪失他的存在的意義。例如機器的私有，在資本主義剛剛誕生之時，雖是一種剝削的關係，但因生產的機器化爲個人私有之後，機器不斷的改良，生產不斷的增加，生活不斷的進步，因此之故，他不但不會受過社會大部的反對，並且反而得到社會大衆的擁護。直到私有生產的手段，變成了生產的束縛。在一方面，因爲獨占的資本家階級，獨占了商品的市場，爲了提高利潤之故，不但不擴大生產反而減少生產，希圖減少供給，提高價格，直接妨害科學的發明在工業上的盡量的使用。在他方面，復因盲目的競爭，不斷造成週期的恐慌，耗費了人類無限量的生產力，方纔引起世人的懷疑與批評的。科學的社會主義者以爲剝削關係的應否存在，完全視乎他們是否增加生產爲轉移。此與空想派的社會主義者單從倫理的觀念去反對剝削關係的態度決然不同。

再說，科學的社會主義者所用以消滅剝削關係的武器亦非教育的，而係政治的，或革命

的。他們雖亦承認人是有理性的動物，但因他們經了千萬億次的觀察和試驗，確切知道，人在實際行爲的時候，不受他們的理性和教育支配，但受他們的剝削關係——財產支配，好像兇暴的虎狼，在實際行動的時候，不受任何理想支配，但受他們的爪牙支配一樣。虎狼不能自動的拔去他們的爪牙，但人可以拔出他們。剝削的階層不能自動的棄置他們的剝削的關係——財產，但被剝削的大眾可以團結之力代他們消滅他們。但他們絕不是要把剝削階層都殺掉，他們所要求的，只是廢止他們的剝削的關係——財產。即把生產手段的私有，化爲公共的所有。財產化爲公有之後，即以嚴密的生產的以計劃領導生產，增加生產，提高大眾的生活水準。在大眾生活水準提高之時。昔日的剝削階級，以一個公民的資格，還是可以有一份。他們雖然不強調人道主義，但他們的行爲却是與人道主義的精神相符合的。假如剝削的階級讓步，人道主義的實行機會更多。假如他們執迷不悟，流血的鬭爭勢所難免。但這完全不是被剝削者的過錯。在億萬人衆之中，剝削階級的人數少，被剝削的人數多。縱令剝削的階級在鬭爭的時候，致死的抵抗，但因他們是少數亦必終要失敗。由此可見，科學的社會主義，不似空想的社會主義，他到頭終必有光榮的勝利。

三七、三、五、於國立北京大學

教授治校與學術獨立

學術獨立的意義是什麼？這裏所謂學術的獨立，不是專指科學獨立的意義，而是泛指一切的學術獨立的意思。我以為任何學術的獨立，都應具備兩個重要的條件：（一）凡是前人的發明和創造我們差不多都跟得上。（二）凡前人所沒有發明或沒有創造的，我們亦有發明，亦有創造。這便是學術獨立的意思。可是，從發明和創造的本質上說，尚可細分為兩個小類：一、真正的學術獨立，和二、虛幻的學術獨立。真正的學術獨立須滿足兩個條件：（一）不但知識的成果是自己所發明的，連（二）獲得這個成果的方法也是自己所獨創的。反之，虛偽的學術的獨立，在這兩個條件之中，只能具備第一個條件，但未具備第二個條件，即只有某些知識成果是自己所發明的，但獲得這些知識成果的方法則完全是別人的。學術研究有如開鑛。鑛藏有距地面很淺的，有較深的，和有極深的。距離地面很淺的鑛藏，用土法即能開採。稍深的，用外人所發明的機器即能開採。極深的，除了自己發明新的機器外，絕對不能開採。隨着科學知識的應用和普及，凡距地面很淺的，甚至稍深的鑛藏，都已有入發掘了，而且幾乎已經開採完了。新到的工程家，除非挾有獨創的最新的機器，絕無發掘新的鑛藏的機會啊！這即是說，真正的學術的獨立須要能有偉大的發現，但欲能有偉大的發現，則非具有獨創的偉大的研究工具不可。一個研究學術的人，假如單憑利用前人所發明的

傳統的方法，其所發現的知識必定是很渺小的。除非備有獨創的偉大的研究的工具，他在知識思想上的新發現，絕對不能偉大。

真正的學術的獨立，既然是指無論在方法上或在知識的成果上，均要有偉大的創造，並且所謂偉大的創造既然又係指的大踏步的超過前人一切發明的意思，而且又因在學術上，凡屬大踏步的超過前人一切的發明，都係經由大踏步的追上前人的發明而來，於此，我們可以領略得到真正學術獨立的坦途了。即真正的學術的獨立，必須來自偉大的接受。除非你有偉大的純粹的接受，你絕對不能有偉大的嶄新的創造。由此可見，偉大的接受的态度乃是真正的學術獨立的起點。偉大的哲學家黑格爾說，純粹的接受的态度乃是真正的學問的開始。只有用這個態度纔能使你的評判是客觀的。希臘的幾何學者劈達古拉斯常說，任何一位初學一門學問的人都應該保守緘默五年不說話。黑格爾很贊成他的意見。因為從一個初學的人說，任何專門的學問，你都不配在這門學問上發表任何的意見。無論你有什麼自命為新穎的意見，假令你肯去多讀書籍，你都必會找到在歷史上已有許多與你的見解相同的意見。不但相同而已，並且要比你的意見高明幾百萬倍。此時你纔知道發明和創造大不容易。我以為把這種困難表現得最完滿的，莫過於在中國的一首古詩上所說：

不生古人前，單生古人後，

我口所欲言，已言古人口！

言下大有余生已晚創造已難，思想起來，好不傷感人矣的意味存在。從一個初學的人來

說，無論對於那一種專門的學問，既然前人的貢獻都要比你強萬倍，所以，在你初治一門學問之時，假如你真欲在最近的將來，創造一點真新的理論，你必先要靜下心來，接受前人對於這門學問所已發表過的舊理論，看任他們所已發表的理論之中，有否你的自命為新的見解。又你如欲了解前人的舊理論，必須先行制止你的不成熟的見解。在這一點上，黑格爾認為劈達古拉斯所倡導的初治一學城數五年的方法是正確的。

我之所以特別的強調偉大的創造來自偉大的接受這一點，除了一般的理由之外，個人尚還有一點特別的感觸的地方。記得在五四運動的當年，杜威博士來華演講實證主義，胡適之先生充任翻譯。杜威的實證主義既明白得來極度投合青年的趣味，同時適之先生又以他的明白有力之口舌與文筆，盡力宣揚。於是杜威的實證求知方法便成為青年學子尋求新知的不二法門了。杜威的實證的方法大約可以分做三個重要的步驟：（一）向舊說提出問題，（二）指出舊說的答覆的不妥當，和（三）創造新的學說來答覆。我現在深深感觸到杜威博士的這種求知的方法。從一個已經在學問上做過極大的接受工作的學人來說，實在是好的。因為他能啓發他的創造的知慧和引出他的創造的發明。這還不好麼？這點實在絲毫沒有問題。眼前最好的例子，就是適之先生自己。適之先生因為家學極有淵源，對於舊語言文字和先秦哲學已有極大的修養作根底，當時所欠缺者即怎樣利用他的舊有的知識創造出新的理論來。恰好此時得到杜威博士的實證的求知方法的奧味。忽然靈機一觸，於是文學革命和整理國故的新思想便出來了。單憑這一個例便可說明杜威的實證的求知方法，對於一個在某種專門學問

上已經做過極大的接受工作的人，確是好的。無如當時中國的知識思想恰在啓蒙時代，在一般學人之中，在某門學問上做過偉大的接受工作的人很少，特別的青年學子當然更說不上了。對於後面這一種人來說，杜威博士的實證的求知方法不但無益，而且是有害的。很坦白的說，我便是深受其害的一個。因為無論任何一人，假令在某種專門學術上，沒有做過相當偉大的接受的工作，妄想利用杜威的實證的求知方法，來向前人的著作提出問題，或向前人的著作提出反對的意見，甚或提出自己的答覆，那麼，我便敢斷言說，這種反對的意見，和所提出的問題並所創造的自命為新的意見和答覆，必均荒謬絕倫無疑。記得在杜威先生來華之年，我正在讀馬克思的資本論。我因深受適之先生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學理」的影響，並因誤解了他的真義，劈首便懷疑和反對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的學說，可是等到後來把資本論第三卷讀完之後，方知我對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學說的批評完全是荒謬的。難道說，馬克思的學說就不可以批評和反對麼？我對於這個問題的答覆是，假如你要使你批評是客觀的，那麼，在你批評之前，必須對於馬克思的經濟學先做一番偉大的接受的工作，方纔能夠成立。馬克思的經濟學如此，其他的學術亦然。除非你先能對舊的有所接受，休談對於這門學問，有何新的發現。更往深的一層說，除非你對於這門學問已有一種偉大的接受，休談對於這門學問能夠有何偉大的創造。假令你對於某門學問還一點也不知道什麼，便大膽的去懷疑舊說、反對舊說、和創造新說，這絕對不能使你在學術上有何丁點的新發現。相反的假如你欲在某門學問上有偉大的發明和創造，你必須先從偉大的接受做起。

把這個道理應用到大學教育上，從學術獨立的立場上說，我們應該很坦白承認，我們的接受的工作還是嫌不夠偉大的。因為偉大的接受必須要有偉大的藏書，但現在我們各大學裏的藏書最不豐富不是？同時也必須有偉大的實驗室，但現在也沒有不是？這點向以提倡學術獨立名震寰宇的胡適大師已說過了，我不願再為這一小點大費唇舌。我所要特別的強調的，即現在各大學裏除開極少的例外，已無蔡子民先生偉大的兼容并包的精神。一言以蔽之曰，現在各個大學裏的社會科學已不能容納兩派極端相反的理論，在大學裏自由競爭他們各自的地位。非正統派的哲學文學和社會科學或民間的社會科學哲學與文學，在大學裏已無立足的餘地。可是，非正統派的哲學文學和社會科學却不能說他們沒有學術的價值。除非把這點改正了，我們無論如何的擴充我們的圖書與儀器，我們只能做到虛幻的學術的獨立，即只能做到以正統學派的方法來發現真理。因為正統學派的方法所能發現的真理極其有限，因此我們在學術上的新發明或新創造亦必極其有限。

從整個學術的發達的歷史上說，民間的學問纔是最有價值的學問。在官派的思想之中，有些只是一種八股文章，它的內容，往往庸俗不堪，膚淺不堪，和陳腐不堪。在中古時代以後的新約在宗教上最有價值，但新約是民間的宗教的思想，而不是官派的思想。在文藝復興的時代，科學最有價值，但科學是起自民間的，它不但不是官派的，而且是革命的。在中國五四運動的時代，白話文的運動最有價值，但白話文也是起自民間的。從學術的發展史上說，一切偉大的學術的思潮無一不是起自民間，但到了發展到極高峯的時候，不久便為官派的

思想了。此後便開始沒落，直到另一個起自民間的偉大的學問來代替了它的崇高的位置。起自民間的思想在學術的發展史上，既居於領導的地位，然而今日的大學，除開極少的例外，却無一不是對於這種思想心懷厭惡。或則置之不理，或則闢為邪說，或則列為禁書。此於中國的學術獨立的運動最有妨害。除非把這種偏狹的態度加以糾正，我們所期望的真正的學術的獨立必難辦到。設使在五卅運動的當年，蔡子民先生辦理北京大學亦只注重官派的思想，對於民間的思想或則完全不理，或則深惡痛絕，或則斥為禁書，那末，中國的學術的進步必然已被延緩若干的年歲。那麼，今日的我們也許尚還在做八股文，在讀經，和在復古，也是說不定的。爲了學術的獨立和爲了真正的學術的獨立，凡屬今日大學的最高當局和教授，我以爲均應以蔡子民先生的兼容並包的態度爲法。這當然也正是適之先生所倡導的態度了。

民間的思想是什麼？民間的思想，自特權階級視之，便是叛徒的思想，但自被特權階級所奴役的人民視之，便是革命者的思想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自滿清政府視之，便是海盜的思想，而自全中國的人民視之，便是革命者的思想了。真正的學術的獨立，從它的極端的意義上說，就是叫官派的思想敗退，而讓叛徒的思想勝利。除非賦有這樣偉大的氣魄，我們不能領導中國真正的學術的獨立。

可是，現在中國的大學，不但真正的學術獨立沒有辦到，就連我們所鄙視的虛幻的學術獨立，即充分利用正統學派的方法來尋求真理這一個小點亦未辦到。除開極少的例外，大學竟有不重視思想和真正學術的貢獻的。不可否認的在今日的有些或極多的大學裏，還有一部

份的首腦人物，在口頭上雖然注重學術，在行為上所注重的，尙還不是學術，而是人事，人事之中，尤以封建關係最占地位。現在大家一致公認政府最腐化，但大學裏面不是腐化嗎？人事關係不能完全沒有，但因有人事關係之故，而以一种極端狹隘的態度辦學，非但不能引進民間的思想在大學裏自由發展，即對正統學派有造詣的人，除非有人事關係，亦不得在大學裏得到講學的機會，實在是可恥極了。最可引為不幸的，即在大學裏堪稱大有人事關係的首腦人物，雖然不乏開明之士，但可惜大多也都朽了，老了，油滑了，和險詐了，然而今日的有些大學或極多的大學却不折不扣的被把持在這些人手內，嗚呼中國的大學教育！嗚呼中國的學術獨立！

雖然，我以為學術的獨立還是辦得到的。這只要我們在大學裏能夠培養成功出來一種偉大的接受態度就行了。培養這種偉大的接受態度亦非難事，只要我們肯把民主政治的原理，介入大學裏面就行了。這即是說，除了大學校長而外，一切的最高行政的當局都由教授選舉。第一，在教授裏面，人才濟濟，如用選舉，中選教授，定比較有學問與能力。第二，教授會對於學校的行政當局既立於批評和監督的地位，濫用職權之事，勢難保存。這樣一來，狹隘的封建關係必然消滅，偉大的兼容並包的精神必然誕生。伴之而來的在學術上的偉大的創造，必然會有加速的發展。這不是一件不難實現的事情麼？所以，我的結論是，真正的學術獨立之實現，在中國這個國土內，須有賴於教授治校的制度的推行和示範。

今日大學教育的使命

——由思想自由與嚴格考試說起——

在北大四十八周年紀念（十二月十七日）晚會的席上，關於北大的獨特的性格，無論在先生方面或同學方面，都有不少的宏文和偉論，同學方面說，「北大有一種人性暢適的充沛的活力，那就是學術的自由和研究的自由，這是每一個北大人引為驕傲的。」先生方面說，「北大一向是提倡科學與民主的，可是現在中國的科學與民主在那裏呢？」或者說是，「北大……的民主與科學的理想曾經鼓勵全國的青年孜孜不倦的向上向前讀書求學……我們要將這傳統發揚光大起來。」我覺着這些宏文和偉論，還不足以充分表現北大的歷史的成績和任務，儘管他們的理由都能存在。現在我擬從北大的史的發展方面，來重新估定北大的價值。

北大自從清光緒二十四年五月詔設京師大學堂以迄於今，大約可以分為四時期：（一）蔡元培以前的時期，（二）蔡元培校長校時期，（三）蔣夢麟先生校長校時期，（四）胡適之先生校長校時期。我現在僅從蔡先生校長校時期說起。

北大在蔡先生校長校的時代，養成了北大一種最有永久價值的學風，是即思想自由或研究自由的精神了。從社會科學方面說，當時的陳獨秀先生和李大釗先生都是領導社會主義運動

的權威。可是在他方面，却有以尊孔教保皇室的辜鴻銘先生，頭戴紅頂瓜皮緞帽，腳踏尖頭粉底皂靴，身繫大藍綢腰帶，帶上掛的是搭襪烟袋和紙扇等項零星物件，一望而知其為頑固不堪的守舊人物，恰與這二位赤色革命的教授作個相反的對照。再從文學和哲學方面說，當時有現任北大校長的胡適之先生和吳幼陵先生，前者乃是一位首倡文學革命的宗師，後者乃是一員隻手先打孔家店的好漢。可是在他方面，却有大罵白話文學的林釭和尊孔孟宗儒術的梁漱溟先生。記得胡先生和梁先生同在北大法科大禮堂上表演對臺戲，但他們均同博得臺下各般聽衆一樣熱烈的掌聲。當這各派對立的教授各以唇鎗和舌劍互相砍擊不休的時候，蔡元培校長却超然以兼容並包的精神維持公共討論的良好秩序，使各方均有共同發表意見的機會。這便是北大的偉大的地方。北大的偉大最好是用吳之椿先生的幾句話來表現，就是北大「沒有界限，沒有『派別』和沒有門戶」。也正如同學們在北大四十八周年紀念特刊上說，「在北大有一種人性暢適的充沛的活力，那就是學術自由和研究自由，這是每一個北夫人都引爲驕傲的」。綜括來說，就是北大在蔡先生時代有一獨特的精神和表現就是「思想自由」這四個大字。

可是在這一個時期裏，北大確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校內的考試，一般的說來，還沒有嚴格到應該嚴格的程度。我說校內的考試不太嚴格的意義並不是指北大的入學考試。實則北大的入學考試是夠嚴格的了。我所說的校內考試不太嚴格的意義是專指入學考試以後的各種考試而言。北大進來的門限當時實在是很高，只出去的門限太低罷了。在這一方面，北大

實有對不起社會的地方。假如北大當時的同學還在，他們一定能夠給你報告當時的考試不太認真的情形。據我所知道的，就是當時有的同學在一方面儘管在學校託人註冊了，但一方面，他却跑在政治舞臺上給軍閥當小走狗去了，但這似也不妨礙他的畢業。有的同學的名字，雖然還掛在學校的名單上，但自己却到外國去了。到外國住了一年之後再回學校畢業。有的託人代考，但事後却也並無被發現的危險。有的平時毫不看書，不上課，但因考試時可以抄講義，因此，也就對於畢業無妨礙。最可令人想着還要回味的，就是這位鼎鼎大名的浪漫派文學大師郁達夫先生，他曾教過我們的統計學。在他恰上第一點鐘的時候，就保證我們全班以後個人的考試均能及格。他只上了一點鐘就不上了。後來把統計題出下來我們自己作，所以也就個個及了格。我並不是說，個個教授都是這樣，也不是說，文理法院都是這樣。我所要說的，只是在蔡先生時代學校的考試，一般說來，實在是還沒有嚴格到應該嚴格的程度。我倘敢說，北大從民國八年五四運動起直到民國十七年北伐完成時止，北大因為沒有注意嚴格考試的結果，曾給社會製造了不少的「空瓶子」。

除開很少的例外，我總以為，一個大學生必須在大學時代刻苦用功，學得一些專門知識或技術，使在畢業而後能夠保障自己的生活，方纔足以保障自己的人格。假令大學畢業而後還只是個空瓶子的話，結果生活必定沒有保障，生活沒有保障，我看人格亦一定是沒有保障的了。環顧歐洲的頭等大學幾乎沒有一個不是充滿着思想自由的精神的，但却沒有一個不注重嚴格考試的。蔡先生時候的北大只有思想自由的優點，但沒有嚴格考試的優點，因而給社

會製造了好多空瓶子，這不能說不是北大的一個弱點。

驟看起來，思想自由與嚴格考試幾乎很難分道揚鑣，並存不悖。因為學校一旦注重嚴格的考試勢必便要連帶的妨害學生思想的自由，反之，學校一旦提倡思想的自由，勢必便要連帶的影響學校嚴格的考試。假如一個大學的學生天天都要上講堂，抄筆記和背誦先生的經典，結果勢必要以先生之是非為是非，或以先生之思想為思想了。這豈不是與思想自由的精神全相衝突麼？但仔細一想，則知二者的好處均可合併在一校，使無互相衝突的餘地，這只有一個大學所採的考試方法何如而定。英美的大學對於研究生的考試普通都採一種選任教師來考試的辦法。舉例來說，比如你的思想偏向馬克思則請一個馬克思派的學者來考你，偏向凱恩斯則請一位凱恩斯的學者來考你，這還有什麼不公平麼？關於一般大學生的考試我最贊成德國大學的辦法，即大學的考試任憑學生自己選擇自己的考試時間，你平時完全有自由讀書的權利，無非你要取得學校的文憑時，你便必須參加學校的考試就是了。假如我們把嚴格的考試制度善於應用，我看未必不能與思想自由並肩而進。亦就是說，北大提倡思想自由之功並不足以掩飾其馬虎考試之罪。

可是蔡元培先生長北大的時期亦並不長久。北大自民國十九年起，因蔡先生忙於創建國立中央研究院的制度，改薦蔣夢麟先生長校，北大從此便正式進入了蔣夢麟先生的時代。

蔣夢麟先生時代的北大與蔡先生時代的北大有一點特別不同的地方，即蔣夢麟先生時代的北大特別着重嚴格的考試制度的建立。我們知道，國立的清華大學是一向注重嚴格考試

的，可是北大在蔣先生長校的時代曾建立了優良的考試制度，堪與清華大學相比美。從一個愛護北大的同學看來，這是值得讚美的一個大功績。可是思想自由的精神，却不免籠罩着一層灰黑的煙霧。到了對日抗戰的前夕，北大如同清華一樣，因為外界的壓力太大，爲了遷就當時的環境，少數思想左傾的教授於是便喪失了講學自由的機會。例如北大的許德珩教授和清華的張申府教授都是可舉的例證。幸虧這種例子不多，否則北大恐怕早已成了一種變形的「治舉業」的機關了。

儘管現代是有許思想家都不承認世上有什麼永久不變的真理，但我的意見却與他們立於正相反對的地位。我不否認世上有一部份真正隨着空間和時間的不同而變化。但我衷心的相信，除了這一部份的真理而外，尚有一種普遍的和永恆的真理存在。例如思想的自由是。我以為無論在任何國家和任何社會制度裏面，除非我們不要文明和進步，思想自由的權利必須永久的發揚和光大。生命可以犧牲，頭顱可以粉碎，但思想自由的權利却不可以須臾的喪失和棄置。特別的是在一個研究學術的最高學府裏，更應以全力保持思想自由的權利。

可喜現在壓迫思想自由的外在的力量已經逐漸在消失，隨着勝利的來臨，北大再度變成了思想自由的園地。再加上蜚聲國際的首倡思想革命的大師胡適之先生來長校，使北大已有的有學問的先生不再想離開，新來的先生雲集。教授的學問既高，思想自由之風與嚴格考試制度，均不難保存與光大。這實在是北大的千載難逢的再生的良機。可是我們莫忘記了中國現在仍然尚未脫盡摧殘思想，摧殘學術，和摧殘各種進步力量的階段，北大的前途仍然充滿

着許多內在和外在的邪惡的引誘與壓迫。爲了保持北大傳統的思想自由的精神和爲了奠定北大學術的根基，除非我們抱有一種不爲權力所震駭，不爲名利所引誘的殉道者的決心，北大恐怕很難負擔思想自由 學術獨立的任務，而與一切的反科學與反民主的黑暗勢力相決鬥。



學生運動的意義

現在我想劈頭提出一個嚴重的問題，即從本年五月二十日以來，全中國中等以上學校的學生所領導的反俄和反內戰的運動，和在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北平各專門學校學生所發起的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的運動，像這一類的運動，在枝節上，當然不免亦有感情用事的地方，但是，在根本上，它究竟是否應當存在呢？關於這個問題的答覆，老早便有兩派名教育家的主張。

第一派名教育家說，高等教育的目的，在於培養學生獨立的發現真理的能力和獲得專門知識及技能，以為異日利濟社會之需。以現代專門學問的博大精深和日新月異，縱令青年學子在求學這段短促的時間內，竭盡全力，專致一學，不為政治所引誘，不為時髦所炫惑，日夜孜孜，不輟不休，至於畢業，亦未必能獲得一種獨立研究的能力，或專門的知識與技術。假令在這求學的期內，再為政治的運動所分心，將這最寶貴的時間來干預政治，結果不但政治管不好，而且連學業也荒廢了。待到畢業之後，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既不能靠勞力以為生，但又無財產的收益以為助，其結果非常高等流氓不止。這不但對於國家社會無利，而且對於學生個人有害。因此學生運動，在根本上，不應聽其存在，而當予以取締。「最近教育社會兩部，」依據中央社南京十六日電，「以風聞有未經核准之全國學生聯合會，在上海交

通大學舉行會議之舉，……電請上海市吳市長查明依法取締」，其所依據的理由，亦不外說，學生「對外活動不免有妨學業……故決加以取締」。

無論在任何社會制度裏面，青年學生的地位都好比在竹林裏面的一些柔嫩的春筍。假令在暴風疾雨的時候，不幸這些柔嫩的筍羣，因受過度的刺激而夭折，無論從任何方面說，都是未來社會的不可彌補的損失。青年人在今朝應該多作涵養性情並埋頭伏案的工夫，到了將來學成識定之後，再為社會犧牲可耳。偉大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在他的晚年的時候，也有類似的意見。這種意見內，含有部份的真理存在，因他明白的宣言，學生時代的最大的任務，在於陶冶他們的人格與智力。我們絕不能說它是完全錯誤的。

第二派名教育家說，青年學生的運動，在原則上，雖然不應存在，但在政治腐敗的時候，青年學生的運動是必要繼續發生的。所以教育者們應當對他們寄予真摯的同情與疏導。現任北大校長胡適大師，在民國九年晨報五四紀念刊上所發表的「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一文裏，說得最好：

「簡單一句話，在變態的社會國家裏，政府太卑劣腐化了。國民又沒有正式的糾正機關，那時候，干預政治的運動，一定是從青年學生界發生的。漢末的太學生，明末的結社，戊戌政變以前的公車上書，辛亥以前的留學生革命黨，俄國從前的革命黨，德國革命前的學生運動，印度和朝鮮現在的獨立運動，中國青年的五四運動和六三運動都是同一的道理，都有產生的理由的。」

胡適大師，在距民國八年五四運動為時已隔二十八年的今天，再將他的意見，在本年（三十六年）五月三十日北平行轅記者招待會上，重新強調一番。他說，「古今中外的學生運動都逃不出一條公例，就是政治不能令人滿意，又沒有合法民意機關用合理手續使政治革新，於是這個要求改革政治的担子，就落在青年學生身上。」由此可見，胡適大師的關於學生運動的見解，乃是深思熟慮的結果，最值得我們仔細的研究。他的意見，已經認識了學生運動的必然性，比較第一派的教育家們的閉門造車的高等教育的政策，是更合於歷史發展的公律的。但是在胡適大師的談話之中，似乎亦尚有美中不足的地方。儘管胡適大師已經認為學生運動，在「國家不上軌道，又無一合法民意機關監督政府的時候」，乃是一件不可避免的运动，並極力主張教育家們應當對他們以特別的同情與包容。但並未明白的說，學生運動在高等教育的原理上，是否應當存在。必須把這一點認清後，我以為，我們對於學生的運動，始有正確的評價。

從高等教育的原理上說，我以為今日的高等的教育有一個很重要的缺憾，即只知注重智育和體育，但忘了注意德育，尤其是忘了注重羣育。學生運動無疑的可以補足高等教育中缺乏羣育這一個環節。為什麼呢？（一）學生的運動是一種自發的和主動的運動。誠然，在學生運動裏面，不免也滲雜得有主義的成份，或不免也有一、二青年共產黨滲雜其中。可是，假如我們以為在學生運動裏面因有相信共產主義的青年參加，便以為學生運動是被動的，這可不是事實。回憶在民國八年五四運動發生之時，任何黨派主義均未滲入，但學生運動依然

爆發。由此可見，共產主義的存在，並非學生運動爆發的原因。正如南開大學教授黃鈺先生所說，「不錯，這次學潮的口號——反饑餓反內戰——平、津、京、滬、武漢、蘇、杭、全一致，發動的日期也先後相接，這其中必有人主使策動；主使策動容或有之，但我們要問，如果沒有刺激青年的情境存在，策動何以如此順利？主使何以如此成功？口號如果不是心坎的話，口號如何喊得那麼響？說多數青年受人利用……這都是不公道的說法。」實則，任何學生的運動的目標都是學生們以學生的立場，向大會公開提出的，並係學生們以學生立場去討論反對和通過的。提出者不必是共產黨分子。贊成者更不必是他們了。縱令提議者是他們，但這亦絕非上級對於下級的命令，而係他們以學生的立場，從學生的心坎裏，自動的向同學建議出來的。同時所有一切的議案在討論和表決的時候，更須要透過大多數的毫無黨派色彩的學生的心靈的活動或判斷才行。歸根到底的說，學生運動確是自發的和主動的。這種自發的和主動的學生運動，在積極的方面，可以養成學生從共同利益的觀點，研究國家切要的問題，並在廣大的羣衆的面前，大胆的發表他們的批評和建議的勇氣。辯論是發現真理的武器，公開是打倒黑暗的武器，這兩種武器都是近代市民所必須具備的條件。但自發的和主動的學生運動都可以培植他們。從教育的立場上說，它的價值是無上的。而且消極的方面，學生的運動並可以破除中國幾千年來人與人間的鬼鬼祟祟的陰險的行爲，如這一類的陰險的行爲，其在中國社會裏所發生的惡影響，我看也只有飢饉與內戰纔足以暴露出他們的殘忍與罪惡呀！

(二) 學生運動是一種有組織的運動。這種有組織的運動，並可以消滅中國幾千年來在士大夫階級裏的頹廢自利的劣根性。孫中山先生，在他的民族主義裏說，中國四萬萬人好比一盤散沙。爲什麼呢？因爲中國人只知有家而不知有國，更不知有世界。其實中國人的弊病何只只知有家，除了只知有家之外，幾無一人不是只知有政治的小組。只知有金蘭的弟兄，只知有裙帶的關係，或孔宋蔣的關係，和只知有同鄉或同鄉的關係等等。偉大的中國今天的分崩與離析，全是被這些狹隘的封建關係製造出來的。學生的運動正可以補足中國傳統的重私交忘公誼的弊害。平心而論，以現在在社會上作事的人的態度來說，好多人都說，在社會上作事的人中，惟獨北大畢業的同學，比較的不注重校友的關係。爲什麼北大畢業同學比較不注重這個關係呢？我以爲，這並非偉大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在講堂上講授學理的功勞，而是五四時代，偉大的學生羣衆所發動的有組織的運動把它孕育而成。我衷心的相信，將來新中國的任何大學畢業生，當他們踏進社會肩任國家的艱鉅之時，均必比過去北大畢業的學生的態度更偉大，因爲今日學生運動的組織比較五四時代更要偉大的原故。除非中國的教育不要養成學生的偉大的人格和偉大的組織的能力，我認爲，全中國的學生運動，甚至全世界的學生運動，都是值得我們讚美和發揚的。

(三) 學生的運動是一種由下而上的運動。這種由下而上的運動在消極的方面，可以打破中國幾千年來官僚政治的一切由上而下的辦法。在積極的方面，並可以培養國民的由下而上的民主政治的作風。正如朱光潛教授所說「民主的主要條件是每個人勇於表現自己的意

見，樂於尊重旁人的意見。學校本應是民主訓練的最好的場所。」朱光潛教授雖然指譏現在學校裏羣衆運動的缺乏民主的精神說，「現在學校裏的羣衆運動往往只是官場黨派的惡伎倆的抄襲。多數人既沒有勇氣表現自己的意見，少數操縱者於是假民主的名號，作反民主精神底行動」。朱先生很感歎這種不愉快的事情的發生，而以之歸罪於「中國人的劣根性太深，離真正底民主精神還太遠」。我很贊成朱光潛教授這句話，即「學校是民主訓練最好的場所」，可也有一點要補充的地方。假如說，在學生運動裏，還有少數操縱多數的反民主的行爲，那必是由於多數人還沒有養成在公衆面前勇於發表意見的習慣。但這並不是由「我們中國人的劣根性太深」，而是由於一般大學的訓導處並沒有積極的提倡學生的運動或多給學生在廣大的集會裏勇於發表意見的機會使然。民主也如一種課程一樣，除非讓學生多作實際的練習，它是不會熟練的。孟子說，「人恆過然後能改」。新教育家說，「試驗與錯誤是學習任何科目所必須經過的途徑」。錯誤固然要改正，但學習的機會不可失。多讓學生以集會結社的機會，這個錯誤必定減少。爲了民主，爲了理性，我們無不希冀今日中國的教育家，積極的扶植學生的運動，使它成爲代替中國的官僚政治的初步。

根據以上的三點理由，我以爲學生的運動，在高等教育的原理上，不但是必然的，而且是應該存在的。今日大學的教育既太偏重智育與體育，所以我們必須把學生的運動看做羣育的對象，以補今日大學教育的不逮。誠然學生的運動不免要犧牲一部份的學習的時間，但體育不是也要犧牲一部份的時間麼？從羣育的原理上說，這個犧牲是值得的。因此，我們站在

教育的立場，不應對於學生運動所必要犧牲的時間加以惋惜，而且應當正式的給予。我們必須站在教育的立場，把學生運動認為是羣育的對象，對於學生的運動完全立在鼓勵和指導的地位，方纔能夠糾正學生運動所犯的錯誤。如此說，學生的運動在原理上不應罷課，不應彼此打架和漫罵，並不應以多數壓迫少數，並應當努力作成羣衆運動的楷模，凡此均必須要教育者站在教育的立場去鼓勵和指導纔行。當然學生自己亦應當努力避免上述的缺陷，方纔不至貶損學生運動的價值。我誠懇的建議，在每個半月內，在大學的課程表上，留出半天的時間來，並擇定一個偉大的民主的廣場，專給學生們來作公開的演說。相信馬克思主義的可以演說，相信牛克思主義的亦可以演說。喜歡和平的人可以演說，喜歡戰爭的人亦可以演說。相信科學萬能的人可以演說，反對科學的人亦可以演說。這些公開的演說都可以讓市民來聽講也可以讓市民聽講人自由發問。但由學校擬出一定的公開演說的規律，來讓大家共同遵守而已。這樣一來，我敢相信，凡大學生均可以養成一種在公衆面前，公開發表意見的技能與勇氣。由是，少數壓迫多數的反民主的行動，便可因多數的覺醒和他們的判斷能力的增加，而受致命的打擊了。這樣一來，學生的活動定當成爲民主運動最好的楷模，並必對於社會發生良好的政治教育的作用。但是這必須要學校把學生的集會看做羣育的對象，並必須學校注重羣育，方纔敢於來領導這個偉大的羣育的工作。但這却是今日中國的教育所必需的。

記得蔡元培先生在五四運動時，對於學生運動的名言是，「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蔡先生這一句話，已經明白的承認學生運動在教育上的意義。但可惜他未能站在高等

教育的立場，正大光明的把學生運動看做羣育的一部份。可是，今的大學教育確是必須正大光明的承認學生的運動應為羣育中的部份，方足以適應民主政治的需要。因此之故我特建議，把蔡先生這兩句話，依照蔡先生的原意，大胆寫成下面的這個新形式：

教育莫忘羣育！

讀書莫忘救國！

我應很坦白的說，我並非研究教育的專家，凡所發表的意見，都只是一種外行人的看法。世有專研高等教育者尚希有以教我。

三六、六、廿一於北京大學

（觀察第二卷第二〇期）

由必要到自由

偉大的哲學家黑格爾（Hegel），在他的大著邏輯學（Science of Logic）上說：

沒有必要的自由和沒有自由的必要都是抽象的。自由不是空洞不定的，他是具體的，並是堅定的自決的，因而他在同時便也是必要的。再說，必要這個名詞，在庸俗哲學中一般所接受的意義，係指靜受外力決定的意思，——如像在力學裏，一物只有在受他物的碰擊的時候方纔活動，又它的活動的方向亦是由此碰擊所指示的。但這只是外在的必要而非內在的必要，內在的必要是與自由不相衝突的。（英譯本七十一頁）

這一段話，充分說明，內在的必要與意志的自由，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完全一致的。他的意思是說，內在的必要不是被動的必要而是能動的必要。他不是一種靜止的狀態而是一種活動的過程。他的活動的方向，在於戰勝他的外在的束縛，企圖現出它的內在的本質來。恰如胎兒在母體中成長的時候，越過一定的階段後，他便要克服他母體對他所施的束縛，和完成他的呱呱墮地的使命是一樣的。現在我們對於這個同一的舉例，試採兩種不同的看法。第一，假令我們單從母體來看胎兒，並忽略了胎兒的終極的變化，當然我們會說，胎兒必須靜受母體的限制。在這必要的過程裏面，確是沒有含着任何自由的成份。可是，假如我們掉過頭來，從胎兒來看母體，我們勢難否認，母體的束縛終必為胎兒所破壞。由此可見，在這必

要的過程之中，自由雖然占了一個極端重要的位置。必要之中含有自由，憑此一例，即可了然。

反過來說，在自由中亦有必要。必要乃是自由的一個想像的要素。例如，在五卅運動之年，適之先生倡導文學的革命，當是他的自由思想的結果。同時其他的思想革命亦然。可是適之先生在倡導文學革命之時確曾公開的宣言，文學的革命乃是一種歷史的趨勢與時代的要求。且看他說：

「文學者隨時代而變遷者也。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周秦有周秦之文學。漢魏有漢魏之文學。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進化之公理也。即以文論，有尚書之文，有先秦諸子之文，有司馬遷班固之文，有韓柳歐蘇之文，有語錄之文，有施耐庵、曹雪芹之文；此文之進化也。」（胡適文存第一集第九頁）「吾輩以為今人當造今人文學，而古文家則以為今人作文必法馬班韓柳……記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戕必及乎身。』此言復古者之謬，雖孔聖人亦不贊成也。古文家之罪，正坐『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同書第四七頁）

適之先生，在提倡白話文的時候，既特別強調「今人當造今人之文學」又說「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戕必及乎身。」這無異說，他之倡導文學革命在根本上亦是必要的和道德的了。可是，他的這種必要的和道德的意識，絕不足以貶抑他的思想自由的價值。不但未曾貶抑着它，而且光大了它和尊崇了它。自由假如沒有必要，必是空想的武斷的，或瘋狂的。他不但

不配稱做自由，且是自由的一種叛逆——獨裁或專斷。一言以蔽之曰，人在充分了解他自己的活動，在受必要所支配時，正足以表示他的自由有根據，並非即此便作了必要的奴隸。

必要不是叫人盲目的或被動的服從外力的壓迫。人只有在對於必要毫無知識的時候，他纔會作必要的奴隸。他倘若一旦認識了必要的性質，即在積極的方面，理解了必要的成長和興盛，和在消極的方面並理解了限制它的條件必要衰敗和沒落，必要，這個理解了的必要，便會爲人所控制，作爲人們達到目的的手段。自從人類理解必要的過程，一開始，必要便成爲人戰勝自然和戰勝人們自己所用的指南針。有此必要的指南針作指導，人們從不會錯了他的努力的方向，它並可使人的努力有成果。這即是說，人對必要的理解有增加，他的自由便亦當爲比例的增加。自由是什麼？自由並不是叫人胡作亂爲，叫人指鹿爲馬，嘗冰說熱，誤苦作甜，認善爲惡。自由無論在任何時候，都是指人的判斷的能力。但人的判斷的能力從何而來呢？無疑的是由他所具有的必要的知識而來。人對必要的理解越高，他的判斷的能力亦越大，同時他的自由的權力亦越大。一個在水裏游泳的技術極高的人必是一位知道水性最多的人。數學，從一個不習數學的人來說，乃是一種苦悶和恐怖，但從一個熟習數學的人來說，數學乃是一種最能引人入勝的科學。一切的數字或符號，在一個偉大科學家的手中，盡是一些活潑的意見，他可以利用他們來解決在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上的許多除了數學便當無法解決的極有興趣的問題。由此可見，自由判斷的能力全係由於他之內中含有必要的知識。

無論在任何時候，自由乃是由於反對外力的壓迫而來。可是外力的壓迫絕對不是永久不

變的。在一切的外力裏面都含有否定它自己的成份。握着這個否定的要素，並盡力去加強它的否定的趨勢，任一壓迫人們的外力終必爲人所制服。這不但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上如是，在人與人的關係上亦如是。

從人與自然的關係來說，自由是指人對外界的自然克服。人的克服自然的武器無疑的便是人對自然所獲得的必要的知識。它必然是歷史進化的產物。人雖與禽獸不相同，但最初的人，在一切的要義上，其不自由的程度與禽獸幾無二致。在人類歷史的開頭，人對自然的必要知識的把握，是人對於穿木取火的發明。而在人類歷史發展的現階段，是人對於原子能的發現。現在人類的歷史尙很短，以後人對自然的克服的能力尙不知要比現在進步若干個萬倍。但人在自然方面所受的限制確是逐漸的被打破了。現代幸運的工廠的工人在實際生活上的享受，儘管不如資本家，但已經超過古代的帝王。而古代的帝王對於今日的工人的享受，只有在他們的甜美的夢幻裏方纔觸得到。在炎地可以造冰，在寒帶可以取火，在天空裏可以自由的高飛，在海底下可以自由的游泳，足不出戶，可以看盡天下英雄，聽盡天下音樂和讀盡天下新聞。凡此都是古代帝王所不曾真正夢見的。這亦可見，人的戰勝自然的偉力。但是偉力從何而來呢？完全是由人對自然的發展的過程具有日多一日的必要的知識。

更從人與人的關係上說，人的自由的意志，是指人們對於社會的限制的克服。但人的克服社會的限制的武器，無疑的便是由於人們對於歷史發展的必要的過程，獲有日多一日的必要的知識。自中古時代一起，人們便爲宗教所束縛，但自達爾文物種由來的名著出版後，人

便有力量來打破宗教的束縛，而且嶄新的獲得了思想的自由。在十八世紀以前，人的生產的能力，總脫不了行會的束縛，但自人類對於世界交通，國際商業與國際分工的知識逐漸進步以後，隨着機器的發明，人們便重新獲有一種自由的武器，其力足以打破行會的限制，並足創造一種嶄新的工場的制度。這種自由便是企業的自由了。亞丹斯密 (Adam Smith) 的原富論 (Wealth of Nations) 無疑的大有助於企業自由的發達。在十八世紀之末，和十九世紀之初，人在政治上生活，無一不受王權神聖的限制，但自民權的知識進步後，人們便有力量來解除專制的政治，而代以自由的政治，可是，隨着資本的發達，歐州的企業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否定因素漸有力。在國內，資勞的衝突逐漸的加多與強烈。在國外，資本主義變為侵略殖民地的帝國主義。因而在殖民地的疆土上，無一落後的民族不是強烈的遭受帝國主義剝削。中國便是受此壓迫的弱小民族之一。這都表示弱小民族的自由受剝削。可是，因為人們對於帝國主義者剝削殖民地的必要的過程逐漸認清了它的寄生的和腐爛的性質，結果中國和其他的弱小的民族，便都能發展出一種推翻帝國的力量來脫離帝國的羈絆。無疑的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曾經作了促進民族自由解放的工作。不用細說也知道，俄國的十月革命，乃是由於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沒落的必然過程，分析得最清晰。由此可見，人們對於社會的桎梏的克服或社會的自由的創造，亦是由於發現了社會桎梏的否定的要素，方纔發生作用的。

在某種程度以內，我們並不否認英雄創造時勢的主張。只須附上一個條件，即凡英雄所創造的時勢都不是英雄自己單獨創造出來的，而是得到人民多數的擁護，方纔創造出來的。

但爲什麼多數的人民要擁護他呢？乃是因爲在英雄創造時勢的過程內，含有社會必要的元素。正如塞利格曼 (Edwin R. A. Seligman) 所說「在一特殊的時間內，偉人的出現對於我們好像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可是偉人只有在社會需要偉人的時候，偉人方能影響社會。如果社會並不需要他他就不能被稱頌爲偉人，而只是一位空想家或失敗者。……進步好像大部是由偉人創造出來的，其實常常也是。但我們必須緊記，縱令就是如此，他的大部的特質到底還是社會的特質，而他之所以偉大，亦只是因爲他能把他所居住的社會的根本傾向比較其他的人看得更清楚，和時代的真精神表現得更成功。他即是時代真精神的至高無上的化身。」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Pt. I Chap. I, Pp. 98—99)

且問在社會自由的創造中所含的社會必要的條件是什麼？他絕不是黑格爾所想像的絕對的精神或上帝而是人類的生產的方式。馬克思說：「人類在改變他的諸生產方式的過程中，便改變了它的一切的社會的關係。手工的磨盤創造一種爲封建主所主宰的社會；蒸汽的磨機創造出一種爲工業資本家所主宰的社會。人們在一方面建設順適他們的物質生產的諸社會關係，同時也創造出順應他們的社會關係的原則、觀念和範疇。一切的這樣的觀念和範疇因而都是歷史的和暫促的產物。」 (Die Neute Zeit, XIV, ii, P. 51) 所以一切的自由的創造都含有滿足新的生產方式的必要條件。

把這個道理應用到中國這個國度上，我們看出中國所需要的真正的自由是什麼。隨着人類征服自然的能力的增加，人類已經逐漸放棄了簡單的生產的工具而取用了複雜的機器。自

從機器的發明始，人們以同量的勞動，也可生產出數十以至數百萬倍於從前的商品。可是，在中國這個國度裏，社會勞動的物質生產力內受貪官污吏，地主豪紳的封建的剝削，外受帝國主義者與其爪牙，或廣義的買辦的榨取。在這雙重的桎梏下，不但中國的廣大的佃農無法改進其農業，甚至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亦無法發展其工業。中國的勞工階級當然更深切的感到這個雙重壓迫的嚴重，恰好在帝國主義者彼此之間，和在帝國主義者自身的資勞之間，又充滿着內在的矛盾。而且世界上已有社會主義先進國的嶄新的計畫經濟作榜樣。爲使自然科學所研究的成果能夠迅速的應用到中國的產業，於以增加中國的國力起見，無疑的中華民族的自由獨立的運動係建築在擊碎上述的雙重的桎梏上。換句話說，就是中國今日自由獨立的運動乃在集合代表新中國的生產力的廣義的勞心與勞力的大衆起而以全力擊破上述的雙重的桎梏。由此可見，中國的自由實由中國歷史發展的時代必要而來。有此歷史進化的必要作根據，然後中華民族的獨立與自由始有成功的可能。如果不以歷史進化的必要過程作根據，而以十八九世紀的英美諸國的歷史的要求作根據，或以美國歷史的獨特的要求作根據，而倡導一種空洞的，抽象的，或毫不切合實際的自由主義，這種自由主義，從必要與自由的相互一致的關係看來，他不但不是自由主義，而且只是一種囑爲真正的自由主義所反對的無理的、衝動的或武斷的一種專制的主張了。

中國不需要反帝和反封建麼？如果需要反封建和反帝，它不需要爲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者所壓迫的人民大團結麼？可是，中國的一些自由主義者却反以爲中國雖然需要反帝和反封

建，但最好是由封建主和帝國主義者自動的依照一種漸進的方式來改革。或由少數的自由主義者以一種不流血的方式來改革。既然如此，他們勢必便要起而反對中國的廣大人民所掀起的反帝和反封建的自由解放的運動了。這是自由麼？用黑格爾的話來說，如這一類的無有必要的自由，只是盲動不是自由，且亦不是自由之友，而是自由之敵。我以為中國人民所需要的真正的自由必須滿足中國人民的反帝和反封建的迫切的要求。否則，不盲從，便武斷，不是異端便是邪說，不是假正經，便是開頑笑。羅蘭夫人有言，「自由！自由！天下莫不假汝之名以存！」

民國三十七年八月十一日、於北京大學。

101305574



中華民國玖壹年拾月肆日 贈送



7800
國家圖書館



002439625



音

波文書局

PO WEN BOOK CO.

Publisher & Bookseller

Specializing in Chinese Studies

252 Queen's Road East G/F, H.K.

P. O. Box 3066, Wanchai H.K.